

中流砥柱——倪柝聲傳(金彌爾)

目錄：

序言	5
前言	8
第一章 神的恩賜	10
第二章 守望者	13
第三章 蛻變的新生	20
第四章 全所有奉獻	28
第五章 穿越禾田	35
第六章 信心的試驗	43
第七章 海外工廠	53
第八章 脫去舊人	59
第九章 脆弱的瓦器	68
第十章 覺醒	77
第十一章 新的歷程	87
第十二章 工作的再思	98
第十三章 興盛	109
第十四章 引退	117
第十五章 歸回	126
第十六章 一致的揀選	134
第十七章 陷阱	142
第十八章 試煉	149
第十九章 隱蔽的行動	158
第二十章 沒有人禁止	165

序言

在每個時代的人類歷史中，往往有些具有卓絕智慧的男女，他們在當代被視為人群的領袖。在歐洲的歷史中，加里波底、拿破崙、克倫威爾及邱吉爾等均曾聞名一時；北美洲也有亞伯拉罕林肯、喬治華盛頓及艾森豪威兒。這些人的性格與信念曾改變了時代的歷史，他們也是轉移時代命運的人。

同樣的，在神子民的歷史中，亞伯拉罕是以色列民族的開創者；摩西使被奴役的希伯來人建造成一個具有潛力的大國；大衛從卑微的出身脫穎而出，成為以色列王和猶太王。但從選民歷史對他們民族英雄的生活與工作的忠實記載中，我們知道這些英雄並非絕對完全，這是一件令人振奮與激動的事。摩西不是一直都很謙卑，甚至在他學習謙卑後，仍因著急噪而失去引領百姓進應許之地的特權。大衛是一位和神心意的人，位高權重，卻因道德的墮落及一連串的錯誤，殃及他的家庭與國家。

研究教會的歷史，可以藉著考察「轉移時代的人物」一同進行，例如保羅、奧古斯丁、亞西西的法來西斯、馬丁路德、加爾文、聖法來西斯、諾克斯、約翰衛斯理、親岑多夫、李溫斯敦、克裡維廉、大衛生、斯達德等等，但是無論何人，當你仔細的閱讀這些人的傳記時，你總會發覺到，他們都是具有人的本性，並且他們的聖潔並未能使他們免去許多錯誤的判斷，甚至有一些嚴重的錯誤影響了他們的跟隨者、整個基督教，以及各大洲的宣教運動。

中國大陸也像其他廣大的工廠一樣，在神的旨意下產生了本土的英雄，並服侍了他們自己的世代。席勝魔牧師是以為學者及藥學家，他於本世紀末期，在山西建立了教會，他寫下了許多優美的詩歌，並且具有相當的屬靈認識。許多中國屬靈英雄在 1900 年間拳匪之亂時因信心操守而為主殉道。王啟泰（譯者）在 1910 年使教會得到復蘇；丁立美藉著福音的恩賜，帶下早期全國性的改革。嚴雅各博士在基督的名下於中國創始普及教育；誠靜怡博士在遭遇中國共產黨逼迫使喚醒教會起來仰望神；宋尚節博士及許志文博士，在三十年代帶領教會進入信心的領域；陳崇桂是一位有恩賜的聖經教師及作家；賈玉銘博士也是一位突出的聖經學者及福音使者，他的工作持續到九十幾歲。有一些令外國宣教士困窘及不受歡迎的人，像張靈生（真耶穌教會）、敬典瀛（耶穌家庭）、倪柝聲（小群）等，他們發起脫離外國宣教士及宗派運動，王明道維持了一個獨立不與別人分離的教會，他對全國教會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這些著名的中國基督徒為數很多，但他們多數並未像倪弟兄成為舉世聞名的話語職事。倪弟兄本人只寫過一本書且出版了。但是他留下了相當完全的講章、作品及會議記錄，這些資料曾在他所編寫的幾份刊物中登載。有些是金彌耳弟兄收集加以整理出版，例如：「正常的基督徒生活」、「模成祂兒子的模樣」及「不愛世界」。這幾年來金彌耳弟兄也收集了倪弟兄許多生活及工作資料，他在 1938 年曾與倪弟兄有私下的交通。

趙君影，他是第一代基督徒，也是一位有能力的福音工作及學生工作者。他曾說若要使這三代的基督徒得著成長及更深的啟示，就必須藉著慕安得烈及莫爾（Bishop Handley Moule）主教闡明奧秘的著作。倪弟兄不像趙君影及其他同代的教會領袖，他是第三代的基督徒，他對聖經真理有其獨特的亮光。很少現代中國基督徒的教師，能像倪弟兄在極深的屬靈經歷並真理教導的工作上，那樣的榮耀基督。但倪弟兄像大衛、保羅、衛斯理及施達德一樣，並不能免除在人為上的錯誤及人性的弱點。他強調教會是「一地一會」的原則，使他成為一位分裂主義者；他公開批評其他教會，造成基督身體不可避免的分裂；他自己從事工商業的善意行為，造成自己與會眾的分隔，至少影響五年的服事，也成為共產黨攻擊他的藉口，他極力效法初期教會榜樣的過時看法，要求他的教會在實行細節上的一致，又造成了同工們的分裂，也給反對他的人許多批評定罪的資料。這種缺乏信條及教義原則所建立的教會，無論在起始或進行過程，都造成不可避免的偏失。無論在古今的教會歷史中，此種原則的例子相當多，

這些可以從金彌耳的傳記中看到。

但是當我們在敘述中國的教會歷史時，我們不能忽略這位著名教會領袖的生命及工作的影響。他所遺留給信徒的產業，使中國教會在火的逼迫及試煉中得以存留。倪弟兄確使一位「轉移時代」的人物，他恒心忍耐如同看見所不能看見的主。在二十年的監獄生活中，他未曾離棄他的主，正像其他支派的教會，如今仍有許多他的會眾同工及跟隨者，以同樣的心志及信心在各地為主作見證。

賴恩融 (Leslie T. Lyall)

前言

這本倪柝聲弟兄生平及職事的傳記，是以一個未涉及中國事物的海外宣教士之觀點敘述，而呈現在讀者眼前。1938年我正是一位青年宣教士，正要離開英倫到印度去，我慶倖有好幾周的時間和他在一起。在這段珍貴的日子中，我發現自己對基督徒生命及服事全盤的認識有了極大的長進，並且得著了一個嶄新的方向與目標。現在輪到我來敘述這曾對我產生深遠影響及其奇特的生平，因為他的信息貴在是溶合再他的生命中。此文中藉著生活的背景，及他自己許多啟迪性的軼事，我們更可以在他一生的路程中，探索到神在這件舉世震驚事蹟中的作品。

這些年來，我有幸會見了許多與倪弟兄有深交的人，並與他們晤談，根據這許多如圖書般生動的資料，我才能把它重新呈現在字裡行間。有些是很早以前遇到的，由於時間的短促，未能允許我做更深的詢問，至今仍引以為憾。這些個人的事蹟，有許多是彼此契合，相互印證。但一些細節，取自各別見證人的回憶，由於需要而取用，亦無不過之處。更有一些論據不足的事情，為了篇幅的關係經過仔細思考後把它刪除了。若有任何錯誤與連貫，當然必有我個人負責，其中也包括我對倪弟兄本人及其同工的評論在內。若是由於我對隱藏在一些事情背後之含義、原因、動機有所誤解，而引起傷害或不快，我也願意為此特申歉意。

我曾得到許多人的幫助，特別是我從受恩 (Miss Elizabeth Fischbacher) 教士得到許多倪弟兄寶貴的講詞與著作，這些是他所贈送的譯文及抄文。她曾細心的訓練及帶領這位屬靈人，這是在我所編輯倪弟兄的幾本書上，公開論及她的幫助，當然也會列在本書中。在解釋許多事情的觀念上，我也得到其它神的僕人成熟屬靈智慧的幫助，如這位已逝的陸忠信先生，他是倪弟兄自幼以來的朋友。

在其它的地方，我也得到許多有關倪弟兄回憶印象的資料、私人函件、翻譯等等，這些人包括：史百克 (T. Austin-Sparks) 哈伯特。包羅 (Hubert L. Barlow) 大衛。本第泰勒 (David Bentley-Taylor)、林納克 (Lena Clarke) 和受恩教士、希第巴克 (Theodore Fischbacher)。

我也要向伍德小姐 (Miss Jean Wood) 及宣教聊誼會 (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 的金妮小姐 (Miss Rosemary Keen)、伯望豪博士 (Dr. Jim Broomhall) 及海外宣道會 (Overseas Missionary Fellowship) 的金依妮小姐 (Miss Irene King) 他們的樂意幫助致謝。也感謝勝利出版社富勒豪先生 (Hugh Fuller) 對我撰寫這書的鼓勵及忍耐等候，特別是四位親切幫助我讀寫手稿，提供參考意見的盧耿先生 (Gaylord Leung)、

漆林先生 (Janet Killeen)、賴恩融先生 (Leslie.T.Lyall) 以及我的妻子珍妮 (Jean)。

關於中文名字的翻譯，我特別採一般通用的 Wade-Gile 制的老式拼法，並沒有加上「修飾」，那是說正如報紙及參考書一樣。我省略了名字腔調及語句上的停頓，因為這對英語的讀音並沒有什麼意義。若有不合適及誤拼的情形那就是由於我中文差勁的緣故了。

在預備這本傳記的工作中本人特別得著神隨時的幫助，這是出於祂的手，也是為祂所用，並特此獻上。

主後 1973，倫敦，金彌耳

(Angus I.Kinner,London,1973)

第一章 神的恩賜

春天悄悄臨到古老的中國大陸，晴朗驅散了靈雨的季節，夜晚的天空非常清明，只有一些像白羊毛的薄雲，一團團飄過銀色的明月。福州府古色古香的高塔被七道城門深鎖著，蜿蜒的城牆上，伸出久已遺棄的大炮，俯瞰著廣大的稻田和散佈其間的農莊。第八世紀所建造連接城北、中洲及南台島的萬年橋上，熙來攘往的人群已漸趨平息，今夜並沒有濃霧籠罩閩江上的船家。

在擁擠的小街及住屋中，白天街道兩旁石匠所發出的有節奏的噪音；苦力挑著擔子的哼唱聲；巨大杵的搗鼓聲；街道行人草鞋的唏噓聲；運往市場去的豬仔尖叫聲；沿街小販的叫賣聲及乞丐求討的哀聲；這些喧鬧的聲音也都逐漸消失了。狹窄的巷道中，有一些遲歸的腳步聲；幾時橋夫抬著橋，帶著晚下班的文職官員；一群吵雜的碼頭工人剛裝完貨從碼頭歸來；一位癡君子拖著沉重的腳步，緊鎖眉頭，手中吊著已熄滅的外國煙捲；到最後一切終歸寂靜。在寬敞的倪宅中，家人都已入睡。

「剝剝！剝剝！」的聲音響起。睡在丈夫身旁的林和平，輾轉反側未能成眠，他覺的腹中的胎兒在動，他也聽到老大閩臣及老二閩貝的呼吸聲。「剝剝！剝剝！」這個如斷音符般的聲音由遠而近地響起，是守更人巡行各處，提醒已睡的人們當心火燭、小偷及其他危險所發出的警告。「啪！啪！啪！」從竹筒發出的柝聲，好象蘆笛聲音，似向人說：「子夜已過，鄰居們一切都平安無事！」

小屋裡一盞油燈泛著微光，火焰閃爍搖曳。和平轉動背部稍覺得舒服些，她閉著眼睛，並未入眠，她低聲呢喃著：「但願這次是男孩！」這句話她已說過上百次了。她想起白天家人閒聊、揶揄她到婆婆家所受的諷刺，心中忿忿不平。中國社會重視男嗣，而她卻為倪文修生了兩個女孩，她的廣東婆婆為此大大不悅，因她的大媳婦已不幸生了六個女兒，所以她斷言文修的媳婦也一樣。因此和平在愁苦中呼求：「喔！神啊！求你為我伸冤，挪去我的羞辱。」這時她憶起一年前快生第二個女兒的時，她曾向神許願，卻不過真誠，也漸漸遺忘。那時她曾照著哈拿的祈禱向神許願說：「神啊！你若賜給我一個兒

子，我一定將他獻給你，一生成為你的僕人。」她從小就熟悉撒母耳的故事。現在，這些事再次回到她心中，激起前所未有的感動，她毫不猶豫地說：「主啊！我一定信守所許的願！」這次不但是口頭上禱告，她也知道自己所說的是什麼，然後她便含笑安然入睡了。

過了好幾個禮拜，他們夫婦歸回汕頭家中，在那兒生產，當她聽見丈夫喊說：「是個男孩！」時，心中得到無可言喻的慰藉，她緊張的情緒在喜樂的淚水中得著釋放。家人把紅蛋送到鄰舍及朋友手中，告訴他們久已盼望的男孩出生了，倪家有了後嗣。

1903年十一月四日，倪柝聲出生了。他有一位性情文靜的父親及倔強的母親，中國人取名都是頗有意義的，一個孩子總要在他一生的轉捩點、取一些新名字。起初，按著家庭傳統，他應叫倪述祖，意思是「繼述先人的志業」。幾年後，他感覺在他的生命中有一樣新的使命，便思索一個新名：「更夫」，意思是「警戒及勸告者」，表明神要他成為先知及發言人。但是這個名字有點粗俗不雅，他母親建議改名「柝聲」，意思是更梆之聲音或警鐘，提醒他記得母親在夜晚守更人敲竹梆時向神所許的願。所以他定名為倪柝聲，英文名就是眾人皆曉的 Watchman Nee。他終生操練做一個像撒母耳那樣警戒沉睡眾人的先知。這位神的祭司也是一為鳴鐘者，他警戒神的百姓要有危機意識，喚醒他們當進入新日子的曙光中。

第二章 守望者

福州是福建省的省會，也是中國進入南洋的門戶。倪氏家族歷代都定居此地，每到清明，倪家的人都到山坡上清掃祖先的墓地。1839年左右，倪柝聲的祖父倪玉成誕生時，適逢中英為限制外貿爆發戰爭。經過三年的鴉片戰爭，中國在屈辱下被迫與西方簽訂合約。根據南京條約，香港自1842年割讓給英國，並且開放福州及其他四個海港供外商貿易來往，中國蒙受極大的凌辱與羞恥。沿海本是木材、紙張、水果和絲綢的集散地，在江中的中州島及較遠山丘的南海島，又增加了一些新奇且不受歡迎的事物，就是外國貿易機構及其他們的住宅。

早在五十年前，博學的乾隆皇帝知道，英國藉貿易入侵印度的情形。所以他寫信給英王喬治三世，耐心地解釋他的帝國是自足的經濟制度，不需要海外奇異的產品。信上說：「你的使節知道使我們什麼都有，我不需要你們這些珍品奇貨，也不用貴國的產品。」這種論調是官府盛行的看法。然而歐洲對中國的瓷器、絲綢、木漆需求逐漸增加，雖然官方命令以物易物，但英國商人卻付銀兩購買，英國政府發現這個嚴重的問題，只有要求中國購買印度的鴉片才能解決。這樣的交易讓外商占了便宜，到了1851年，天子的反對撤銷後，鴉片才正式成為合法的商品。造成貿易大量增加的主要原因，是因為歐洲需要茶葉。1853年倪玉成大約十四幾歲，茶葉是福州最大宗貨物，從武夷山買來，裝載好沿閩江而下，再從閩江口運往歐洲及美洲各市場。不久龐大的中國快速帆船，如：太平號、色摩比利號、羚羊號、飛馳號，這些船舶使福州成為僅次於上海的茶葉貿易中心。

更正教是隨著外貿進入中國，也是鴉片戰爭及南京條約的另一個結果。1842 年所發生的事，當代一位西方作家曾寫下激昂的語句：「神已經開了救贖祂百姓的道路，祂行審判是為了向他施憐憫。」皇帝朱批頒定，容許基督教信仰在古老的中國流傳，但是這項諭令，因為國內軍方壓力而撤除。儘管如此，西方傳教士因為他們國家的支持及對福音的熱心，他們湧進廣大的中國，為使公義擴展延伸到中國人的內心。他們工作非常迅速，1847 年首先抵達福州的是美國公理會的宣教士，同年美國美以美會也來了，接著 1850 年英國行道會前來傳教。這些宣教士的到來，並沒有緩和鴉片不法貿易的爭論，而且當紅發外人要求更大貿易特權時，這些傳教士還幾乎遭到當地人誤以為是貿易商，並與他們的貿易有份。

第一所西式學校，是由美國公理會在 1853 年設立於古老城市的郊區，倪柝聲的祖父倪玉成，因在那裡聽見神藉著基督耶穌臨到世人的福音而得救。當時他還年幼，四年以後（1857 年）福州有了第一座教堂。他是四位在閩江受浸的學生之一，他的靈命長進很快，所以宣教士就訓練他，使他成為一個福音使者，不久就與其他青年學生向城裡近五十萬的靈魂傳福音。後來，他被按立為牧師，成為三位閩北著名的中國傳道人之一，他有解經的恩賜。1890 年他被主接去後，仍然令人們紀念。

一位青年到了結婚時期，也正是他一生很大的試驗，當時福建很少有女子信主，所以倪玉成找不到本地的基督徒女子為妻。福州的風俗在當時極端的保守，沒有人遠背當地風俗與外省人結婚，但是他必須選擇是去面對別人的議論，或是使他的見證受損，後來他的信心戰勝了傳統，他從 450 裡外迎娶了一位廣東小姐，這位小姐的確是神為他揀選的，她成為他一生正真的同伴。

以中國舊社會的觀點來看，他們的確是得到了祝福，共九個孩子。倪柝聲的父親倪文修排行老四，生於 1877 年。因他是牧師的兒子，所以在基督教的小學上課，然後再讀儒家經典準備應試。福州是個文化中心，每三年有兩次初試，好幾千個學生到此應試，每五年會有兩次是全省的學生在此複試。藉著一種古老的儀式，文修與一大群學生走進城東北的大考場，考場大門上懸掛招牌，寫著：「為帝國求才。」他被單獨關在小屋中三天，認真書寫卷軸，以古文寫一首古詩，及兩篇指定的論文。這些試卷進行嚴格、公正地評分，在他結婚之前，通過了複試，獲得當地初級官職。他年輕的妻子林和平生於 1880 年，是農村大家庭的老麼；生活在可憐、黑暗的迷信中，常常與懼怕、魔鬼、龍及狐狸精的情緒周旋。那年福建發生饑荒，在災難中，只有她倖免於難。通常一個女嬰在父親眼中是多餘的，可能遭遺棄、溺死或活埋，但她終於保留了性命。若女嬰因饑餓生病、身體虛弱則必死無疑，骨灰就會送進福州高大多窗櫺的嬰兒塔中，把骨灰放在塔里花崗岩所做的小盒子裡，以節省昂貴的埋葬費。當時南門的羅馬天主教孤兒院，只收留少數的女孩，孤兒院門上題著：「你父母離棄你，耶和華必收留你。」

林和平的父親並未完全遺棄她，他不是自私到為了三、四個銀圓把兒女賣掉的人。經過別人介紹，他把她送到城裡一個較好的家庭，當婢女養大，她實在是一個聰明伶俐的女孩。不久這個家庭也遭遇困難，又藉著一個僕人，介紹她給一位在南台洋行做事的姓林的商人，因商人的妾不生育，希望領養一個女孩，所以和平再次易手。因著神的保守，這位商人非常疼愛孩子，因此她找著一個安身之處。雖然這個家已有兩個男孩、一個女孩，但夫妻兩人特別細心照顧新收養的女孩，把她當作親生女兒一樣的撫養她。

當他六歲時，繼母照當時的習俗替她裹腳，這是使腳趾呈圓形，把腳跟與腳踝綁在一起的動作。

這種日益加緊的捆綁限制她的腳生長，使他一生蹣跚而行。假若和平是農村的女孩，她就可以免去這種束縛，因為福州農村早已不再有此風俗。他們根據傳統，把男孩及男人的頭髮周圍剃去一圈，中間的頭髮則結成髮辮。雖然她每天早晨都因腳痛而淚流滿臉，卻從未有逃避的思想，因她現在是商人的女兒，有幸福的前途，蓮花小腳是她必須付出的代價。

那年林先生得了一場怪病，群醫束手無策。有位林先生商務上的張姓上司，是美以美會的基督徒，他提議請美以美會的牧師來為他禱告，他們接受了建議，禱告得蒙應允。因他獲得如此奇妙的醫治，所以便開始尋求基督的教義。最後他們相信主耶穌，把醜陋的小偶像從房子正廳拋出去。林氏夫婦在工作地點附近的美以美會受洗，成為會友。因為教會很近，他的妾及孩子就都到英國教會聚會。最令林和平高興的是，痛苦的纏足終於釋放了，她能像從前一樣自由跳躍。她學習唱聖詩，聽聖經故事，她的心因這些故事得著安慰，她的快樂很快感染了她的的小學老師，老師從她口中得知她家庭的故事，於是老師和師母也加入了教會。

有一位外國商人，在林家附近設立了小學，所有老師都是基督徒。和平被送到這個學校就讀。1891年當她十一歲時，進入了美國美以美會宣教士所辦的女子學校。在班上她一直是好學生，雖然偶爾信仰上會有失敗，但藉著悔改，她也經歷神的赦罪和憐憫，而她的屬靈層次一直停留在靠自己的努力的光景中。

當她生到學校高年級時，認識一位元從美國費城受訓回來的中國女醫生，名叫吳敬恩，是當時中國僅有的兩位女醫生之一，和平得以在 1895 年到城裡的宣教醫院工作，這事引起當地女孩子的欣羨。次年和平十六歲，她請求老師替她接洽，讓她也到美國學醫。學校也暫時答應此事，所以她得到父親的資助，與一位同學到上海中西女塾學習英語。這次從福州到上海的海上行程，使她非常興奮。她抵達上海，看見街上許多車輛行走，包頭巾的印度錫克族員警守在租界地，當時公園門口還掛著「狗和中國人不准進入」的牌子。

由於語言不通，她非常想家，但是學醫的雄心使她留下來。她在學習上非常突出，然而也被這半洋化的浮華城市迷住了。不久她開始挪用父親給她學音樂的費用，也用其它藉口向父親要錢，把自己打扮的更摩登。她自己說：「我在這兒學會許多今生的驕傲及肉體的敗壞。」

每一種特別的遭遇，在神的計畫中都有其獨特的意義。一天，有一位年齡比她稍大，名叫餘慈度的姊妹，到學校向學生講道，餘慈度受過良好的教育，如同這些在西式學校的基督徒一樣。她在學業上有相當的成就，到英國受醫學的訓練，當輪船經過蘇伊士運河，停泊在地中海時，神揀選了她，呼召她放棄前程，回中國把福音傳給自己的同胞。她找到沿途照顧她的船長，告訴他所發生的事。船長大大發怒，以為她精神失常，但她堅持要他同意，讓她在馬塞港換船回到中國。她回到上海後，被不信的家人拘留，而她的熱心並未減低。因她安靜等候的見證，不久便使家人不得不相信這是出於神的手。從那天起，她便忠心為主作見證及教導聖經，她不接受外國薪津，只單單仰望主的供給，但她的工作更有果效。

聽見餘慈度親口的見證，和平心中大為感動。她請余小姐到她房中，將母親給她的珍貴金手環送給余小姐，但余小姐拒絕了，她不願從一個年輕女孩接受如此貴重的禮物。這使和平更確信她的忠誠，和平說：「從此我知道她真是愛神不愛錢財的人。」

十八歲的和平並沒有聽到神的呼召，卻因環境的激變使她受到打擊。母親一直反對她去美國，且為她心中憂傷。當時福州倪玉成的遺孀，打發一個人來為她兒子說媒，和平的母親很快就答應了這門親事，和平並不知道她母親已經安排好將她嫁給倪文修的婚事。她接到父母命她回家的信，知道這種安排必須犧牲她做醫生的夢想。當時還沒有女孩子敢違習俗，反對父母的安排。她雖叫和平，有平安的意思，當時的狀況真可說是「煩亂」。她非常痛苦且近乎絕望，在船行經島嶼遍佈的海岸時，烏雲籠罩她的心頭，心中對視她為寶貝的母親滋生怨恨，因她破壞了她美好的前程，現在生命中僅有的希望已歸於破滅。

她一回到家中，便被叫去，給了她倪文修的相片及訂婚飾物，從此她便要嫁給這位從未謀面的人。1899年她懷著沉重的心情，走進結婚禮堂，她覺得自己是個毫無生趣的女孩，卻要做新娘。生命對別人而言是自由追求理想的職業，但對她卻是一個結束。「結婚，我真恨這個詞！」

十月來臨，是寒露的季節，十月十八日南台那位前任公理會牧師的兒子倪文修（他是即將在汕頭上任的海關官員）與林和平（即富有、慷慨的基督徒商人的養女），在南台舉行結婚典禮。這是個快樂且充滿希望的日子，這對年輕夫婦在倪家住了兩個禮拜。在那裡倪老太太帶著七個兒子與五個媳婦一起生活。這段短暫日子中，這位頗受拘束的年輕妻子，回想起她母親的慈愛。她立下心志，如果她有媳婦，決不使她們受苦，像她在婆婆的家中一樣！到了倪文修上任時，他們打點行李，出發往汕頭，這也是自由日子的開始。

在雙方新友的送別中，倪文修帶著他年輕的新娘，乘坐舢板到十八公里外寶塔島輪船碼頭。甲板上擁擠著許多乘客，他們的臥鋪、行李、豬皮箱及各種家畜，都在一起，當輪船從渾濁的河道進入碧綠的海洋，旅程擁擠、不舒服的感覺，因著眼前美麗的岩岸而消失。經過五百公里的海上航程，他們終於抵達汕頭。這是一個位於韓江口的小型岩石通商港口，雖然它較福州小，但它有富饒的腹地，蓬勃的貿易。倪先生終日效力於他的關稅工作，這對青年夫婦在海關特區內定居下來。

1900年並不太平，遠在北方省分發生義和團之亂，或稱為義和拳，外人稱為「拳亂」，他們殺害中國基督徒，演變成排外的暴亂。狡詐的慈禧太后，早已遠走內地。她想利用此危險運動，達到自己的目的，頒佈命令剪除所以在中國的外國人。所幸南方總督冒險遵守所訂的「東南自保條約」，沒有執行她的命令。福州城因為神的安排，在變亂時洪水沖毀了閩江大橋，因而阻攔謀害的發生。當汕頭不安的情緒控制住，這時閩臣出生，他們因她出世而歡欣，視之為神的恩賜。一年以後閩貞出世，更加增他們的歡喜。但由於傳統觀念的壓力，兩個女孩的父母感到內疚，為何神讓第二胎還生女兒？他們都是單純的基督徒，在重大的試煉中信靠神，傳統的壓力使他們屈膝在神面前，並將問題交拖給祂。

當他們再次回到汕頭時，第三胎臨產，這個父親終於高興的叫出：「是個男的！」在這個小孩述祖身上，神聽了和平心中的禱告。雖然她是個軟弱的基督徒，但她守住了她的諾言，像哈拿一樣，帶著她心愛的孩子回到神面前，說：「這孩子就是我所祈求的，所以我要將、這個孩子 終身歸給耶和華。」因此神為祂自己找著了一個守望者。

第三章

蛻變的新生

往後幾年倪家的孩子陸續增加到九個（五個男孩，四個女孩）。閏臣、閏貞及亨利（述祖就是柝聲）後，就是喬治（懷祖）及三個兒子宣祖（只活到中學），過了一段時間又生了兩個女兒天婷及天菁，最後是兩個兒子，保羅（洪祖）及約翰（興祖）。

倪文修是一位海關的初級官員，月薪三十五兩，收入並不算高，他還必須把將近半數的薪水寄回給家中寡母。人口日益加增，必須常為生活的必需品有所預備，如食物、衣服及所住的房子。他們有便宜的新鮮蔬菜以及海產補助了米食營養的不足，因此孩子們成長良好且健康。他們的玩具非常簡陋，都是當地陶器、竹子及紙做的，在耶誕節前後，季風增強時，他們便玩風箏。

林和平非常勤快，為了幫助家中的經濟，她答應父親的請求，幫助他在汕頭出口貴重的抽紗及刺繡布疋。這是一種利潤很高的買賣，當時在馬來西亞、英國及美國都有穩定的市場。她丈夫因工作細心謹慎，忠於職守，受上司賞識而獲晉升。經過幾年興盛的日子，他被轉調到蘇州，即上海西方九十公里的地方。由於布疋的買賣突然停止，家庭經濟陷入紊亂。過了十二個月，在母親慫恿下他回到福州，應徵另一個新的職位，由於博得同情，他很快獲得了工作。

在汕頭時，他們夫婦開始注意孩子的教育，在禮節義態及練寫毛筆方面都加以訓練。一回到福州，他請了一位秀才（即通過科舉的初試）為家庭教師，叫孩子們學習書法、文學及四書五經中的道德準則，這是二千年來中國道德文化的根基。自 1905 年開始，老式的科舉考試廢除，進入官場的門路被西方教育取代，但當時的小孩，尚得接受孔夫子的學說及教育。年輕的倪柝聲在學習上比兩位姐姐來的快，常常得到老師的賞賜。倪家人都愛好音樂，家庭教師教他們中國古調，和平親自教導他們聖詩及聖經課程。後來丈夫為她預備了一台鋼琴，自己也抄些樂譜供孩子們學習。

傳統的中國父親通常都以嚴治家，但倪文修的天性並非如此。他像自己父親一樣莊重持守，不喜歡責罵孩子，平易近人，就像他在公事、與朋友交往上，仍然保持中國男子的君子風度。在家中是妻子和平執掌刑杖，對他而言，紀律是家庭的光榮，她以威嚴來管束這些調皮的孩子。家中有一個規矩，每個人都要平均分攤家中的瑣事。她把家整理得乾乾淨淨，每樣物品都有定位，如果什麼東西擺錯了位置，沒有一個人逃脫得了責任，誰在現場，就得把它歸回原位。倪柝聲身邊經常留下一些雜物或打破的東西，所以常受到責罰。他的姐姐們有時因他受罰過重，也常替他認帳袒護他。

他們很幸運，有另一張姓福州家庭與他們為鄰，同住在南台岸邊，可以遠眺大橋，張付官是位很好的基督徒朋友，與他們父親時有來往，兩家兒女經常在一起遊玩，張家兩位大姐與倪家姐妹是好朋友，但小嘉莉（品惠）比柝聲小一點，總是跟在他後頭。在孩子們玩遊戲的時候，倪柝聲總是出注意帶頭，所以他成為孩子中的「老大」。

離他們家不遠，有個熱鬧的魚市場，那兒有座花崗石的古橋，上面鋪著磨損的石版，連接到中州島。還有座更長的萬壽橋跨越北岸，並由一條擁擠的馬路通到福州舊城門。舊城對孩子們可能太遠了，近在身邊的古橋便成為他們嬉戲的地方。在這兒他們可以看見做生意賣書畫的攤子，也有替人占卜、選日子，或牙醫在好奇的觀眾面前替人拔牙，甚至偶爾碰到滿清衙門的囚犯，頸項上帶著沉重的枷鎖，

板上寫著他的罪狀。在島的周圍擠滿了許多船家的舢板，他們為生活忙碌著，在拱橋下的小舟上，漁夫和他們的鸕鶿在捕魚，每當鸕鶿捕到一條魚，便得到一點食物，因為它們脖子上系著一個項圈，所以不會把魚兒吞進腹中。

從碼頭到他父親辦公的南岸，孩子們可以看到近海的平底船，快速開往南台停泊地，他們的快樂上畫著偌大眼睛，堅硬的棕色帆與藍色的鼓山山麓相互輝映，所以孩子們可以看到許多不同的樣式。這兒的出口貿易非常興旺，包括農產品、山上的茶葉及木材。但出口工業產品很少，僅限於絲綢、陶器及家庭工業，如油紙傘，紅木枕頭。這時的福州算是落後，因為整個中國在工業上有很大的進展。沿海城鎮紡織工廠興起，鐵路伸入內地陸，外國工程師辛勤地開採國內的礦產。

倪柝聲大約六歲時，倪家遷回福州，九歲時，反對帝國的革命運動肇始。當時舊城內住著浙江兼福建總督，他是滿清皇朝的代表。韃靼將軍及他的閑懶旗人，帶著濃裝豔抹的女眷住在該城的特區內。拳亂之後，民生困苦，政府失信於民，所以有些受過教育的中國青年，起來反對外人統治及西方的剝削，有更多青年到海外學習新知識，並帶回革命思想。

當時他們心中目的英雄，就是為中國革新努力了廿年的孫逸仙博士。他出生於廣東，信仰基督教，是中國革命思想的創始人。雖然他一再失敗，但他為中國創建了三民主義（民主、民權、民生），獲得廣泛的支持。他被迫流亡海外，因為滿清政府仍為那些尋求自身利益的外國政府所支持。1908年十一月光緒皇帝崩逝，他雖然聰明但太懦弱，所以整個政權都落入老皇帝寡妻慈禧太后的手中。她是個陰險自私的人，皇帝死後第二天，她也去世了，很少人為她哀哭，但繼承王位的是光緒的三歲的侄子，登基名號為宣統。

再過三年，帝國由於人為過失遭上天廢除。1911年十月（即雙十節）因搜查革命黨的炸彈，湖北首府武昌發生革命，接著一連串事件，導致清帝遜位，開始民國紀元。

十二月孫逸仙博士從海外回國，在（南方首都）南京被選為中華民國第一任大總統，他宣告成立一個自治政府。為了表明反對滿清統治，他的擁護者開始剪掉辮子，這辮子是滿清強制在漢人身上的標誌。從此以後，福州的學童，不再于廣場上彼此玩弄髮辮。中國經過二千年的君主政體，龍朝的政體中心被充滿希望的民主政治所取代。

孫先生與南方的革命領袖，急切盼望在中國塑造西方的政治體系，但北方有一人敵擋他，這人就是袁世凱，一位企圖當皇帝的帝國將軍。他用計謀取了總統之職。1913年8月孫博士被迫與南方沿海城市組織「二次革命」機構。

倪家非常靠近這個工作地點，孫先生的「愛國運動」打動他們的心。雖然倪文修是一位退休的官員，無法公開贊助，但他的妻子則不然，到處演講鼓吹，並宣傳她新發現的婦女運動，使女權得以伸張。她不顧周圍的戰亂，到處演說，自己先把首飾金環奉獻給國家，所以有許多人跟隨她。為了加強聯絡力量，她組織婦女愛國會，以地方首長夫人為會長，自己為總幹事。1913年孫先生到達福州，和平被官方委派為總統的接待員，加上孫先生的私人秘書宋女士是他上海中西女塾的同窗，所以，她自始自終陪伴他們環遊全市四天，並赴各機關會宴。

這時倪柝聲只有十歲，由於孩子的好奇心，他喜歡聽有關政治的談論。革命的確帶給這個國家一個新希望，由於親西方的情緒開始普遍，使基督教宣教工作迅速擴展，也帶出他到外國留學的門路。

但一年以後歐洲發生戰爭，西方和平幻滅，國內革命幾乎流產，形成軍閥割據的局面。日本也藉著參戰入侵，於1915年1月18日提出二十一條件，公開要求瓜分山東省，因此把中國變成傀儡。那年袁世凱宣告民眾喜歡復辟，因此恢復龍朝，但卻註定他羞辱的下場。

1916年十三歲的倪柝聲滿懷希望進入英國行道會（C.M.S.）的初級中學，接受西式教育，他按部就班進入聖馬可高中。這所高中是屬於安立甘教會在南台島設立的福州三一學院，包括小學、初中、師範、高中及神學院五大部，將近有四百名學生，這兒的教師和職員，主要是從愛兒蘭都柏林三一學院來的宣教士。

他在學校的成績每學期都名列前茅，偶爾因生病而成績退後。他像其他學童一樣，喜歡把自己的名字「倪述祖」，以紅墨水印在書本及手邊的紙上，這是盼望有一天能得好運的記號。在行為上，他是一個正直、有正義感的人，也以此沾沾自喜。有一次一個小販到學校報告，說倪柝聲因正義的熱心，將偷瓷器的小孩指認出來。他對男孩子的團體運動，如籃球、排球及足球，沒興趣也不熱心，但他身體長的很快，成瘦長形，比他的同伴都高過一個頭。

他很快學會北方話，就是西方人所指的「國語」，現在正式成為全國百姓的通用語言。他早年所學習的古文，仍然留在守舊的教育制度中。但現在中國正掀起巨大的文化復興風潮，為了一般大眾的需要，一些先鋒作家及詩人，轉用新的語體文，來寫本地話的通俗小說。1922年教育部核准，把全國教科書重新用國語改寫。這項改革使以後幾年在以文字傳達思想上，產生極大效率，因而幫助了基督教思想的傳播，得以進入廣大的圈子。

然而宗教信仰在學生當中並不受歡迎。1918年一次反宗教運動，藉陳獨秀的「新青年雜誌」而升高。他是北京大學文學院院長，也是一位最具有影響力的教育思想領袖。他的運動在1922年，產生一個反宗教大聯盟，隨後導致反基督教運動，他後來成為中國共產黨的總書記。還有一個五四運動，也值得我們注意。由於第一次大戰勝利，中國希望藉著1919年凡兒賽條約，收回割讓與德國的山東省，但是，當時山東被英、法轉讓給另一個盟國日本。許多中國青年因為政府無能，出賣國家感到憤慨。於是1919年5月4日在北平發起青年保國運動，隨即學生在上海、福州罷課，同時產生一個新馬克思思想。在1920年因為蘇聯政府宣佈放棄對中國領土的要求，更助長了這個思想的進展。

這時倪柝聲正十六歲，很容易感受學生運動的情緒。他剛完成初中教育，要到聖馬可學校讀書的計畫，便受到這些情緒的攪擾。例如，北方軍閥的零星爭鬥，由於糧餉缺乏，軍隊開始重視搶奪，一些同學從鄉下回來，帶來百姓暴亂及農民受欺壓的悲慘故事。

家中的事也使這個成長中的孩子從迷夢中清醒，母親所介入的團體，對他們逐漸失去吸引。福建政府為了嘉勉她政治上的熱心，孫道仁都督特為她上呈北京政府，蒙允授與二等愛國勳章。她得到這份榮譽後，愛國熱心反而消退轉而追求自己的名譽及地位。社交娛樂占去了上教堂的時間，「此時我與不信的人接觸，成為一個無信仰的人。」每天有些名人女士到南台家中玩牌、打麻將。有一天牧師來請她為聖工奉獻，她調侃地回答說：「你且坐下，看著我是否能打贏，如果贏了就奉獻一點給祂。」她連基督徒敬虔的外貌都丟棄了。

和平過去管教孩子，是公正無私的，但這時卻顯得不耐煩、不公正。1920年1月的某個星期天，她一件寶貴的裝飾品打碎了，和平怪罪倪柝聲，要他承認，但他拒絕承認，於是她就把他通打一頓，

傷害了他的自尊。後來雖然發現他是冤枉的，但她仍毫無悔意，只不過平息兒子心中的怨氣。第二學期，他傷心地回到學校。

就在那個月，他聽到一個意外的消息，余慈度姊妹來福州舉行兩個禮拜的新年佈道，這位姊妹是她早年在上海非常佩服的人。這時余姊妹已是中國北部及韓國很有恩賜的福音巡迴佈道家，並且她在上海也創設了一所聖經學院。和平與 1898 年曾被感動送她一件禮物，後來一直沒再見過她。聚會前一天，她請余姊妹到家中吃晚飯，並邀請牌友作陪，飯後她說：「明天早上余姊妹要在天安堂講道，請你們都去。」她們說：「你呢？」她回答：「我當然也去。」

2 月 15 日第一次聚會，和平和朋友們準時到達會場，坐在前排。余姊妹小腳上穿著一雙錦緞繡鞋，堅定地站在臺上，宣讀神對夏娃說的話：「你們不可摸，免得你們死。」她頭兩天藉著這些話，講到「與神隔絕的屬靈死亡」，聚會滿了屬靈的能力。但這個題目，和平聽得不耐煩，因為她從小就知道了，於是決定只參加兩次聚會就夠了，她的朋友都抱怨糟蹋了兩天打牌的時間。

所以第三、四天，她又同牌友玩起麻將，她們照舊興高采烈。但她心中非常痛苦，和平回憶說：「當時我坐在那兒玩牌，好象一個死人，我知道神的聖靈在對付我。」折騰了兩天，她突然向她們宣告說：「我是基督徒，余姊妹不遠千里來講道，我不去聽真是不盡人情，明天我不；來打牌了。」

第二天余姊妹見她來，立即上前問候，無意地問她：「這兩天你到哪裡？」她編了一個謊說：「我不舒服。」余姊妹慈祥地看著她：「願神光照你，祝福你的病快快好。」這句話打動了她的心，生病和打麻將相差是何等的遠呢！自己多詭詐！在整個聚會中，她一直躲避傳道人用手指著她說了許多紮心的話。她已四十多歲，又是一位有名氣的人物，不能忍受任何人如此斥責，這次聚會幾乎成為她最後一次的聚會。當余姊妹問她：「你明天還再來嗎？」她怎能再為自己找藉口？但第二天她再來時，神又責備她，這時，祂的僕人講到主耶穌在十字架上為罪人受苦，她說：「余姊妹好象完全為我一個人講的，感謝主，每天都有一種力量把我帶到聚會中。」最後她終於向她承認自己的需要，並感謝祂的憐憫，祂的恩典終於得勝了。

她丈夫去了幾次聚會，不禁奇怪地說：「別人悔改總是高高興興的，你參加後聚會，幾夜不能睡，飯也吃不下，什麼都不做，總是哭哭啼啼的，以後不要去了。」她說：「你不知道我心中的事，我犯了罪向你撒謊，從前你給我家用錢，我還拿去打牌。」她將以前得罪他的地方都向他承認，接著她丈夫也向她認罪，於是二人雙雙對泣。「和平」的含義終於進入她心中。從那天開始，她不在碰紙牌及麻將了。

也有一些高中生參加余姊妹的聚會，和平帶著重新尋著的喜樂，擔任余姊妹的翻譯，把她的北方話翻譯成福州話。由於倪柝聲早已受到朋友不可知論的影響，加上看到基督徒失敗的見證，他沒有去參加這個聚會。雖然母親邀請他參加，但他像母親一樣倔強，不願去聚會。這怎麼辦呢？現在她被迫來到抉擇的關口，她知道必須向大兒子承認過去不公義的罪，但她的驕傲使她無法低頭謙卑，何況孔夫子不也講過天下無不是的父母嗎？

於是她決定以別的方式進行。她拿三塊錢去買詩歌和聖經，重新開始家庭禮拜。第二天，她正要彈琴唱第一首詩歌，神的靈抓住她，她知道若要公開敬拜神，就必須向兒子認錯。她就說：「但是神啊！我一個做母親的，怎可以向孩子認罪？」但神卻清楚地說：「非認罪不可，這是唯一的道路。」

她丈夫及孩子們困惑地看著她，突然她轉過身來抱住大兒子，流淚地說：「我為主耶穌的緣故，向你認那次因生氣打你的罪。」大兒子照實說：「你那次無辜打我，我心裡很恨你。」她看著他說：「求你赦免我。」但他默然不應，轉而走開。家庭禮拜繼續進行。

就在那晚，神抓住了倪柝聲。他深深被母親的認罪打動，他從未聽說有一位中國父母，會做出這種丟面子的事。他母親能有如此轉變，必定受這位遠道而來的傳道人的影響，基督教敗必定不止是教條而已。他願自己去見識一番。第二天一早，他告訴母親說：「我已經預備好，要去聽餘慈度講道。」那天他去了。在講道中，他進入悔改的光中，發現耶穌基督是一位又真又活的救主及朋友。在一次青年奉獻呼召中，他向神許願要終身侍奉祂，決不反悔。神也因此將生命放在他心中，這生命整個改變了他一生。幾年前祂垂聽了母親夜晚的禱告，所以祂履行這個約定。

我們能否看見神的手在這些事上的安排？我們看過士大夫的空談，已經充塞中國人單純的思想，就在這時，一個被馬克斯主義影響了十年的青年完全悔改了。而且成為赤禍洪流中的中流砥柱。

第四章

全有的奉獻

當倪柝聲十八歲時，他轉向耶穌基督，並把自己完全奉獻給神。後來他告訴一位親近的朋友說，在余慈度姊妹聚會的那幾天中，他曾仔細衡量奉獻的事，認為這必須是全然擺上，不然就毫無意義。耶穌的門徒豈不是「撇下所有的跟從了耶穌」嗎？（路五 11）他看出重生得救，就是一生一世順服那位掌管萬有的創造者。

為何不奉獻呢？在舊城的瓷漆街上，有位無名的雕匠，他已花了六年的時光，才做完四扇屏風中的三扇，把白花浮雕在黑漆的木頭上。他每天的酬勞不過是八十分錢，無論是晴天、雨天、或假日，他的老闆都是同一待遇，加上米飯菜蔬，及一張睡覺的硬板床。雖然他有這等雕刻技術，但可能只做了兩個這種屏風，眼力和精神差不多不管用了，因此他被解雇淪為乞丐。如果我們能不吝惜把天然的才賦，花在這麼一個貪婪苛刻的雇主身上，那麼有什麼東西是配得歸還給這位賜下獨生子的神呢？

不久，倪柝聲便經歷了保羅的話：「倒要像從死裡復活的人，將自己獻給神，並將肢體做義的器具獻給神。」（羅六 13）他說：「由於神對我的要求，我認為自己所有的才智都屬於主，我不可浪費一分錢、一個小時及任何心智、體力，因為這一切都不是我的，而是祂的。這個發現對我是一件大事，從那天起我開始了真實基督徒的生活。」

接著他就學習要糾正一項錯誤，因為學校有一門費力的科目，就是聖經課程，因為倪柝聲漠不關心，所以成績一直不高。他並未受到高年級反宗教情緒的影響，只因他是出自基督徒的家庭，他不願意在教會學校使基督徒家庭的名譽受到譏嘲，於是他在考試前把答案寫在手掌上，當時衣袖很長，可以將手掌蓋住，不會被人發現，結果他得到七十多分的成績，因為這項成績與其它科目成績差不多，所以沒有引起老師的懷疑。

當他重生以後，他立即放棄這種行為。因此雖然盡力去讀，但成績卻未能超過七十分，他知道若不認以前的罪，神就不能幫助他，他為此猶豫了一陣。校長曾警告過，若有任何一位學生作弊就得開除，而開除就等於失去了大學獎學金和出國深造的希望。（在三一學校的最後兩年課程，等於上海聖約翰大學的一年級的程度）所以經過一番掙扎，他決定揀選耶穌基督勝於他的前途。他去見校長，將他所做過的事供認出來，並告訴校長，他之所以要認罪的原因。令他非常感恩的是他並沒有因此被開除。

在倪柝聲歸主三個月後，余慈度小姐再度訪問福州。她是從廈門北上，向三一學校的女學生講道，再一次又有許多人歸向基督。此時，這地區正受到戰爭的攪擾，因著南北勢力的消長，在鄉間及城市時常發生間歇性的戰鬥。5月5日，高中生參加一項為紀念1915年日本所提二十一條國恥紀念日的反日本遊行，第二年因為局勢不穩定，學校的課程無法按部就班地教授。

看到這些情形，倪柝聲覺得必須重新調整生活的方向，因此神秘地失蹤了。他的同學不知道他到那兒去了，同時他的家人也保守這個秘密，直到他回來幾個月才說出來。原來他坐船去了上海。這時上海因著約翰杜威（John Dewey）、巴特蘭羅素（Bertrand Russell）及泰戈爾（Tagore）的到訪，正興起教育的新思潮，在學生心中留下極深刻的印象。但他的目標並不在此，而是到余姊妹的聖經學校接受一年的聖經訓練，為要解決他讀經上的困難。他雖然盡心努力，仍然得不到更好的老師指導，但他從余姊妹身上學習完全仰望神的供應，就像余姊妹一生所行的一樣，她告訴他要讓神的話語在他心裡，而不僅僅是記憶在頭腦裡。

當他回家是時，母親以堅定的口吻問他說：「現在回到三一學校完成你的學業。」他遵命而行，因為課程分量的減少，所以他幾乎沒有困難就趕上。

倪柝聲是轉變了，不在浪費片刻時光，專心於學校的功課。同時也列了一張班上同學的名單，開始逐一為他們禱告，並抓住沒個向他們做見證的機會。因他隨身攜帶一本聖經，同學戲稱他叫「聖經倉庫」，但他仍舊繼續研讀，以求明白聖經的內容（他告訴我們，他曾定意每月要讀好幾遍新約）。他熱誠的隨時預備向每一個人傳講聖經中的信息，由於他生活的改變，敬虔的生命加上動人的微笑，漸漸引起同學的興趣。

有一位名叫王峙的學生，他是從廣州海軍學校，轉入三一學校六年級倪柝聲的班上。他是最早加入倪柝聲在學院禮拜堂非正式的學生禱告會。經過一年多的時間，倪柝聲在班上談道工作，才在看到結實的果子，有好幾位青年悔改，並得著新生命的喜樂。其中為首的有從沿海連江的古田坐船來求學的繆紹訓、陸忠信及魏光禧。

他們不以在學校做見證為滿足，有一群高中男生開始利用主日、節日及學生偶而罷課的時間，把福音帶進城裡。他們沿街敲鑼唱詩，並向民眾宣講永生救主的佳音。如此更加增了這城裡原本就有的吵雜聲，如鼓聲、爆竹聲、豬的尖叫声、小販叫賣聲、苦力喧鬧、送葬儀隊的哭叫聲等等。所以沒有人介意他們製造出的聲響，他們手拿單張及標語牌，海報用大字清楚寫著有關得救的方法，貼在廣場牆上，與色彩鮮麗的紅雞牌香煙廣告、大肆宣傳的煤油燈、華麗而庸俗的藍色老虎壁畫相爭（這些老虎是在南方福清業林，令山上居民恐怖的動物）。中國文字是直寫，可以寫在廣告版上，所以他們有了一個新的構想，做了白色棉布背心，用紅筆寫上福音信息，如：「神愛世上的罪人」「耶穌基督是永生救主」，於是兩岸的村民都感覺到這群基督徒中的靈性的復興。

這時，倪柝聲在馬尾找到一位同教會的屬靈姊妹，她後來成為倪柝聲最重要的朋友之一。當他從上海回來在馬尾登岸時，余慈度姊妹介紹他去認識和受恩教士（Margret E.Barber），和教士以前是英國傳教士，現在自立傳道，她生於英國東部撒弗洛克州的畢生毫。于 1899 年隨英國行道會的人來到福州，她在女子中學教了七年書，在宣道記錄上，她是一位熱心、努力的工作者，並且具有相當才華。1909 年當她回英國度假時，她感覺到神向她挑戰有關她受浸為信徒的事（她以前是受點水禮），她為此到挪維奇的 薛雷教堂去見潘湯（D.M.Panton）先生。她的主教知道了這事，便寫信給她，勸她不要再去福建。雖然如此，她在四十二歲時因著薛雷教堂信徒的禱告，以及自己仰望神的供給再次回到福建。

她與中國自由傳道人李愛明同工。為了不使她以前在南台的同工為難，她度過馬尾羅星塔的渡口，在白牙潭以廉價租到美國公理會退休傳教士的一棟平房。不久，在這裡又加入一位從英國來，比她小二十多歲的黎教士（M.L.S.Ballord），這個地方成為她日後事奉的基礎。

她們兩位在當地婦女中，忠心工作有十年之久，偶爾也向男人傳福音，並且每隔一段時間，她們就到福州城在市場裡分發福音單張。她們深覺自己是單身女教士，受到性別的限制，又處於一個廣大屬靈黑暗省份的門口，如何能應付福音的需要？當她回福州的第一年，雖向鄰近佛泉山廟裡的二師父作了自己受浸成為基督徒的見證，而這廟是以藏有佛牙而著名，然而傳福音的行動如鳳毛麟角。要使以農立國的中國歸向基督似乎是一個遙不可及的夢想。她告訴自己說，除非神自己從中國各地呼召揀選一些青年男女來工作，否則不易有果效，她們開始為此恒切的禱告。

1921 年的一個清早，一艘中國軍艦停泊在白牙潭，一位年輕的海軍軍官上岸，當他路過海關時，她被傳教士住宅中的詩歌所吸引，於是上前拜訪。他就是福州倪柝聲的同學王峙的大哥王載。他是從煙臺海事學院畢業，被分配在南京的一艘艦艇上任職，就在那裡他很奇妙地歸向耶穌基督。他當時是二十三歲，並且決定放棄軍職，成為全時間的福音工作者。就在她們傳出詩歌的門口，神賜下應允這兩位女教士的禱告憑證。

王家住在南台島靠進河邊的岐山村，房子在山坡上比倪家高一點，所以王載很快與倪柝聲及其同學聯絡上。當他從船上退職回家後就以此地為福音工作的據點。他在服事上很有恩賜，而且年齡稍長，經歷也比較豐富，因而大受學生的歡迎和敬佩。

因著神在倪柝聲母親身上轉變的工作，倪家也成為一個新運動的中心。這為曾在政治上活躍的人物，而今轉變為基督的見證人，足以耐人尋味。由於她簡潔有力的見證，及靈活的運用聖經，倪女士便被一位美以美會的牧師邀請，到福建北部各地向婦女作見證。藉著朋友們的幫助，她的白話更為流利，使她進入更廣的工服事。她緊緊地跟隨主，在凡事上尋求祂的旨意，常常簡略地記下自己的言行，警覺地改正自己的缺點，所以神明顯地在她的見證中賜下榮耀。雖然她常離家遠行，同時也察覺到家中的需要，一個炎熱的夏季裡，她在福州女青年會，參加了兩個禮拜的聚會後，因為急需休息，她拒絕了繼續事奉的邀請，並感覺到神正提醒她有些事要臨到她的家裡。當晚她回到家中，與丈夫在屋前的水邊散步，眺望河中來往的舟筏，她有感而發地說：「今晚這麼乾燥，我怕會起火。」初更時分，它們被四周呼聲喊醒，猛烈的火焰隨著劈啪爆裂聲從竹子及茅草編織的房頂冒出，並沿街而竄。他們禱告神，她從神得著應許的確據，他們的房子必不會被波及，她不需要叫醒最小的孩子。的確，風向轉變吹向北方，火焰燒毀了十二棟房子後，就在她們房子隔鄰的第三間停住了。

倪文修對神奇跡似地眷顧大為感動，七天以後他們在炎熱的夜晚乘涼的時，他的妻子又擔心另一場大火，他卻大為不快。然而清晨四點起了一陣喧嚷聲，火勢比上次更兇猛，陣風助長了火勢，火焰從橋邊的市場向北延伸，她丈夫問她：「你看這回會不會燒到我們家呢？」她禱告一會說：「可能會」。於是他們先叫起大的孩子，然後匆忙地打包及收拾貴重物品。就在這時創世紀第十八章忽然進到她心裡，想起亞伯拉罕為所多馬的禱告不夠徹底，（她覺得）神似乎在責備她：「你為何不禱告呢？」所以她停下工作，再次屈膝向神禱告說：「神啊！在福州這地區只有我們這一家是信主的，請給我們一個見證，免得不信的人對我們說：如今你們的神在那兒呢？」她立即得了確據，「雖然千人僕臥在你旁邊，萬人僕倒在你右邊，這災卻不得臨近你。」（詩九十一 7）她把從神領受的話告訴了丈夫。但此時火焰被風吹逼迫近他們，他為著她的安靜不動嚴厲責備她。然而不可思議的事發生了，城裡的消防隊因為橋頭被燒毀的房子被阻塞，所以離開水邊退到他們面前，他們的房子成為救火的總部。由於他們熟練的技巧和風向的轉變，加上一些雨水，使大火止於他們住宅前兩戶之外。一周內的兩次大火，使這棟靠河邊的房子，在災難中奇妙地保存了下來，這麼奇妙的神跡怎麼不使這家人大有信心呢？

日後的某天，和平聚會回來，她知道有兩位女士從白牙潭來找她。在此之前，她一直沒有見過和受恩及她的同工，雖然她知道倪柝聲和同學們經常到寶塔渡口查經，但自從聽見余慈度姊妹回上海前在河裡曾接受她們施洗，她就一直避免與她們見面，和平覺得這樣對她的奮興聚會有所妨礙，因此毫不猶豫地公然反對這件事。

在復活節的前幾天，倪柝聲向她說：「敬愛的媽媽，明天開始我有三天假日，我要去參加和受恩的查經班。你要不要和我去呢？」她回答：「等一會兒，我要禱告神。」她上樓跪著禱告，然後坐起來梳理頭髮，當她禱告時，她覺得神對她說：「去吧！還要受洗。」她在很小的時候和她母親一同受過洗（點水禮），現在神要她公開做這件她強烈反對的事，重新肯定她成人後的信仰，明顯地這是出於神，不是別人強迫使她有如此的行動。她記得當耶穌受洗時，神的話臨到他：「這是我的愛子，我所喜悅的。」（太三 17）經過一番思考，她下樓呼喚倪柝聲：「我已決定跟你一道去和教士那兒，我還要受洗。」他立刻回答：「我也是為受洗去的。」

對倪柝聲來說受洗不再只是順服的問題，而是對神持守無愧的良心。他讀到新約中保羅把受洗與基督的死聯在一起；彼得則將受洗與神的國度相聯。她同時也發現在這兩個敵對的世界中，一個是這世界的王，一個是生命的主，人們無法事奉兩個主。他知道他必須以這中公開的方式表明與世界的王完全絕裂，交托在另一位的手中。他說：「我要從撒旦統治的國度中出來，不再屬於這世界；我定意順服神的心意，進入神在基督裡為我預定的永遠計畫中，從世界得釋放，進入祂的拯救。」

聽見母親和兄長的計畫，倪柝聲的弟弟喬治也表示願意受洗。於是第二天早晨，他們三人乘船到馬尾。和教士很高興地接待和平，說：「你們吃過飯嗎？你們帶來什麼好消息？」她聽見和教士的話大吃一驚，因為沒有人告訴和教士這個消息。但神早已告訴她關於受洗的事，因為自從餘慈度告訴她關於倪女士的事後，她們就不住地為她禱告，直到現在她們一同跪下感謝神。

復活節主日，他們到白牙潭河邊，水流平緩，那天是陰天飄著細雨，減低了他們的興致。當天早上和平心臟病發作了一次，和教士建議改天受洗，但她堅持說：「我寧願死在神的旨意中，而不願照自己的意思活。」她說著就與年紀老邁的傳教士李愛明走進了閩江的淺水裡，她求神給她一個喜悅的明

證。李愛明把她浸入水中，正當她的頭浸入水中時，復活節主日的陽光破雲而出，因此倪柝聲與喬治也沐浴在金色的光輝中。

藉著受洗，倪柝聲站著宣告說：「主啊，現在我將世界丟在背後，你的十字架使我與它永遠的分開。並且我已進入你的裡面，我現在是站在基督裡。」他們心中充滿了喜樂的詩歌，回到聚會的大廳。

第五章 穿越和田

這時王載與倪柝聲更緊密地連在一起事奉，他們有著共同的負擔，就是將福音傳給城內的青年男女，當地的學校及學院的學生。繼續在街頭佈道，並且擴展到臨近的村莊。他們利用中國農曆年的長假，用一部分的時間來傳福音；一部分則用來聚集分散在各處的信徒，幫助他們靈性的增長。在造就的過程中，倪柝聲殷勤研讀主的話並結出果子，不久他顯出具有特殊的解經恩賜，常給聽者相當大的幫助。

當時王載的家裡有一間大房間，足以供給聚會之用，一些人便聚集在那兒禱告、讀經。1922 年的一個主日晚上，王載和他的妻子，倪柝聲以及他的母親，四人一起在王載家中擘餅紀念主。他們在這種沒有祭司及傳道人服事的聚會中敬拜神，得著喜樂與釋放，所以他們經常開始這種擘餅聚會。幾個禮拜後也有別人加入，包括繆紹訓、王峙、陸忠信、以及一位海軍退役軍官王連俊（與王家沒有親戚關係）。

1922 年底，有一位女士來福州佈道，她也是這故事中的重要角色。李路得（李淵如）姊妹是天津人，雖然身材矮小，卻心裡火熱，是當時南京學院的一位教師，她一度曾是頑梗不化的無神論者，同時也是陳獨秀所辦「新青年」的忠實讀者。她到南京就任政府的一所中學校長時，曾自誇說：「就是全世界的人都成為基督徒，我也永不相信！」她知道有些女孩們熱心宗教，便搜出幾個學生所讀的新約聖經當眾燒毀。然而有兩位學生與一名叫蔡蘇娟的兼課老師，一同為她的悔改禱告。有一次學校因為鼠疫而關閉，李淵如便與一些學生取道運河回他們的村莊。在這次平靜的旅行裡，當他們穿過初春的麥田，李淵如面對面遇見了創造萬物的神，一種新的饑渴在她的心中燃起，於是她私下偷讀聖經並得到滿足，最後她發現基督耶穌是她的救主。後來她辭去政府委派的職位，到差會工作，成為一位全時間的傳道人。

由於王載弟兄在南京悔改時，曾遇見過她，所以就邀請李淵如在他家參加四天的聚會。這是一次值得回憶的聚會，家中擠滿了男女老少，蒙神大大賜福。其中一位學生陸忠信也有了靈裡的轉變。他兩年來一直參加余慈度姊妹的聚會，心中渴慕遇見神，於是跟他們在一起追求，但他得救的確據，卻是在李淵如姊妹如火焰般的信息中得到的。其他的人也在這次聚會中遇見主。當這位元特別講員離去後，基於需要聚會再延長下去，所以當他們到街上請人進來聽福音時，便由王載、倪柝聲、王約翰幾位弟兄，每晚輪流向日漸增加的群眾傳講基督。

那年冬天特別冷，山頂上積滿了白雪，這情形在福建沿海是罕見的，人們都抱緊懷中的灰爐取暖。繆紹訓必須翻過海岸山脈回到五十公里外的連江家中，度短暫的假期。他回家不到一個禮拜，便接到倪柝聲的一封信，上面寫著：「緊急通知，神在此行了一件大事，我們需要你來說明，請速趕回。」雖然天氣異常寒冷，敵方的軍隊也在附近城鎮活動，繆紹訓還是立即冒險翻山越嶺趕回福州。

聖靈的工作，令他大為吃驚，許多男女學生為自己的罪悔改，並相信了主耶穌，福音大大地被傳開。因著聖靈所賜的喜樂，及謙卑的感恩洋溢在他們中間，倪柝聲也定意更新自己的奉獻，單單跟隨祂。他用「在地如同在天」這句話來描述當時的情景。

聚會每晚繼續，且大有能力。在學期間，每週末及下課後，都有聚會。青年們成隊穿著福音背心，手拿福音旗，宣傳「耶穌近了」、「來信主耶穌基督」。他們帶著樂器出去，召集群眾入內，聚會地方很快就暴滿了。日子過去，他們的熱心更為增長，並且需要更大的場地。於是這群青年就集資在青山租了一間屋子聚會，擺上粗制長板凳為座位，繆紹訓及倪柝聲則搬進去住，以便在課餘時間幫助慕道的人。每天晚上一群男生放學回來自己煮飯洗衣，然後出去傳福音。他們更有異象到鄉下作見證，例如，五月端午龍舟競渡的假期。當學校一放假，青年們便出發上路，人數大約有六十到八十左右。他們走過花岩石所鋪的馬路，穿過稻田蔗園，農夫都穿著藍布衫，無休止地踏著嘰嘰作響的水車，或跟在水牛的犁後，在深泥中操作。他們在路上或在休息的茅屋內，遇有識字的人就給他們福音小冊，各階層的人，從有知識的官員到苦力、軍人，都是他們交談的對象。這些青年都是經過「訓練」的，所以他們能應付各樣的聽眾。當他們到達所預定的村莊時，便在借來的教堂內住宿，騰出一個地方作為「不住禱告」的場所。並在這裡輪流維持二十四小時的守望禱告。晚上當農人從田裡回家時，他們便分隊出去穿過街道，請村民來聽福音。

繆紹訓認定倪柝聲是這佈道的策劃及領隊。因此當他站在唱詩的隊中，並幫助那些缺乏個人談道經驗的人時，他總是常常關心這些奉獻者的未來前程，並為他們的奉獻感到興奮。為這緣故，他堅決主張不傳福音時，要從事有計劃的聖經課程，使他們明白神的計畫，並接受來自神更高標準的訓練。

為著自己靈性的更新，他決定到白牙潭，參加英國女教士所帶領為數二十多位青年男女的查經班。和受恩教士帶領大部分的教導，她的服事從那時到如今，確實結出了許多果子。倪柝聲發現他自己越來越看重與她的交通與友誼。有一天他受邀參加那裡的禱告會，他發現她陷入與神爭執的痛苦中，神向她有所要求，雖她深知該如何做，但是代價卻是那麼大，她無法將自己擺上。他聽見她懇求主不要放棄祂的旨意。她說：「主啊！我承認我不喜歡它，但請你不要為我放棄這件事！」她所求只是時間上的問題：「主啊！求你稍候，我定會向你降服。」她如此的敬虔，以至於他認為這位傳教士是值得把自己的問題帶到她面前的人。

弟兄們之間的關係並不是沒有隔閡產生，由於向神熱心及奉獻，倪柝聲不能忍受一些不公平的事。他回憶說：「在早期的日子，我已定意不靠自己行事，因此看起來似乎長進得很快。那時有一位比我大二歲的同工，我們總是意見不合，不僅如此，我們的爭執都是公眾的事，所以我們爭論也是公開的，我就這樣告訴自己：『如果他一味地堅持，我就要反對，因為那是錯的。』但是儘管我反對，他決不更改。我一直在對與錯的判斷上與他爭論，而他總以年長的理由與我爭論。他在每件事上，皆以他比我大兩歲做為決定的理由，這事實在我無法反駁，所以他一直占上風，我非常不滿他的無理，心中也不

肯降服。」

有一天倪柝聲把他滿腹的牢騷，帶到和受恩教士面前，請她評論到底誰是誰非？但她是認識神的人，心中恨惡驕傲及嫉妒。她不管事情的對錯與否，而是安靜地回答：「你最好照他所說的去做。」倪柝聲完全不能接受，他抗辯說：「如果我是對的，為何不說他錯呢？如果我錯了，我便應該聽他的，我為何幾事都要聽他呢？」她回答說：「因為在主裡年幼的要服從年長的。」倪柝聲當時還是高中生，還不太知道自製，所以一再發洩自己的困惑與不滿，他反駁說：「聽從神是沒錯，但若是年幼的對，年長的錯，難道也要年幼的順從嗎？」她只是笑一笑，又說：「你最好照他所說的去做吧。」

這個癥結，使他們屬靈復興的日子蒙上了一層陰影。1923年春天，他們為一群重生的青年施洗，這對弟兄們來說，是一件很有意義的事。倪柝聲指出：「在一塊異教之地，任何人轉向基督，受洗的確是件嚴肅的事。」面對這種嚴肅的場面，他們因著他堅決的口氣，知道必有一些事要發生。他們中間有三人個負責此事：倪柝聲、那位比他大兩歲的弟兄、另一位比他大七歲。這次他到要看看，他們的討論如何進行，那位一直誇比他大兩歲的弟兄，是否也會順服比他大七歲的弟兄？他們聚會商討，但那位弟兄還是不順服，他否決了年長弟兄每樣的建議，最後他解散會議，還對他們說：「你們可以把事情都交給我，我一定會辦好。」倪柝聲心裡抱怨道：「這算什麼道理？」

這受洗大日的確是他們服事歷程上重要的時刻。有十八位青年，主要是男學生，很喜樂地在河邊，公開作見證表明與基督同死同復活。他們也向圍觀的群眾傳福音。受洗後，倪柝聲又帶著他的問題找和教士說：「我真氣憤，這位弟兄難道不明是非麼？」她是待已非常嚴格的人，所以她能耿直地對待別人，於是她站起來兩眼注視著他說：「你到現在還未看出什麼是基督的生命嗎？你不知道十字架的意義嗎？這幾個月中你一直堅持你對，你的弟兄錯。」她繼續說：「但你是否想到，當你論及這事時，你的心態是否正確？你對是非的判斷可能非常正確，但你裡面的光景如何？你裡面的生命難道不抱怨你的行為嗎？」自從揭露倪柝聲的光景後，她摸著了他的傷處。他啞口無言，因而不得不承認，按常理他是對的；但聖靈在他裡面，卻指出他的態度錯了。

和受恩教士常常用這種方式責備倪柝聲。但有一天她對陸忠信弟兄說出她的觀感：「倪柝聲將來會成為一位偉大的傳道人。」在他以後的年日，他一直受到和教士教導的影響。他說：「我永遠懷念她，她是一位發光的基督徒。每當我一走進她的房間，我立刻能感覺到神的同在。那時我非常年輕，有許多的工作計畫及腹稿等候神的批准，許多事我想只要付諸實現，必定會帶出奇妙的果效。當我帶著這些計畫到她那兒，試圖說服她，告訴她事情應該如何做。但在我未開口前，她平淡地說了幾句話，我便得了光照。我自覺慚愧，因為計畫全出於天然，充滿私意，但這兒卻有一個人單單為神而活。我不得不求神說：『主啊，求你教導我行走在这條路上。』」

大約這時，她介紹他看蓋恩夫人（Jeanne de la Motte Guyon）的傳記（1648—1717）她是一位法國奧秘派信徒。為了信仰被路易十四囚禁在巴士底監獄。蓋恩夫人在著作中提到默然順服神旨意的心志，使他大受感動，也深刻地影響了他後來的思想。這本書使確認看不見的事物才是永遠的。另外他從和教士的書架上看到像潘伯（G.H.Pember）、羅拔高特（Robert Govett）及潘湯（D.M.Panton）著名的末世論等著作，主的再來對他成為一幕真實的景象。所以他努力預備主的再來。陸忠信弟兄回憶當時他熱心地講解但以理及啟示錄兩本書，產生很大果效，他的聽眾從心裡燃起願付任何代價，以預備迎接主

的再來。

但他並非凡事順利。這時他清楚神的指示，在學院的假期中，他要到一個海盜出沒的海島上傳福音。他為此心中有很大的掙扎，但他非常看重這呼召。然而當他順服後，神卻沒有任何下一步的動作，經過長時間的禱告，他決定走一趟閩江口的一個海島。他很高興當地民眾樂意接待他，經過一番波折，他租下了一間房子，整修後，日用品也樣樣齊備。他這個計畫得到弟兄們的回應，並且有一百多人為他禱告，奉獻生活所需的費用。起初他的父母並沒有反對這事，然而他打點行李準備出發的前五天，他們突然介入，並阻止他前往。房子已經預備好，錢也付了，神的旨意在他的心中燃燒，他要怎麼辦呢？他的父母說：「不行」，而神也說：「要孝順父母」，在極度沮喪下他尋求神的帶領。神告訴他說：「是的，這事是我要你去的，但另一方面，當你照著自己的意思去成全時，我便不喜悅。現在我要你順服你的父母，所以你只有等候，讓我以別的方式為你開路。」令倪柝聲困惑的是，他沒有理由可以向人解釋他為何要改變計畫，名義上說他父母阻止了他，但是他說：「所有的人都誤會了我。」最令他難過的是，有人對他說：「這事以後讓我們很難再相信你了。」

他為這事曾思索了良久，並十分痛苦，直到有一天他讀到馬太福音，耶穌說到關於納丁稅的話：「……兒子就可以免稅了，但恐怕拌倒他們，……可以拿去作你我的稅銀。」（太十七 26-27）剎時間他感覺到（但）這字的份量，他明白了。甚至主耶穌自己也曾為了不叫被人拌倒，而容忍別人侵犯祂的自由。幾年以後，他才能在十字架的亮光中，客觀地解釋這個經歷。我們可能清楚無誤地明白神的旨意，但是祂為我們預備完成祂旨意的道路往往是間接的。「因著我們說『我們遵行神的旨意』，我們的『自我』便得到餵養，這樣會使我們認為：在地上不該有任何事擋在實行神旨意的路上。然而有一天神允許有一些事攔阻我們的道路，為著就是要對付那中態度。就像基督的十字架一樣，它不止除去我們的自私念頭，也煉淨所有的事物，包括出於我們向主的熱心及愛心，這真是叫我們最難以領受的。」那時他真是受不了了，他感到對他父母的憤恨，並且大大地埋怨，經過一段時間他才能領悟並勝過這些事。

他問和教士能否借他關於「十字架」信息的書，她說：「有的」，她雖然有兩本，但她現在還不想借給他。她寧可再等一些時日，等他成熟到可以理解時，才借給他。他說：「我當時無法明白其中原因，我渴望得到這兩本書，所以用詭詐的方法從她那兒問出了書名和作者，而不讓她察覺我的意圖，然後寫信給賓路易師母，她就把這兩本書當作禮物送給我，還寫了一份鼓勵的信呢！一本是十字架的道路（The Word of the Cross），另一本是加略山的十字架（The cross of Calvary and its Message）。我非常仔細地研讀，雖然得到一些幫助，但也有些失望，因為這並沒有解決我最大的問題。」由此發現很快地給自己想要的 answer，並不是神的方法。

1923 年第二學期的最後一個月，學校因罷課而停止，陸忠信和四位弟兄趁次機會受浸，見證他們與世界斷絕並與主聯合。陸忠信的經歷是一個很好的榜樣。他的一位極具地位的叔叔非常憤怒地從古田趕來，他自己是屬安立甘宗派的，深怕陸忠信的受浸會使他喪失了進聖約翰大學的機會，便慫恿他打消此念。但陸忠信答道：「我為自己的罪向神悔改，我很平安。」當他表明自己的態度時，他的校長認為他神經錯亂了。三一學院是學生進入政府幾教會機構的門路，對男同學的前程有舉足輕重的影響。校長問說：「你的意思，就是不想再深造了？」他激動地回答說：「是的，我要傳福音。」校長為此大

感困擾，深怕倪柝聲的影響會在學生中產生一股分裂的力量，校長說：「你再回去禱告，三天以後再來找我。」但陸忠信回來後仍不改變，他說：「我已經決定，單單事奉主耶穌，終生不反悔。」

有兩名男同學與陸忠信一同讀完一年的課程後，他們進了海關機構做事，而陸忠信則去白牙潭和教士那兒。兩位英國傳教士知道神在這幾個月裡大大地聽了她們長期的禱告，心中都充滿了讚美。和教士便邀他一同幫助那些前來尋求教導的青年弟兄，而另一位同工則照顧姊妹。陸忠信在那兒有六年之久。

這時倪柝聲與王峙正值三一學院的最後一年，他們被分到較大的班級。整個冬季在學院裡，傳福音的火一直在他的心中燃燒，弟兄們每天有三次禱告會，一次在清晨，兩次在晚間。在城裡的傳福音行動也同樣興旺，王載和王連俊每天晚上在租來的小客廳裡傳福音。主日崇拜連帶掰餅現在成為例行的服事。同時，倪柝聲也花時間，幫助剛得救及青年同工們靈程上的長進，甚至為他們發行幾期油印的復興報，其中也編寫他的查經心得。新春聚會在二月間舉行，春假福音隊再次進入鄉間。第二學期受到洪水影響，水勢在古橋低矮的橋墩下造成一股急流，給河邊住戶帶來了霍亂和瘟疫，但他們尚能順利完成他們的學業。畢業考試中王峙得了第一，倪柝聲則緊跟在後，事實上他們可說並列前茅。

這時倪柝聲二十一歲了，畢業時他穿上祖母給他買的價值十元的長袍，這位廣東老婦人雖然言語刻薄，現在已快樂得與媳婦和好。不過最值得他高興的是在過去一年中，神在學校、城裡和周圍的鄉村得到二十幾位信徒，許多同學在學期末，為此一同聚集獻上感恩。

第六章

信心的試驗

這些年間，張家時常從天津回到福州，張傳官現在被聘為基督教宣道會的牧師。他們和倪家仍維持很好的友誼。當時嚴緊的社交風俗正逐漸鬆弛，所以成長中的青年們能自由交往。因此，這段交往使倪柝聲對他童年的玩伴張品蕙萌愛意，因她既聰慧有貌美非凡。

然而倪柝聲已找到了救主，並且承擔起一項極有展望的革新工作。不單如此，他已決定畢業後步上陸忠信的後塵，做一項特殊的選擇。他不願進入聖約翰大學，也不願接受其他更高、更正式的教育，而要用一生從事宣揚耶穌基督的工作。這中抉擇對他的影響極其深遠，並且顯明這是出於他自己的信念。

當時，他察覺到張品蕙在他心中，佔有相當的份量，雖然他們尚未論及婚嫁，但這中想法佔據他的心，可是他們第二次的見面，使他死了這條心。他向來懼怕的事，在他們短短的談話中，都一一呈現出來。她充滿了對世俗的愛好，喜歡追求時髦的服飾，而且沉迷其中，她無法與他分享他對主的愛，這愛在倪柝聲的抉擇中是居首位的。她有自己的目標，渴望得到世人認為的成功，而這中成功是他早已丟棄的，很顯然地，他們是各奔一方了。

有一陣子，他不敢面對這個問題，直到有一天他讀到詩篇七十三篇 25 節：「除你以外，在地上我

也沒有所愛慕的。」神的靈抓住了他。「你在地上還有一個錯誤的愛慕，你必須放棄對張小姐的戀慕。她有什麼資格成為傳道人的妻子呢？」他的回答似乎有向神討債還債的企圖。他說：「主啊，我願為你做任何事，即使要我將你的福音傳到偏遠邊疆部落，我也願意去，但只有這件事我做不來。」那時他剛滿二十一歲，怎能叫他從心裡捨棄曾如此愛慕的人呢？

於是他把自己投身于福音工作上，許多福音的門向他打開。在福州的新年聚會後，他到鄉村工作，特別是教導初信者，在這裡他很快學到一些新的功課。他說：「在我得救一年後，我有一種講道欲，要我沉默不語是不可能的。好像在我裡面有一些東西催促我不得不向前，傳道成了我的生命。」他受過良好的教育，又熟讀聖經，所以很自然地以為自己應能勝任此中教導鄉民的工作，特別是其中的婦女們大多為文盲。經過幾次的探訪，為要堅固她們的信仰，反而使他的自尊大受挫折。他發現這群婦女雖不識字，但對主卻有相當親密的認識。他說：「我知道她們讀經並不流利，但她們卻認識聖經所論到的哪一位。」因此他開始學習謙卑，但他的熱心未嘗稍減，而且深刻學習到結果子神聖定律：「離了我，你們就不能作什麼。」(約十五5)

這時，他學院獎學金停止了，也沒有找到其他工作，他開始面對在物質供應上仰望神的功課。他從兩位英國傳教士的書架上，看到喬治慕勒和中國內地會戴德生的信心事蹟，他受到很大影響。這些人憑信心依靠神充分供應在工作上看得見、摸得著的需用，顯出他們對未見之事的信心，而近在眼前的和教士就是一個活生生的例子。她還在英國的時候，有一位忠心的猶太基督徒勉勵她：「若是神差遣你，祂必負責」，自此就沒有接受任何保證的支持。倪柝聲知道她會用到剩下最後一塊錢，但神卻從未失信過。1923年她曾告訴弟兄們，她為著擴展在海關附近的工作，需要一棟十個房間的旅館而向神禱告，她不知道這個需要將從何處得到供應。叫倪柝聲大為驚訝的是不久之後一所臨近的工業學校關門了，神給她二十個房間，只要她付些租金。

這樣的信心是很具影響力的。有一次週末，在倪柝聲的家裡，有一位朋友口袋裡僅剩兩塊錢，而禮拜一早晨他們卻需用一百五十元，當時郵船禮拜六及禮拜天不開，無法等著湊齊全數。當他的朋友把這事交托給神之後，便出去傳道。他遇到一個人提醒他尚欠一塊錢，他就付了一塊錢。還存在他口袋中的銀幣就顯得更為寶貴。後來他又碰到一個乞丐，想要它他兌換成銅錢來施捨時，神卻制止了他，他就把整個銀幣給了乞丐。當這塊錢施捨出去後，神的及時恩典就進來了。他回家睡的平穩，禮拜一早晨他意外收到有電報匯來的整整一百五十元。

對倪柝聲而言，這條屬靈的定律「你們要給人，就必有給你們的」，已成為他生活的準則。他相信，只要願意關切別人的需要，那麼神必親自照顧我們一切的需用。不但如此，他堅持絕不向旁人透露自己財務上的需要，即使朋友們不知道他的貧窮，而誤以為是富足，仍舊如此守密。不單如此，除了偶爾接受短暫的款待外，在神的事工上，不該「從外邦人支取分文」，如此就可避免把主放置在受惠與罪人的地位上。

很快地，他把這些原則付諸試驗。倪柝聲有一位同學魏光禧，早年離開三一學院，就讀于金陵大學，現在賦閒在建甌的家中，他父親是那兒行道會醫院的醫生。建甌位於福州上游約二百四十公里處，深山環繞，諸水淮流，是造紙工業的中心及內陸交易的商場。倪柝聲接到當地差會寄來主領一連串福音聚會的邀請信。他清楚覺得主必供給他費用，禱告之後，他就打電報回復了：他決定在禮拜五出發。

問題是如何到達那裡？當時他手頭上只有三十幾塊錢，而乘汽艇的費用最少也要八十塊錢，更糟的是，他知道有一位在福州的弟兄，比他更急需財務上的供應。禮拜四，神提醒他這件事，他知道必須有所行動，於是在十分掙扎中，經王載轉手給那位弟兄二十塊錢的奉獻。

次日早晨，在倪柝聲離開之前，沒有人為他奉獻什麼。他帶著僅存的十塊錢擺渡到碼頭。那時，他在絕望中禱告：「主啊！我現在不向你要錢，只求你把我帶到建甌！」到了棧橋，一艘小汽艇的船主跟他打招呼，問他說：「你要去南平還是建甌？」他答到：「去建甌」「那麼跟我來，我會帶你去。」「要多少錢呢？」「只要七塊錢。」他大為驚訝。在攜帶行李上船後，他問明原由。才知道這艘船已經租給了當地政府官員，但船主可以把雇主多出來的座位，出讓給旅客以便賺一些小外快。因此倪柝聲在這長途的航行中，可以不為盜賊所擾，也不必為航程中經過無數的稅關，如水口、南平等等，延誤了行期。

這真是一次美好的旅行，起初是穿過丘陵起伏、土壤肥沃的鄉村，山坡上栽滿了叢叢的龍眼、荔枝、柚子和綠色、金黃色果子的橘子樹，倪柝聲從小就愛吃橘子。提起橘子，他帶著見識廣博且自傲的口吻說：「我覺得世界上再沒有其它地方的橘子，能比得上福建出產的。」接著溯河而上，松林山嶺近逼眼前，其間佈滿凸岩，浮木漂在漩流的河中，汽艇在突出的巨岩下，沿著蜿蜒河道軋軋作響緩慢地駛向目的地。

在建甌，倪柝聲足足傳了兩個禮拜的福音，神的話語釋放出來，非常激勵當地信徒，但他口袋裡只剩一塊兩角錢。他的信息深受眾人歡迎，他的朋友魏光禧得到屬靈的復興，並更新了向神的奉獻。在最後送別的筵席上，副主教腓利杭克(Archdeacon Hugh Phillips)把這位年輕的傳道人拉到一邊，這位主教在傳福音方面，有不少的經歷，並為福音經歷許多生命的危險。他說：「我們從你的講道上得到許多幫助，我們可以分擔你一些費用嗎？」倪柝聲急忙回答說：「不，我沒有缺乏，我的需要已有預備。」老實說，接受傳教士的幫助，會令他不安。他確信，神會在祂自己的道路上供應他。但是次日許多新朋友為他送行時，他往河邊的途中不禁地禱告：「主啊！不能只帶我來到這裡，卻不帶我回家啊！」就在半路上，一位信差趕來，遞給他一封從那位傳教士帶來的便箋。上面寫著：「雖然有別人付你費用，但還是請你收下我這老弟兄的一小份吧！」他確知這是出於神的手，所以他手下這份為交通旅費的奉獻。事實上他收到的遠超過所需用的，因為同一艘汽艇正停泊在河邊準備回航，而且空出同一座位索取同一船價。他興奮地坐船順著閩江急流而下，心中滿有平安。回到福州後他發現，在他出發前的奉獻，真正應付了弟兄當時的急需。這是一次令他永難忘懷的經歷。此後他確信神的方法並非「積蓄就必富足」，而是「你們要給人，就必有給你們的，並且十足的升鬥，連搖帶按，上尖下流地倒在你們的懷裡。」

然而在南台，倪柝聲和租用民房來傳福音的同工之間，關係有了變化。年長的弟兄王載、王連俊及少數支持他們的弟兄們，要他離開他們的團契。造成這種結果的詳情未可盡知。誠然，倪柝聲到海盜出沒的海島傳福音，後來卻失信那件事曾叫他們失望，但也不至於產生這種反應。

在倪柝聲尋求福音工作有新的突破時，他回到起初的根基上。他看見神才是祂自己一切工作的真正發起人，同時祂也是此工作的終極目標。但工作的過程又如何呢？照一般說法，祂也是此事的執行人——一位全權執行人。他覺得這是基督徒最容易忽視的一點。他的看法是這樣：「當我們看到一個十分聰明，口才流利，精力充沛並善於治理的人，我們就會說：『如果這人能為基督所用，那是何等寶貴

呢！」但這種看法也就等於說，工作必須源於神也是為著祂的緣故，但其過程卻可以藉人的力量來完成。」雖然福音的熱心在他心中燃燒，使他不能稍停片刻，但耶穌的話一直出現在他的腦海中：「子憑著自己不能做什麼，惟有看見父所做的，子才能做。」(約五 19) 神對保羅所說的話就再也清楚不過了：「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軟弱上顯得完全。」(林後十二 9) 這種事奉理念(福音工作的三要素)，成為他後來在屬靈成就上的主要泉源。

在春節前夕，倪柝聲試著把這種看見傳遞給信徒。他以舊約的事蹟來解說，用『以色列的約櫃表明神的見證』為主題，提醒聽眾：在耶利哥因著約櫃的出現，使該城倒塌；往後，以色列人挫敗的日子，祭司的事奉仍在示羅執行，即使是神同在的約櫃漂泊在外時，它仍然挫敗那些擄掠者。倪柝聲的問題是：今天神如何興起聖工，與所能託付的工人呢？

為了答覆這個問題，倪柝聲指出約櫃的內容：法版、盛嗎哪的金罐及亞倫發過牙的杖。亞倫的杖放在其中，為的是紀念一個黑夜及復活的早晨，他相信，這杖給予神的僕人暗示出一條多節果子的道路，我們要成就神的工作，不僅僅是求神為我們開傳道的門，並賜下更大的機會而已，當一些超過我們所能承擔時，我們也得時常為著新生命(木杖發芽所預表的)的流露而忍受黑暗的夜晚。當耶穌親自掛在十字架上的時，復活的生命才得完全表露出來，況且僕人是不能大過主人的。

這些心得曾刊載于他所編輯的不定期刊物上，其中有一期的費用，是從建甌腓利副主教的奉獻中支付的。他並不是用仔細的編校來彌補在講道上過分的論調，而是由於他在服事上太傾向安靜等候之故，引起了弟兄們的反對。他們中間除了看法的差異外，還有一些外在的壓力，這時城裡的反基督教運動正達到高潮，差會圈子裡有一些人不贊成學生的見證，而採取不妥協的態度。很少人能否定王載及王連俊兩位海軍軍官奇妙的悔改，及屬靈的生命，像這麼有抱負與異象的人應該『加入』其他教會的建造。事實上，王載後來在上海接受了傳教士的按手，正式接受了聖職。相反地，倪柝聲則顯得有些固執及歧異的立場，況且大家這時對任何造成外面混亂的因素都非常小心，一些學院裡的同事，已試圖禁止學生參加奮興聚會，而且至少有一位傳教士將倪柝聲貶為『惡魔、大眾的騙子』，這句話也許可以代表當時一般的看法。

由於以上的因素，王載及王連俊等人，要求倪柝聲停止和他們一同崇拜，不久許多人對這中決定感到遺憾，後來大多數人決定翻案，其中一個人看出來說：「我們做了一件傻事，可能是我們的嫉妒心作祟，因為倪柝聲的恩賜，比我們中間任何一個人都要明顯突出。」雖然有一陣子保留了他的講臺服事，而他卻為少數弟兄中間無法彌補的裂痕，感到極其憂傷。

後來倪柝聲下到馬山，到羅星塔島及馬尾之間的村莊，在那兒租了一間小茅屋，窗口面對渡口。這間茅屋成為他旅行佈道的基地，他在這裡開始研讀聖經，認真地編輯他曾發行的實驗性刊物，其間也有一兩位青年留下來與他交通，而陸忠信弟兄就在對河不遠的百牙潭。

大約這個時候，有一位行道會醫院當醫生的李小姐，到河的下游來找倪柝聲，她領養一個名叫國清的男孩子，但國清卻讓她非常失望。國清現年十六歲，被學校退學，在絕望中她帶他到馬山，請倪柝聲幫忙。因此倪柝聲將他接回來，花時間教他聖經，不久這個孩子完全轉變過來，孩子的母親及家人因這孩子生命與行為轉變的見證大為喜樂。

一九二五年一月，接近農曆年，按慣例福州春令聚會正要舉行，許多城裡、城外的信徒將要前來聚

集。這年王載送信給倪柝聲請他不要來，因為爭論的焦點正好落在他身上，如果他不在，他們比較容易進行。

倪柝聲接受了這項要求，但此事影響了他在基督裡的平安，使他陷入極深的沮喪中。當他難以忍受時，他渡到對岸海關去尋求和受恩教士的安慰。他大聲申訴：「事情居然演變到這地步」，並將大致內容告訴她。她很輕淡地回答他，以默然的態度，對正在愁苦的他表示同情。

其次，他發現陸忠信雖然仍忠於福州年長的弟兄，卻因為他與同工間的分裂深感憂傷，他們便一同禱告尋求神。倪柝聲認真地衡量從各方面來的批評，並謙卑地將他的問題擺在神的面前，儘管這一年來，他們的見證使許多人悔改重生，難道他還有不討神喜悅之處麼？他曾在態度上順服弟兄們嗎？當他們禱告之後，心裡得到清楚的答覆：「把問題交給神，繼續去傳福音吧！」

這時，剛好陸忠信的養母，正在梅花村做接生婆。此村位於羅列島海灣的南岸外，此地處在異教黑暗籠罩下，百姓對福音完全不知曉。陸忠信與倪柝聲和另外四位弟兄準備利用假期向村民傳講基督，後來又有一位剛信主得救的李國清也加入，人數增到七位。

他們先寫信給一位三一學院的老同學，他是負責那兒學校的老師。但是，黃昏時分，當他們在梅花村上岸後，他卻拒絕他們使用學校空地做為傳福音、作見證的場所。後來他們在一位好心的草藥商的樓上，鋪草架板為床，找到了落腳之處。

最初幾天，漁夫和農民們忙於例行喧嚷的慶典：如拜拜、吃齋、祭拜祖先、賭錢、放煙火、施捨及第四天的祭拜家中諸偶像，因此，不聽福音是不足為奇。但是到了第九天，他們仍對所傳的福音沒有反應。年輕的李國清大為灰心，他詢問群眾：「這到底是怎麼回事？為什麼你們不信呢？」他們說這是因信奉名叫「大王」的偶像之故，並且占卜定在十一日舉行賽會。他們堅稱過去二百八十六年來，「大王」所選定的日子都是陽光普照。倔強的李國清向他們揚言：「那麼我跟你們說，我們的神是真神，十一日必定下雨。」聽眾被這句挑戰的話楞住了，他們說：「不用多說，如果十一日下雨，那麼你的耶穌就是真神，我們就要去聽祂的。」

倪柝聲尚在村落的其他地方傳福音，而這個消息像野火般地傳開，當消息達到他的耳中時，他大為戰兢。神的尊榮似乎被置於賭注中，他們深怕過去並未全然信託神，他可能不原幫助他們。（他知道，他們七位都要負起責任，不只是李弟兄一個人）。但神若不支持這件事，他的福音就無法在此海島傳下去了。難道他們犯了罪麼？他自己省察，並把它擺在神的面前有幾天之久。難道他們現在就要離開此地，而讓「大王」掌握下去麼？他們回到寄居所在，極其謙卑、戰兢地尋求神，準備接受祂的責備。

有一句話臨到倪柝聲：「以利亞的神在哪裡呢？」有了如此清楚的確據，他們知道十一日一定會下雨，他們便出去把這項挑戰傳開。

那天晚上，他們的房東提醒他們，村民確實有此經歷，「大王」的確是保守這地平安的土地神，他真的保佑那些拜他的人不生病，莊稼不遭天災，他們的婦女生產平安，因著這些信眾的熱心，他相信賽會的日子必是萬里無雲的晴天。不止如此，房東告訴他們，這些漁民都是經年累月在海上謀生，他們多少都能精確預測出未來幾天的氣候。聽到這裡，弟兄們就更認真、專注地為下雨禱告，於是神應許的話：「以利亞的神在哪裡呢？」又在他們耳邊響起。次日，他們渡到鄰近一個海島——即前此倪柝聲未能成行的海盜窩——在那兒立刻有三家人轉向基督，並當眾焚毀偶像，當晚他們很遲才回來，雖

然疲倦，心靈卻很喜樂。

次日早晨他們起得很晚。倪柝聲說他被閣樓上小窗戶照射進來的陽光曬醒了。他叫了起來：「沒有下雨！」已經過了七點鐘了。他起身跪下禱告：「主啊！求你為我們賜下雨來！」但是那句「以利亞的神在哪裡呢？」再度響在他的耳中。他順服下來，默默地走下樓，最後他們坐下來吃早餐，七位弟兄和房東都一語不發。這時天空無雲，但他確信神已應允。正當他們低頭謝飯時，倪柝聲說：「我看時候到了，現在一定下雨，我們可以把這事帶到主面前求祂紀念。」他們如此默禱。「以利亞的神在那裡」的確據再度臨到他們，然而這次卻不帶著責備，甚至在他們還沒有說出「阿門」之前，他們就聽到幾滴雨落在房頂上。他們一面吃飯，雨勢一面增大，當添第二碗飯時，倪柝聲大聲說：「讓我們再一次獻上感謝！」並且他求神賜下更大的雨。當他們吃第二碗飯時雨水傾盆而下，他們吃完早飯後，街上積水已漫過草藥店大門的第三個臺階。

初下雨時，一些年輕的村民已先得到開啟，並公開說：「有真神了！大王不再是神，這雨把他困住了。」但他的信徒不肯甘休，他們把轎子抬出來，確信他能化解大雨。然而大雨傾注，才走了幾步路，抬的人便滑跌在地，大王也隨著跌下轎椅，斷了左臂傷了下鄂，他們急速把他修好，仍然把它放回位上。在梅花街的半路上，他們一路跌跌撞撞，半拖半拉地前行。村裡一些六十歲到八十歲的老人，因著他們相信大王出會必是好天，沒有帶斗笠及傘，落的狼狽難行。遊行停止了，偶像被抬入一間祠堂裡，重新卜卦後得到回答，說：「今天的日子錯了，出會應該是十四日下午六點。」

聽到這樣的消息，弟兄們立刻確信神必再次行事。他們在禱告中向祂祈求：「主啊！求你十四日下午六點下雨，在這四天裡給我們好天氣。」當天下午天氣轉晴，並且他們也有真心願意聽福音的群眾。在短短的三天內，神在梅花村賜給他們三十幾位真心悔改的人。十四日天亮時，又是一個好天，他們繼續有一些聽眾。

當黃昏來臨時，他們在約定的時刻聚集，把這件事帶到主前求主紀念。不到一分鐘，神的答應到了，暴雨及洪水一如從前。撒但藉著偶像所顯出的權勢已被打破，「大王」再也不能成為靈驗的偶像。第二天，他們的日子滿了，因為有些弟兄要上班必須離開，由於這些島嶼是某一差會的工廠，他們保證接下跟進、造就悔改者的工作。後來倪柝聲回顧那次的事件，使他藉著經歷得到了許多屬靈的功課，當時這件事的發生確是最好的時機，讓他及同伴們大獲信心，當他們緊緊地依靠神時，祂必負責處理其餘的事。

第七章

海外工廠

從倪柝聲的馬山「臨江茅屋」往外眺望，深水碼頭外景色宜人，河道中的江舟及遠洋輪船往返穿梭，逆河而上有馬尾船及海事學校。下游在羅星（流星）島面對灣處有高三十公尺的塔，碼頭是因塔而取名。閩江的兩大主流，經十一公里的南台島在此匯合，其水流在河道中造成深泓，可容大貨輪在江中

停泊。沿山坡而上的梯田幾乎高達山頂，其坡度甚陡只可供矮小樅木成長。運貨的舢板和駁船來往頻繁，甲板上汗流浹背的苦力「嗨啣！嗨啣！嗨啣！」帶韻律的吆吧聲，與海鷗的叫聲相呼應。

這兒生活簡樸，倪柝聲從二十二歲到二十四歲都以此為根據地，這裡也成為他的過渡期，亦是屬靈生命極大長進的時期，這時他開始為自己訂下目標。記得在求學時，有一回他學騎腳踏車時曾打定注意，只要把兩眼定睛在把手上他就能騎得正，不料到了小街上他老是撞到牆壁並把指頭碰傷。後來有一位元騎車的朋友指出他的錯誤：「你要向前看路，兩眼定在前頭的馬路。」如今他也想把這原則運用在神的工作上。

他看到自我裝備的需要，於是定下嚴格的學習課程。他明瞭傳道人本身的重要，不下於他傳講的信息。他看見這點就知道神必須先在他身上作工，才能透過他來傳講信息。這段時間，倪柝聲的健康情形不佳，常常為咳嗽所苦，即便如此，他仍專心於研讀聖經並廣泛閱覽書籍，如：阿福德（Alford）及衛司可（Westcott）的解經，路得（Luther），諾克斯（Knox），約拿單愛德華（Jonathan Edwards），喬治懷特菲（George Whitfield）及大衛布萊納（David Brained）的生平。身體健康時他就從事遊行佈道及編輯「復興報」，它是一九二三年出版的小型屬靈報紙。其內容是他自己的解經，加上選擇西方屬靈作家的翻譯作品作為補充資料。「復興報」是非買品。免費分送給一切索取的人，他的出版是不定期的，因為神是以零星小額的奉獻來供應他。由於它有效地傳述了神在基督裡救贖的目的，這份小型雜誌不久便廣傳各地，也帶來許多個別見證及講道的邀請。

同年，倪柝聲的親戚帶他去上海探訪。在那兒他得知張品蕙在天津的消息。雖然他們已分手多時，但他的心仍然惦念著她。他得知她在濟慈學院表現出色，有希望能由此進入北平的燕京大學。當他聽到她仍然衷於社交活動，更加深了倪柝聲一個信念，如果他要完全跟隨主，就得放棄對她的想念。他憂傷地把她從自己的思念中抹去。他進入屋裡跪下，將這事交托神，然後寫下一首「主愛長闊高深」的詩：

主愛長闊高深，實在不能測度；
不然，像我這樣罪人，怎能滿被恩澤！
我主出了重價，買我回來歸祂；
我今願意背十字架，忠心一路跟祂。
我今撇下一切，為要得著基督；
生也，死也，想都不屑--有何使我回顧？
撒但，世界，肉體，時常試探，欺凌；
你若不加小子能力，恐將貽羞你名！

有一天早晨，倪柝聲在上海讀到耶穌的話：「我也必須在別城傳神國的福音，因我奉差原是為此。」（路四 43）不久他接到母親打來的一封電報：「我應邀到馬來西亞傳福音，你有空陪我去嗎？」

原來大約一個月以前，和平在一位朋友生日宴席上，遇到一位從馬來西亞來的陳姓客人，他正陷於道德的泥沼，顯然有屬靈上的需要。她覺得主對她說：「我曾向撒瑪利亞夫人講道，你也去把生命之道講給他聽！」顯然他曾聽過倪家母子奇妙悔改的故事，當她向他作見證時，他就急切地為自己的生命呼求神。現在他從霹靂洲（Perak）的錫他瓦（Sitiawar）寫信給她，問他能否到錫他瓦的教會向他們講

道？因為教會中有幾位聽見他找到了在基督裡的救恩。他願付所有的旅費，並由他姊夫幾姊姊林提康（譯音）夫婦接待，他們是一對虔誠的基督徒。和平把這件事擺在主面前，主給她路加福音一句話做為憑據：「我也必須在別城傳神國的福音」，有了這個印證（確據），她打電報給上海的倪柝聲叫他與她同行。

他們路過新加坡、怡保來到錫他瓦，受到林家熱情的款待，而美以美教會卻相當的冷淡。牧師說：「一個月以前有兩個美國人在此舉行奮興會，我們為了請人聚會付上了很大的代價。第一天有三百多人來，第二天六十人，第三天只有十二人。現在情形更難，所有的人都去橡膠園割樹乳，除了主日以外沒有別的時間來聽道。」

第二天晚上他們到教堂時，只見大門深鎖，他們找到了牧師，發現他正在核算白天所割下來的樹乳，他不得已解釋說，他忘了聚會的時間，他們默然無聲地取了鑰匙，開了門，開始用借來的掃帚清掃屋子，有一位印度信徒站在街上請人進來。起初人數少得令人洩氣，直到倪柝聲提到他個人的見證，說到路加福音上「我必須傳道」的那句話時，才有轉機。這時林和平才知道這次神用同樣的一句話呼召他們前來事奉。他立刻得到鼓舞，就更釋放及火熱傳講神的道。許多人流淚悔改，承認他們的罪，脫離許多惡行。人數一直增到三百以上，其餘的則站在窗外聽道。過了十六天，牧師怕信徒過分激動，覺得聚會應該結束，然而在林弟兄邀請下，他們繼續有一段時間在家中查經，給初信者在神話語上的造就。離開錫他瓦之前，倪柝聲打電報給陸忠信，請他來此繼續造就工作，而早在幾年前陸弟兄以感覺到神要招呼他到馬來西亞及印尼事奉。

在這幾個禮拜裡，倪柝聲的母親覺得在林家過得很舒服，特別是與林家大女兒愛倩在一起，她是一位很有前途的年輕基督徒，林和平心中覺得這個女孩與她兒子非常相配。她向愛倩的父母提起此事，也告訴她那個性溫良的丈夫，但幾乎沒有問過倪柝聲的意思。這事以後，由於他們在馬來西亞還有別的邀請，所以兩家再又見面和平要急切地促成此事，忘了她年輕是痛苦的經歷，而倪柝聲卻因礙於孝道不便違抗。終於在一次小型宴席上，兩家交換信物宣佈訂婚，這時倪弟兄內心立刻感到極度的不安。正當他和母親還在新加坡等後回家時，有一位學校老師設計陷害林小姐，便告訴倪柝聲一段相當逼真的故事，來譏諷她的人格，他並不願信以為真，但這件事給了他一種遊移不定的感覺。因此事關係到神在他一生中的旨意，他唯恐走錯一步。他有幾天在痛苦中禱告著，在神面前權衡應該怎麼做，最後，當他們抵達上海時，他告訴母親神攔阻這門親事。他一面勸母親歸還信物；一面自己寫信給林家，很禮貌的解釋他的處境。他的母親很難接受，因她早已將愛情視如己出。後來當他們被伯特利醫院石美五醫生請去講道時，母子間呈現緊張的氣氛。不久和平被邀到中西女塾作見證，此時她憶起求學時期所遭遇不和心意的訂婚事件，她透析此事時開始站在倪柝聲的立場來看待這事。因此在她坐船回福州的路上，她已預備好承認她可能把這事做錯了。

倪柝聲的講道所以能吸引人，主要是他有恩賜能將「神的道路唯獨行在基督所完成的工作上」，講得非常清晰。太多的基督徒都是努力追求靠己行善的救恩，這種方式幾乎跟佛教的道理沒有差別，對他們傳講新生命乃是神白白的恩賜，使他們感到驚訝及新奇。倪柝聲對福音的認識不止於因信稱義，他也從慕安得烈(Andrew Murray)及邁爾(F.B.meyer)的著作中認識到從罪中得釋放的成聖生活，這對他有很大的幫助。他也閱讀芬尼(Charles G. Finney)和依文羅拔士(Evan Roberts)及1904年至1905年的威爾

斯大復興，同時他也考察司達克梅爾（Otto Stockmayer）及賓路易師母（Jessie penn-Lewis）有關魂與靈，及得勝撒但權勢方面的作品。而她藉著新約的自修，證實了這些有偉大經歷之基督徒的著作，需要透過簡單的詞句，向與她在一起的信徒說明。

這些題目出現在他的講道中，一年以後也被刊在雜誌上，而且內容獲得福建各地及其他地區讀者熱烈的回應。無疑地，這些信息使他殷勤研究，加上敏銳悟性的結果，但他仍然覺得需要得著親身的經歷。由於年輕人的熱心，不久他便起意撰寫一部有關基督徒屬靈生命之概要，信息的內容多數是他所讀到而令他感到興奮的，也是周圍差會的教會所未曾講論的。他很樂意被人邀請去講道，原因是他要告訴聽眾，僅僅得到赦罪和得救的確據是不夠的，因為這不過是個起點，還必須認識復活的救主——就是他的生命，這樣他才可能在行事為人上討神的喜悅。

每次倪柝聲主領聚會時，會眾皆聚精會神地聆聽，因為他給那些以為福音不過是給信徒一個天堂的應許，而對他們生活中所遭遇的患難，並無所助益的聽眾一些新鮮的觀念。他以「接受了救主，而後把救主置諸腦後，照著世人的方式過自己的生活」的理論來解釋，為何許多掛名的基督徒家庭裡，孔孟思想是與聖經佔有同樣的分量。

這中生活與新生命結果子的生活差異何其遠！它留給內住聖靈的地位也太少了，而聖靈卻是學習真理之人的導師，也是倪柝聲日漸更多依靠的。有一天他遇見了一位謙卑的陳姓裁縫，幾個月前他撿到馬可福音的最後幾張聖經，這人未成接受過任何基督徒的教導，也未向倪柝聲問過這些經文的可靠性，然而他卻選擇了十八節有關醫病之事，做為基督徒最起碼的神跡論據，出去到村裡尋求印證。後來在鄰舍一次奇妙痊癒的結果中，他得到了信念，就回到裁縫店那兒忠心地為基督作見證。

諸如次類的經歷卻幫助倪柝聲解決了一件向來困擾他的問題。他說，早年他很怕碰到無神論者及高等批判學者，因為他們會向他證明聖經可疑之處，使他因此失去信心，如今因著別人和自己的經歷，並且面對面遇見了活的基督，他知道自己已經得著了答案。面對他們所有的辯論，他都能從容地回答：「是的，你所說的也許有眾多理由，但是我認識我的神，這就夠了。」

在另一個村子裡，一位初信的農夫碰到麻煩，他的稻田是山坡上的梯田，正在灌溉管道的旁邊，他辛苦打上來的水，一再被山坡下面的農夫偷去。他的鄰舍趁著夜晚鑿開田埂使水流到自己的田裡。這位農夫在灰心中，來到教會弟兄們那裡申辯說：「這不公平，在這種情形下，我該怎麼辦呢？請你們告訴我。」他們和他跪下來禱告，而後有人建議他試著「走第二裡路」。他們說：「如果我們只做應該做的事，那麼我們畢竟都是無用的僕人，我們必須越過僅僅對的事。」所以第二天他帶了木槽和「龍脊骨水車」再去打水。這個早晨他先為下面鄰人的兩畦水田打水，下午才給自己的田打水。

鄰舍為之啞口無言，經過一番思考，就去拜訪這位基督徒農夫，並十分真誠地要明白其緣由，不久這鄰舍也飲於生命之道的活水。

倪柝聲就是在這種對神和祂話語的熱誠中，被呼召來栽培及服事。這裡的人們對神的話都是相當認真，並顯出重生聖徒真實的交通。在此，他也看到基督在地上教會的實體，及祂的靈向外邦人作見證的工作。每一位神的兒女都應該具有此種令人轉變的福音見證能力，每一群弱小的團體都應該認識神是他們敬拜及見證的中心，如果神的旨意在那裡，那裡就有基督活生生的見證。

第八章 脫去舊人

從外觀高雅的三一學校教堂，到倪柝聲與兩三位青年非正式禱告的河邊茅屋，不過只有十六公里，他卻為這樣的遷移有一段長時間的思考。在南台島東西兩大潮流，都一齊衝激在他身上，後面山坡上遍佈著舒適的外國別墅，河道上有來自歐美的郵輪及貨輪，各自在航道上停泊或航向海外。在輪船之間交叉穿梭，搖晃於波浪上的則是本地的小舢板和「拖船」。這些人均為媽祖信徒，沿岸擁擠著他們簡單的住屋及吵鬧、臭味雜陳的市集。在這種環境中他不斷地自問，他的基督教信仰能否進入並適應如此複雜的情況呢？

在福州，安立甘的「石砌教堂」（與美國公理會紅磚建築相對）正代表著基督教的信仰。正如當時的人所描述，這個由領事、港埠官員及商賈們所組成的「社會」，屈尊降卑地來參加由港埠牧師所主領短短一個鐘頭的宗教儀式，當儀式完畢後他們便打道回府，而那些怡和洋行的商務代表們，也在例行的教會崇拜後商議本周的茶價，其他人則赴英人俱樂部作周日消遣。

當然，在較小的城裡也有信徒們多年奉獻所建造的教會，其成員幾乎全為中國信徒及傳道人。但在建築及教會風氣上，仍保留西方的特色及風格，因此信徒們相當被動地依靠一個累贅的教會組織，以及外籍的主教為上司。這種情形就像是一個人不管轎子輕或重，都定規要四個轎夫來抬。不但如此，他們長期缺乏按立的牧師，而有資格主領聖禮的牧師與教會數目的比例都低於一比七。另一位福建的宣教士說：「無可避免的結果發生了，本來值得重視的聖禮制度，由於荒廢不用反而受到忽略，反而本土宗派卻大為發展。（在倪柝聲年輕時，由唐巴拿巴所創立的真耶穌教會，吸引了不少福建的牧師及信徒進入他們的交通。）如果你所在的教會，不能提供你一個有效服事的職位及按時舉行聖禮，而其組織形態又不能使你覺得自己是這個屬靈團契的一份子。如果你的態度十分認真，通常就會離開此地，加入其他能提供這些祝福的教會去了。」

倪柝聲在數年之後提到他自己所經歷的一件關於聖禮的事。「我認識一個人，他心裡恨著一個人，因那人曾大大得罪他，其受害之深就是殺了他都不足以補償。後來，被得罪的人得救了，有好幾年他不再把那人放在心上。有一次他到另外一個城去，並在當地的教會參加主日掰餅聚會，當他被介紹給會眾認識後，他突然看到了他從前的仇人。他暗自思量：『他在這裡，我不知道他是否得救，我該怎麼辦呢？我真糊塗竟然讓他們介紹！』當會眾再禱告時，他靜靜地起身離開那兒，邊走邊想他所蒙的救恩，及對那人的怨恨。他走得愈遠，心裡就愈覺得不該這樣離開聚會；另一方面也愈恨他的仇人。他想起十年前得救的光景，當時主如何一筆勾銷他以往的過失，而他卻覺得不能寬恕他的仇敵。最後聖靈使他想起一句話：『你們若有彼此相愛的心，眾人因此就認出你們是我的門徒了。』（約十三 35）這時他破碎自己並降服下來，大聲呼叫出：『主啊！我饒恕他了。』並且淚流滿面地轉頭回去聚會。當他進入會堂，他們已禱告完正準備掰餅，他站起來要求說一些話。他把整個故事說出來，提到神如何帶領他寬恕了這個人。」

倪柝聲一直在尋找一些人，而這些人是神的靈能在他們身上暢通無阻地運行的，他相信這件事不可能發生在狹窄的宗派團體裡。所以稍後不久，他對一群會眾說：「今天當我們圍繞主的桌子，我們的眼光若局限於我們自己的團體，就不配掰餅，因為得著了基督的生命，就應與整個教會發生關連，而不是其中一部分而已。我們的心需要寬廣以容納所有神的兒女，否則我們掰餅就沒有意義了。我們在此應宣告所有神的兒女都是弟兄姊妹，不容許任何分門別類的思想，並且切記臨到我們的聖靈也同樣臨到他們。」

當他嘗試去解釋由分門別類的宗派所引起的問題時，無論是從歷史或價值方面來看，他覺得這些答案決不能為初信者所稱許。由於許多差會的宗派觀念，使得具有潛力的中國教會陷於分裂的痛苦中，在當代年輕的基督徒中，也有許多人像倪柝聲一樣，尋求回到新約簡單的命令上，以期有效地肯定信徒的合一，而這個合一是耶穌曾禱告，且為其擺上生命的目標。

倪柝聲深深瞭解，離開已建立的教會之任何行動，會導致陷入民族本位及反差會的危險中，其結果等於宣告所有其它的基督教團體是錯誤的。在他所閱讀的西方作品中，有一些作者如加維特（Govett）、潘湯（Panton）以及更早的達秘（Darby），他們為著良心的緣故，辭去了安立甘教會的職位，而尋求聖經上更真實的崇拜及服事，並且得到神明顯的稱許。在聖經中像他們如此順服神聲音的例子很多。而一個人的立場，決定了他屬靈生命的品質，他說：「在神的工作上，每一件事取決於所差派出去的工人，什麼樣的工人便產生什麼樣的信徒。」如果他是以品質為目標，就不必從事對抗差會建造的改革運動。他不敢把自己的屬靈路程，與當時的民族主義運動相混淆。

從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二八年之間，在學生中出現了一股新的愛國情操浪潮。在過去幾年來，他們的老師一直叮嚀告誡，他們是民族的希望，有一天必成為民族的拯救者。但是與過去士大夫從政的制度相較，他們畢業後的前途未必平坦。尤其是青年們多為理想主義者，在喜新厭舊的情緒中，任何進取性的群眾運動，都儼然以領袖自居。

有一件事使倪家母陷於悲傷中，他們的三子宣祖，在屬世的影響及祖母嬌縱下成長，他急於投身政治活動，常常惹事生非，因此成了家人掛慮的重擔。表面上他打著「救國」的旗號，實則為逃避讀書，先後加入了鐵血志團及敢死隊兩個革命團體。終於有一天家人的掛慮成了事實，消息傳來他在一次革命示威中喪生。

一九二五年的新年，倪柝聲與他的弟兄們在海島上作見證，而福州舊城爆發一次發宣教士的暴動，天主教的修女及一些英國行道會的女教士們遭受侮辱，僅得逃命。同年三月十二日孫逸仙博士逝世于北平，留下了一個未能及時填補的權力真空。五月三十日發生歷史上的南京路事件，當時上海租借地的員警，向示威的學生開槍，掀起了一片反英情緒，並導致南方各城更激烈的示威。

福州的宣教士們在夏令退修會中，迅速把僅存的行政管理職位讓出來，以期獲得國人的好感，使三一學院秋季重新開學。往昔對「淡色眼珠的洋鬼」之傳說又復燃起來，再度給在差會服事的中國人極大的壓力，他們為著基督的緣故，被稱作「洋人的走狗」，然而也留下了勇敢的見證。次年因反基督同盟的傳播及騷擾，以致到了一九二七年的春天，所有內地的傳教士暫退到沿海地區，夏季時初級中學被焚毀，到一九二八年元月，高級中學的校舍被一群馬克斯狂熱分子縱火焚燒，更正教差會的復興時期似已終止。

但倪柝聲本人，仍尊重許多為神僕人的宣教士，他們曾與他一同分享對救主活潑的認識。早在一九二六年他應其中數人之邀請，到福建南部的廈門向同文書院的學生及美國長老會差會的神學院講道。在那兒他遇見了兩位聰穎的研究所學生——覃但以理及一位牧師的兒子陳雅各，他們日後成為倪柝聲工作上的親密同工。

這次拜訪，他是受到靈光出版社的邀請，該社系由南京差會機構所主持。他的朋友李淵如姊妹是靈光雜誌的編輯同工，他應邀與他們工作一段時間，由於他身體不好，若能改換氣候或許對他有益。然而更重要的是主在他心裡說：「去吧，你可以得到一些出版上的經驗。」於是他決定並知道神會使他成行。

這趟上海的旅行，他得以拜訪舊友、結識新知，對他而言相當有價值，有一些朋友是他日後極贊許的。他的新雜誌「基督人」（自一九二六年元月開始接續復興報出版）的許多讀者住在上海、南方城鎮以及長江上游各地，因此他看上海是全國工作的好基地。上海是一個充滿激烈競爭風氣及政治運籌的場所；也是一個具有刺激或危險的城市，其道德狀況被評為：「如果神寬赦了上海，那麼祂就對不起所多瑪及蛾摩拉了。」然而，它畢竟是建設中國的主要工商業及財經中心。相反的羅星塔碼頭，位於偏遠及方言的省份，缺乏發展機會，既然福州原有的弟兄都已分散，又缺乏工作的展望，他想是否要把總部遷到上海？

在南京有許多較大的宣教團體和機構，他遇到許多樂於在基督裡同工的弟兄，並從中得到一些編輯和出版方面的經驗，與李姊妹的交通給了他極大的幫助。這位比他年長十歲的姊妹，屬靈經歷超過自己，他覺得自己實在需要這樣的一位「年長的姊妹」。他把自己期待將生命之道傳遍中國的異像與她交通，並發現她是位有智慧的顧問，及有顆同心的靈。她印證了他的感覺，特別在當時動盪的局勢，正喚醒中國青年一股新的屬靈饑渴，這種饑渴也是起於對基督教的不滿。他能不能應付這個需要呢？她支持他以上海為據點的看法，並說她覺得神呼召她辭去南京的職位，投入他在上海的工作，特別是他正開始的文字事奉。

倪柝聲與長老會的關係只有短短幾個月，他不認為神要他永遠在此機構服事。更嚴重的是，他在南京不僅沒有工作而且病倒了，他知道他必須回去。他再度順河而下，靈裡雖有更新，但心中消沉身體軟弱，有一度他的咳嗽一直不停，晚上常出冷汗，他渴望早日回到溫暖的家鄉，並在途中尋求醫生的診治。

上海的醫生為他檢查，立刻要他作胸部 X 光透視，照片顯示他患了嚴重的肺結核，一邊肺全部感染了，而另一邊局部感染。當倪柝聲正等候醫生拿出潮濕的片子檢視時，他聽見醫生用英語跟護士說：「可憐的人，看看那張片子就知道了，你記得上回我們曾照過一張跟他一樣的片子嗎？他六個月後便死了。」倪柝聲被叫進去，「你的肺大部分感染結核病，」醫生告訴他：「回家療養吧，吃些營養的食物，這是你所能做的，你會好起來的。」

在回航的船上，倪柝聲的心中極其痛苦。他有許多的計畫，盼望能成就大事。而今神卻對他所有的計畫加以「否定」。他開始省察自己的行為、動機和雄心，並且迫切祈求「在神面前有清潔的心」他認罪，看在何處有得罪神的地方。叫他良心感到困擾的就是有關馬來西亞錫他瓦林愛倩的事，他早就知道那個告密的人是欺騙他的，那麼是不是他從一開始就沒有順從而犯罪呢？他是否聽信了謊言，而得

罪了她及她的家人呢？是不是他在整個事情中誤認了神的引導？他願意為主工作而守獨身，他似乎對於以往的事無法做任何的彌補。

一九二六年秋天的早晨，這艘沿海輪船逆流而上，行經閩江狹流帶；他在羅星塔碼頭上岸。當他重回馬山茅屋時，它已成了荒涼之地，他一生的路途似乎突然失去了指望。他想要哭出來，向神抗議，一一向他質問。

他試著平靜下來工作，從箱中找出他早已計畫要寫的一本書的大綱。早在三年前，他已寫了兩章半初稿，是有關屬神的人在屬魂體方面的題目。由於這些題目太理論化，所以他把這個計畫擱置下來，因為缺乏經歷來證實，而且有太多的事在這段時間發生。他在自己基督徒的生活中，有許多新的實際，也看到許多人從黑暗的權勢下得著釋放。假若神不久就要將他接去，倪柝聲覺得他無論如何，總要把神所賜給他的寶貴經歷寫下來，他坐著眺望江面，拿出了筆墨和稿紙。

當他這樣安靜下來時，身上仍在發燒，無法下筆，甚至無法集中思想，他只好把聖經和手稿收起來，因為他知道無法獨自完成。他再一次關上房門，下到羅星塔碼頭，雇了一是舢舨渡到海關去。陸忠信弟兄在旅館門口迎接他，在男士部給他找了一個房間，他躺在窄床上，把自己交在神的手中。

叫他得安慰的就是這兒還有一個旅館可以休息。倪柝聲的父親早先曾提醒他，工業學校快要重新開設，新的工程科教員已從美國來了，旅館是屬於該校的。而和教士卻在這炎熱的數周到福州的鼓嶺去退修，完全安息在神裡面。她在那裡接獲消息，學校的財政突遭破產，終究不能開課，因此這間住所仍歸她使用。

這段期間，宣教士們以牛奶和營養的食物當做藥品幫助他，弟兄們也輪替來照顧他。黑暗的日子持續幾個禮拜之久，他的體重日漸減輕，力氣逐漸衰退。陸忠信回憶說：「他是如此的自視卑微，極其渴望得到醫治。他曾要我每天奉主的名為他抹油禱告。」當他軟弱到只有憑著記憶中的經文尋求拯救，如「你們要自卑服在神大能的手下」（彼前五6）——但他不敢完全引用這句話。倪柝聲說：「有兩個月之久，我每天都在撒但的牙縫中生存。」

和教士定期帶著「基督是得勝者」的信息來探望他。雖然他知道寶血赦罪的能力，也知道能從那位曾擔當我們軟弱者的身上支取疾病的醫治，但他堅持自己犯了過錯，而在生活中給了撒但反對基督的地位。然而和教士不斷引用經文證實主的復活是包括了一切，最後他終於用信心接受：「基督是得勝者！」

慢慢地神答應了他們同心合意的禱告，神的手加上飲食及休息使他有了轉機。他稍有力量時就再度提筆寫作。現在終於得到神的許可，他就全心致力於這件自認為急切的工作，好像新聞記者趕著截稿時間一樣，他以最後的氣息，傾心於描述基督徒的屬靈生活與屬靈爭戰的謀略。

幾個月以後，第一部包括四卷內容的「屬靈人」終於脫稿了。這是一本很有系統的作品，其中詳論信徒的救恩，靈、魂、體各方面。在序言中，他形容此作品為聖經心理學，他提醒讀者若只把他當作自我分析的工具，必定會成為他們消失在基督裡的攔阻。這部苦難中的產品，富於透視，但缺乏他一般講道時的活潑，這部作品歸功於他博覽群書以及敏銳的心思，加上他豐富的聖經知識，所以其中的信息具有透亮的開啟性。

到了五月，雖然倪柝聲的身體仍很虛弱，但稍有好轉，便攜稿到上海。李淵如早已從南京到此，因

為南京有暴動，並殺害了一些宣教士。她的中文素養甚佳，志願替他定稿準備付印。

此時南京已成為中華民國的首都。國民革命軍北上經過湖南攻克長沙及漢口，然後揮軍向東取上海。為了保護百姓性命，蔣委員長於四月十二日，撲滅了上海工人中一些人的暴動，這個城市才重歸平靜。

當倪柝聲在上海正要完成他的計畫時，他學習另一個經歷，這個經歷深深影響了他往後對於「從罪中得釋放」這個主題的認知。他曾多次傳講羅馬書的話，這些話突然活現在他眼前。他看見屬靈上重要的事實，而且越過了個人由信心而來的經歷，他說：

「從我信主幾年後，一直被教導得釋放之道，只在乎『向罪看自己是死的，向神卻當看自己是活的。』（羅六 11）從一九二零年到一九二七年我一直是如此『算』，但困難的是我愈如此做，就愈覺得向罪是活著的。我簡直不能相信我是死了，我無法『死』，罪仍然勝過我，我知道有些基本的事可能錯了。所以我求神指示『我已經與基督同釘十字架』這句話的意義，我明白當神論到這事時他從未說：『你必須如何』；而是說『你們已經是如何』。但從自己經常失敗的經驗看來，這似乎是不可能的，除非我自己欺騙自己，我幾乎要下結論，只有不誠實的人才會有這種的說法。但無論如何，我尋求別人的幫助時，總是再次被帶回羅馬書六章 11 節上面，我欣賞它的教訓，然而我不瞭解為何它在我身上沒有發生任何作用。因為沒有人給我點出「知道」（第六節）必須在『算』之先。有幾個月我一直困惑，迫切的禱告，查讀聖經尋求亮光，我對主說：『假如你不帶我看見這最基本的真理，我就不原再傳道，我要先把這點弄清楚。』

「有一天早晨——我永遠也忘不掉那一天！——我在羅馬書看到『因為知道我們的舊人和祂同釘十字架，使罪身滅絕，叫我們不再作罪的奴僕。』（羅六 6），『知道！』我怎能知道呢？我禱告說：『主啊，開我的眼睛！』接著一剎那間我看到了。我早已讀過哥林多前書一章 30 節：『你們是在基督耶穌裡』，我翻開再把它看一遍。『你們得在基督裡是神的作為！』何等驚奇！假如基督的死是一個確切的事實，而神又把我放在祂裡面，那麼我必定也死了。突然間我明白，我是與基督合而為一，而且我已在祂裡面，當祂死時，我也死了，我向罪死是一件過去的事，而不是將來的事，這件屬靈的事實向我揭開了。我歡欣地從椅子上跳起來，跑下樓對在廚房工作的青年弟兄說：『弟兄』！我用手抓住他：『你知道我已經死了嗎？』他困惑地望著我說：『你說什麼啊？』我接著說：『你不知道基督已經死了嗎？你不知道我已經與祂同死了嗎？你不知道我的死是與祂的死同樣真實嗎？』哦，對我來說它是那麼真實！我興奮地想到上海的大街小巷去宣講我所發現的事。從那天起直到今日，我從未有一刻懷疑那句話的宣告：『我已經與基督同釘十字架，現在活著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裡面活著。』（加二 20）

第九章

脆弱的瓦器

在上海的日子，倪柝聲的身體日漸健康恢復，並且繼續留在住所裡，進行該書的其它部分，他確

信神要他完成它。慢慢地，在李淵如姊妹的文字指導下，他將許多痛苦及失敗的經歷，以及所領悟的真理，用文字發表出來。他也樂於以冷靜的態度來觀察差會的光景，在此他第一次與中國內地會有密切的接觸，這個龐大的國際性組織，是戴德生所創立，六十年來其福音見證深入中國的內陸。透過與內地會檔案部一位元宣教士祝康寧（Charles H. Judd）的友誼，向他見證了神常新的真實。祝康寧是一位在福音工廠上，有長期工作經驗的人，他們在靈裡很深入地交通，倪柝聲常到他家拜訪，並且分享讀經的樂趣，倪柝聲常向他提及願將福音傳遍中國的盼望，當他體力許可時，他們偶爾也與一些青年人到城裡的街上或郊區傳福音。

這時李淵如姊妹介紹他認識一位元可親的汪佩真姊妹，她是富有法官的女兒，過去曾是李姊妹的學生。那時李淵如還是一個頑固的無神論者，曾一度想破壞汪姊妹的信仰。汪姊妹在青年的時候就蒙召信主，她父母想盡辦法要她背棄他，首先以珠寶賄賂，繼而刺激她去自殺，最後將她逐出家門。她從金陵神學院畢業後，就成為一位自由傳道，因為學生們的渴慕，加上她特殊的見證，常在學校中引領許多人歸向基督。幾年以後她也嘗到引領自己母親歸向主的喜樂。

1927 年底的一個主日，倪柝聲、祝康寧、李淵如姊妹及汪佩真四人，這是他們頭一次在汪姊妹家中聚會掰餅敬拜神。他們繼續了幾個禮拜，倪柝聲已感覺到他必須踏出信心的下一步，租下適當的房子，作為教導聖經和見證之用。俗語有句話：「從小處著手」恰與先知所說——「誰藐視這日的事為小呢？」終於在 1928 年初他在文德裡找到一間房子。從租界地的哈同路向東轉入，房屋位於蒲石路北邊，在堤岸西邊不到五公里。那時又有幾位弟兄加入，他們也搬進去住，在樓上聚會直到樓下店鋪空間騰出來，可做為講道的場所。每個主日一早，祝康寧就騎腳踏車，從內地會在吳淞路的總公會處到哈同路與他們一同掰餅，然後回到他自己所負責的教會（該教會是一差會的自由基督徒教會）。但這種配搭並不長久，不到一年，祝康寧就被調回加拿大，就往後歷史的眼光來看，與宣教士們在這深具價值的工作配搭，就此忽告中斷。

1928 年六月，國民革命軍進駐北平，而倪柝聲所著的「屬靈人」最後六卷已準備付印。他按著原初的感動完成了這本書，這是他第一本也是他最後一本親自寫完的書，其餘的書籍都是從他的講道及教導中謄寫出來。屬靈人第三卷討論「疾病」的一章，雖然這章與其他題目均出於經歷，但正如其他神僕人的經歷一樣，不久他也親身經歷所寫的論點。因此在許多年後，常提到他覺得「屬靈人」太「完全」了。然後它使人產生一種「它是一切問題答案所在」的錯覺。因此 1941 年說：「這書不再出版了，並不是我說錯了什麼，因為我現在再來看它，仍然同意其中的每一個說法。它在真理方面立論相當完全，然而這正是他的弱點。因為當一個人讀完了，會使他覺得不再有任何問題了。但我發現，神卻不是這種做法，他很少讓我們如此認為。因為將屬靈事物系統化的危險，就是使一個人以為不需要藉聖靈的說明，就可以領會這些事物。不成熟的基督徒只是一直尋求理解性結論上的滿足。神的話有其基本的特質，他總是對我們的靈及生命說話。」由此可知，「屬靈人」這本書並非今天的教科書，而是作者個人經歷的一個里程碑而已。畢竟他寫書時還不滿二十五歲。

當時在哈同路文德裡的聚會場所，僅僅容得下一百多人。但 1928 年底在在這裡舉行了規模小而具深刻意義的第一次上海特別聚會，從城裡各處的信徒聚集在此，並為他們解開神的話，倪柝聲的信息得到熱烈的迴響。因著聚會的體力付出，加上連續不斷的幫助那些來訪者，再度豪盡了他的精力。寒

冷的冬天來臨時，他咳嗽又發，體重再度減輕。於 1929 年初，一些家中的事要他處理，所以他就乘機回到福州，後來他才知道這是與和受恩教士的最後一次會面。和受恩教士早期帶著幾分猶疑地將一些寇迪（C.A.Coates）及達秘（J.N.Darby）的解經著作借給他看。他覺得這些作品很合自己的口味，他就寫信給倫敦出版商，索取其他這類作品，結果他與英國的喬治威兒（Geroge Ware）弟兄通信了一年，有很好的交通。他是屬於倫敦弟兄會嚴守達秘信念的團體，他本人尋求一種更原始的基督徒崇拜方式，不受傳統所累積的細節拘束。如今他發現自己已步入所熟悉弟兄會先進者的腳蹤，主日崇拜的中心是晚間圍繞主桌的掰餅聚會，每個人都在發自內心的敬拜與感謝中，與眾人同領主的餅和杯。教會生活的主要特徵是信徒的施洗、解經、信徒彼此照顧、一同關心神的工作，經常公開見證神在基督裡的救恩。關於姊妹的活動，倪柝聲也和弟兄會一樣嚴格採取保羅對姊妹的教導，禁止她們公開在有弟兄出席的場合講道，強制她們在教會聚集時帶頭紗。因為中國女子向來不覆紗或帶帽，所以這中紗帽是經過特別設計，用黑線構成一種標準的發網，而中國的姊妹們都願意遵守這規矩。李淵如及汪佩真兩位姊妹，除了在姊妹聚會中講道外，都放棄了頗受歡迎的公開講道，而從事個別教導工作。

回到羅星塔，他很清楚指出和教士在為青年人上聖經課時所發生的錯誤，她謙遜靜聽一言不發。事實上，她對這些倫敦弟兄會教義的立場感到不安。早在陸忠離開她前往與化沿海附近從事拓荒工作時，就曾他透露過這種疑慮了。她覺得他們不過是一些自視教條純正，而彼此卻不相容的聚會長達一世紀之久他們拘泥於自己的立場，而與其他的基督徒不相往來。但她幾乎不對倪柝聲說什麼話，只是介紹另一位英國傳道人也是解經家的奧斯丁，史百克（T-Austia-Sparks）的一些作品給他。史百克有關十字架的信息，頗有賓路易師母的風格，在過去一年多曾給他帶來祝福。

這次短暫的拜訪使他大得幫助，由於他身體忽好忽壞，使他不能久留接受她的款待。他坐船到南台，在兩小時的旅程中他再度發燒。惡者藉肺病所產生的情緒低沉，引發他裡面的埋怨：「你本有光明的前途，也有很多機會，而你卻放棄了這些燦爛前程來事神。而今你的職事滿有前途，以你的恩賜而言，你一定會成功，可是你又放棄了它，為什麼呢？你捨棄太多了，而你得到又是什麼呢？有時神聽你的禱告，但他大多是沉默不語。你跟那些在大型福音機構中的人比比看，他們也有光明的前程，而且能夠把握住它，因此屬靈事業大得興旺，工作也得到神的稱許，並且使許多靈魂得救，他們也繼續追求神。再者，他們看起來才像是個基督徒，這樣快樂、滿足、自持。而你呢？看看你自己吧！」

上了岸，他回到坐落岸邊的家，向父母問安並料理自己的事務。他不顧自己身體的不適，想替他們做一些事。他心想只要他能恢復健康，他願意為神做任何事。第二天他來到城裡，憂傷地避開兩處早已分裂的地方教會會所。橋下正好有帶著捕魚鳥的漁夫在幹活，他像孩提時一樣到停下來注視他們，對捕魚鳥的耐心大為驚訝，而後他拄著拐杖蹣跚而行。

在街上他遇到從前三一學院的教授，他向教授一鞠躬。教授帶他到一家茶館，經過直截了當的幾句話後，教授停下來打量著他說：「這是怎麼回事？」他顯然帶著幾分輕蔑高聲說：「學校這麼多人當中，我們一直認為你是成大器之才。看你現在的樣子，為何如此落魄呢？」

傳統上，中國學生都很敬重老師，每每以自己學業上的成功來報答師恩，所以這句話無情地擊中了他的要害，他是倪柝聲衷心敬佩的人，而他認為倪柝聲受教育是枉費了。他在教授洞察凝視下顯得沮喪，因為他所說的都是實情，他失去了健康，前途也破滅，他還能拿什麼給人看呢？這位他從前教

中國法律的教授又問道：「你難道一點沒進步嗎？沒有進展，沒有事業，什麼都沒有麼？」那時倪柝聲雖已成人，但也幾乎落淚。

就在這一瞬間（他後來告訴我們），「我知道什麼是榮耀聖靈常在我身上的意義，我能抬頭向神說：『主啊！我讚美你，因為我已揀選那上好的道路。』雖然對我的教授而言，事奉主耶穌是全然是枉費的，但這就是福音的目的，把一切都獻與神。」

他在家待了一些時日，重溫與雙親相聚的喜悅，分享其他家人的喜訊，他們大多已成家。母親仍精神十足，常常受邀參加禱告會及見證會，同時也享受了帶領她年邁從商的父親，在晚年認識救贖主的喜樂。當他父親過世時，她哥哥安排了一種道教的葬禮儀式，她為了回避這種葬禮，安排了一頂裡面抬著一塊大石頭外面放下簾子的轎子，隨著儀隊及穿白衣服哭號聲的親屬隊伍送殯。她母親後來知道這事曾威脅著要上吊，但最後老太太雖在世俗中渡過了半生，卻終於受感她女兒的懇請，接受了救主。

倪柝聲的母親怕倪柝聲不久人世，雖然她替兒子擔心，但有時也尖銳地批評兒子許多的工作。倪柝聲也說出不滿母親在教會服事的意見。雖然如此他還是安靜下來，一再為工作的力量禱告，因為他覺得神確實招呼了他。最後神似乎對他說：「把它交給我，這是我的事，你只要信靠我就夠了。」但他堅信神的旨意必須看守，所以他盡其所能卻無法放鬆地把事情交托給神，他發覺自己在禱告中被這意念纏住了。

一天他外出在沙灘散步，默想他的困境。突然間他停下來，把手杖插入沙中宣告說：「主啊！我信靠你。我在此放下我得醫治的事！」然後他走開了。但在他走了沒有幾步之後，過去那令他無法忍受的憂傷，又再度侵襲過來，使他出了一身冷汗。他不自覺地又禱告起來，跟神爭論痊癒是絕對需要的，但他立即停住腳步，醒悟了他剛才所做的宣告，這個試探是從仇敵來的，方才的禱告就是等於向它屈服。他轉身回到把杖插入沙中的地方，指著手杖為見證，宣告說：「主啊！我在此放下我醫治的事，我拒絕再提起它！」

當事情辦完後，他又起程前往上海。在文德裡修養身體，他每個主日早晨傳講福音，勸戒他的聽眾從世界中分別出來，完全奉獻給基督，晚上則與信徒一同掰餅。幾位奉獻的弟兄加入他們中間，其中兩位是陳約翰和醫院的一位眼科醫師俞成華，這些人後來在他不在時替他照料事情。不久鄰近一所寬約五公尺、長九公尺余的房子，可辟為稍大的聚會所，弟兄姊妹各坐一邊，中間隔著一排柱子。樓上更寬敞的空間，提供迅速發展的出版工作。「基督徒報」（有一段時間又稱為「復興報」）出版量急速增加，一種新發行不定期的「查經記錄」也出版，但為期很短，這份書報在對外交通方面繼續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從倪柝聲講道中摘錄出來的福音小冊子及單張，成了傳福音作見證有效的助益，並且藉著這些特殊的文字，使福音見證成為一股穩重的潮流。藉清晰的推理、簡潔的敘述、易懂的措詞，明白說得出救之道，容易為街上的行人閱讀並瞭解。為了應付另一項急需，倪柝聲覺得需要翻譯詩歌供崇拜之用，這些詩歌有的是來自和教士處，其餘是從英國弟兄會詩本中選出。他自己也撰寫了幾首詩歌。這時他的健康情形轉好，為了使他肺部更快恢復，醫生們建議他到氣候有益健康的牯嶺靜養一段時間。

牯嶺位於長江上游一千公里江西省內，正在河港九江的南岸，廬山的高峰中。山坡遍築西式平房，

供上海和漢口一帶的商人在此避暑，疲憊的宣教士家庭也輪流到此退修。高大的荷花開滿在林蔭的花園中，多岩的山中幽靜小道跟個引人許多盛景。山腰底處，由木柵所圍起的租界區外，是一個名叫「狹口」的中國市集，它的海拔約有一千多公尺。

倪柝聲接受勸告不得攀走登山梯道，而乘轎上山。設備完善的差會療養院一天要十兩銀子，他連這點費用都付不起，所以有一位南京的姊妹替他在「狹口」一百零三號找到了一個住所，且與隔鄰的機器工人夫婦一同搭夥，受到他們熱烈款待。早晨在牯嶺山的朋友找他出去談道，但下午他宣佈「絕對沒空」——要躺下休息。

在那兒，他曾被請去探望一位從廈門來，名叫殷祖瀾的年輕人，他剛從美國麻州波士頓回來，是學工程的，他到牯嶺來是為治療突發性胸疾，他的母親很關心他的屬靈光景。當倪柝聲在療養院病房探望他時，殷氏話頭鋒健、無所不談，終於他談到反對母親信仰的理由。倪柝聲在起身離去前，說：「這些真是你的問題呢？或是你藉這些問題築起一道籬笆，使你的靈魂不能得救呢？」這一問可把他問住了，回到廈門仍無法打開它，後來他找另一位福建人宋尚節，他是剛從美國俄亥俄州得到博士學位，這位神僕人引領他歸向了救主。

倪柝聲與接待他飲食的主人非常相投，然而兩個禮拜以來，除了飯前安靜謝飯以外，他沒有跟他們談到一點福音。後來有一天為了回答一個問題，他告訴他們主耶穌為他所做的事，因為他們的心靈饑渴，所以他們熱切地傾聽。很快地他們就以單純的信心來到救主面前尋求赦罪，一股新生命的亮光及喜樂進入他們的生活中。倪柝聲便開始與他們一同讀經，向他們解釋神的聖靈是如何住在他們裡面，並要把聖經向他們開啟。

他在牯嶺修養了好幾周，偶爾散步到一個地方，從那兒他可以俯覽遠處褐色的長江，無數的帆船點綴其間，江流蜿蜒穿過景物交織的平原。他再思想他的基督徒信仰，發現了他心靈的安息之所。他說：「起初我來到主面前時，我對『基督徒』已有自己的看法，並且盡全力去做我所想像的那種基督徒。我認為一個真正的基督徒應該從早到晚都帶著微笑，不論什麼時候只要流一滴眼淚，他就不再是一個得勝者，我也認為一個基督徒必須具有無限的勇氣。任何情況下他若稍有畏縮，就達不上標準了。」但是當他按著聖經篇章讀到新約時，他一再讀到保羅自傳式的書信——哥林多書後，常被其中「似乎是憂愁……」等的字句抓住。這位偉大的基督徒保羅，他曾「多多地流淚」，他會「心裡作難」，甚至「連活命的指望都絕了」，他一定有相當的人性。他自問，這怎麼可能？保羅曾經失望過嗎？這就是他人性的所在了！他說：「我發現保羅是一個人，正是我所熟悉的那種人。」於是基督教信仰的奧秘向他開啟，總結在幾句話中：「我們有這寶貝放在瓦器裡，要顯明這莫大的能力是出於神，不是出於我們。」（林後四7）這時他進入一個新的境界，就是安息在祂裡面，正如他過去時刻學習信靠神一般。

隨著季節轉換，天氣逐漸冷了。日子到了，他不得不與他的新朋友道別，回到上海。這次他慢慢沿著岩林中的石階步行下山，旁邊山泉匯成急流到了山腳，他雇車到九江搭江輪回上海。

幾個月後，一天在文德裡樓上，有人傳話說一個客人正在樓下等著見他，原來就是他在牯嶺狹口的屋主，他有事來上海，隨便來交通他所得著的經歷。原來他過去有個習慣，在冬天的月份每餐都要喝酒，而且常常喝得過重。這次天氣又轉冷了，酒又擺在桌上，那天當他低頭謝飯時他竟說不出話來。他再試了一兩次都是徒然，他轉頭問他太太說：「有什麼不對勁呢？為什麼我們今天禱告不出來？把聖

經那來，看看上面對喝酒是怎麼說的。」但是他翻來翻去找不到這方面的教導，而能給他們幫助的倪柝聲卻在千里之外，而且要幾個月才能見面。他太太說：「你且喝你的酒吧！下次我們遇見倪柝聲就問他這件事。」但是這位弟兄發現他就是不能為喝酒謝飯。他決意說：「把酒拿走！」他太太只好依他，把酒拿走後，他們一同為飲食謝飯。

這位弟兄把這故事告訴給倪柝聲後，他很希奇地大聲說「倪弟兄，裡面當家的不讓我喝酒呢！」倪柝聲說：「很好，你要永遠聽裡面當家的！」

1930年五月有一天，倪柝聲收到羅星塔來的電報：「和受恩教士安息了，被主接去，榮返天家。」古田醫院的挪威護理長羅蘭姊妹（Serene Lonland），在她生病時匆匆趕到下游，寸步不離地照顧她。她享年六十四歲。在她臨終時，以前的七位的老同工只有王連俊在場，之後陸忠信及繆紹訓匆匆趕去與王連俊一同把她安葬在河岸的山坡上。她離世時幾乎沒有留下一分錢。

當倪柝聲回憶她一生時，心中只有感謝神。在白牙潭時，他常為和教士的孤獨環境感到困惑，論到她對聖經有如此活生生的認識，為何該書的作者——神——不更大用她呢？但在以後的年歲中，事實顯明了神的作為，許多在福音工作上有前途的青年弟兄姊妹，因接受她的教導而承受了屬靈的產業。特別是王載弟兄，日後在香港差會的教會中成為有名的佈道家，同時也在印尼中國海外聯合宣道會（China Overseas Missionary Union）服事。倪柝聲日後說：「在與和受恩教士交通的那些日子，神以很真實的方式使用她。」現在他回憶起她的一首詩，這首也是他越來越喜歡的：

如果我的道路引我去受苦，
如果你是命定要我曆艱辛，
就願你我從茲，交通益親摯，
時也刻也無間，彌久彌香甜。

她所關心的永遠是，看她自己這一面是否陰影。當她遺言要送給倪柝聲的大字聖經從福州寄來時，他在裡面發現這段禱告詞：「哦，神啊！賜我一個完全及沒遮掩的啟示，使我看清自己的本相。」在空白頁上，她很早就些下一句話：「為己無所求，為主求一切。」這句話成為倪柝聲日後的座右銘。

第十章 覺 醒

1930年倪柝聲、張約翰與來自英國的弟兄有十天愉快的交通。查理巴羅弟兄（Charles R. Barlow）系英國彼得堡人，是與弟兄會「倫敦派」有關係的信徒。他被英國工程公司派到上海。他與倪柝聲及其他人交談過，在寄回英國的信上他發表自己的觀感：「這裡有些弟兄非常虔誠，渴慕真道。無疑倪柝聲是他們中間最突出的一位，而且遠超過其他人。他只有二十八歲，曾受過良好的教育，具有顯著的才能。他是一位勤快的工人，閱讀很廣。同時他也是達秘弟兄的高才生，要顯然是從達秘著作中得到很大的幫助。」對倪柝聲來說，這位訪客暫時彌補了自祝康寧離去後，他需要一位元成熟而有智慧的友

伴之空缺。雖然這位弟兄不是宣教士，只是「一位親愛的弟兄」而已——但他的確得到一位知己的朋友，倪柝聲很高興地提到從他所得的幫助。不久巴羅弟兄就被邀請在每天下午四點的例行聚會中向四十多位信徒講道，其中包括少數大學生，主日下午人數激增到八十或九十，接到他報告的英國信徒們均大得鼓舞。

留給這位訪客最深刻的印象是，倪柝聲在聖經經文上的知識。巴羅弟兄見證說：「當他忽略了新約裡的某一點記載時，他曾不經意地加上一句：『我以為一個月讀一邊新約就夠了呢！』」而陸忠信弟兄也留下了相同的印象。幾個月後陸弟兄與太太英妮在上海時，他說，倪弟兄在深夜探訪他們時，手上還帶著聖經。陸弟兄問他：「這麼晚了，你還上哪兒講道呢？」他回答說：「不上哪兒，不過今天還有幾章聖經沒有讀完罷了。」可見他在前十年讀經之殷勤，仍然保持到往後的年日。多年以後李常受談到他時，說：「我從來沒有看到過一個人像他這樣熟悉聖經的。」

這年年終，他們在文德里擴大的會所中內，舉行上海第二次特別聚會。一位內地會的觀察員說：「這些年輕的基督徒正在差會外，進行一項偉大的工作。」這次聚會共有十二天，他們每天有四個鐘頭的禱告。大約這時倪柝聲母親曾到哈同路短暫地停留一下，她寫道：「我孩子所講的太深了，我聽不懂，又太驕傲，不好意思請教別人，所以我從他們那兒獲益很少。然而看到他們的生活，我真是佩服得五體投地。」到目前為止，他們所用的詩本不過是小冊子的形式，有一些收集的詩歌，印成「頌贊詩歌」（小群詩歌）。在一百三十四首翻譯過來的詩歌及自己撰寫的詩歌中，有許多唱起來並不很和諧，但卻永遠帶著熱誠。這些詩歌在家庭及教會中受到普遍的歡迎，並且把聖經思想傳播到遙遠地區，同時詩歌的出版也產生了看不見的副作用。

倪柝聲害怕有了宗派上的標籤，正如以安立甘、路德、受浸、國名、人名或實行程式的簡稱為標榜之做法。他非常嚴格地把自己限制在純粹聖經的用詞上。他稱基督徒的生活為「路」，信徒為「基督徒」，地方聚會場所為：「教會聚會處」，定期刊物為「基督徒報」，文字辦公室為「福音書房」。他以弟兄會的「小群詩歌」為其翻譯詩歌的來源，他也延用這個名稱，因為這名稱也合乎他依據聖經的作風。這本詩歌裡面的內容，容易記憶，毫不矯飾，在中國引人注目。經過一年，哈同路的會眾就被差會方面的人加上「小群」的綽號。雖然詩本名稱不久即簡化為「詩歌」，但傷害已經造成，標籤已貼上了。當倪柝聲的工作推廣到全國各地時，所有各處的信徒團體，都被別人加上「小群教會」的名稱，這個名稱是他們引以為憾，而自身永不使用的名稱。

上海的特別聚會幾乎剛剛結束，城內便發生事故。日本人佔領東三省（滿州）引起了中國人的憤恨，發展成全國性的抵制日貨運動。日方要求上海市有所行動，但為市政當局所拒絕，後來日本藉保護日僑為名，以海軍陸戰隊登陸上海，造成了很大的破壞。敵對情勢於五月停下來，然而這只是將來事件的徵兆。

奇妙的是倪柝聲的健康終於好轉，神已經挪開了祂的手，他不但得以自由地教導聖經，而且能更廣泛地旅行。這些年間長江流域洪水為患，不少人因而喪命，但是其他支流上的許多城市，如首都南京及中游漢口等地的工作正在增長中，這些地方都包括在他的行程中。一有機會他訪問了北平，在那兒第一次與有魄力的基督派牧師王明道有親密的交談。

在山東省沿海的青島市，他遇見了非常活躍的靈恩運動。他很仔細地觀察此種不加約束的感情表

現及使用過度激發方法的聚會。在 1932 年夏天出版的復興報上刊登了一系列的文章，討論怎樣分辨屬天的靈浸，與以某種外面表現為靈浸之主要典型的說法。他贊同和受恩教士的看法，引用她的話：「人們無需去感覺來自聖靈的能力，那並非神賜下的目的。人的責任就是順服神。」在山東避暑區煙臺，他第一次遇見李常受弟兄。李弟兄是煙臺人，父母為佛教徒，他于 1927 年二十歲時悔改信主。自 1927 年起他就接到倪柝聲的刊物，他很快的學習而有了傳道及解經的恩賜。這時神向他提到受浸的見證，在一個假日的夜晚，倪柝聲在黃海邊替他施浸。

這種新方式的釋放運動，其果效在於藉由被廣泛被人閱讀的小型報紙，使讀者與編輯有了接觸而產生更新。當哈同路的聚會被一些人視為宗派時，在其他更新圈子裡的人們，不久就發現倪柝聲具有彰顯基督的驚人恩賜。濟南是山東省會，位於黃河邊。一些齊魯大學的教職員，每年按慣例邀請一位佈道家或聖經教師開特別聚會。齊魯大學乃是一所聯合學院，吸引了由各省來的學生，而以思想進步及自由神學最著名。然而幾年以來仍有一小群傳福音的教職員每週在史提恩醫生（Dr.Tronton Stearns）夫婦家裡為屬靈復興禱告。每逢假期他們便帶領成群的學生，到山上開退修會，盡力邀請中國最好的教會領袖和佈道家作講員。這位長老會的宣教士史提恩醫生，在醫學院擔任骨科教授，為人非常謙卑，他為首領導這些活動。

1931 年十二月，福建興化（莆田）宋尚節博士旅行佈道經過濟南，他在史提恩博士家中的一次講道後，幾天內就有四五十位學生接受基督。神的靈開始在學生中間工作使人認罪，史提恩夫婦因他們的渴慕追求大得激勵，於是邀請他們參加春季退修會。大家一致同意請王載作講員，但他在爪哇有事無法分身前來，有一個從福州來的學生提起倪柝聲的名字，說他的信息相當好。這位少人知道的上海傳道人不接受預約講道，據說很難請到，史提恩博士經過禱告後寫信邀請他，倪柝聲覺得方便，所以答應下來。

他來了，神也與他同在，一個禮拜多在醫學院禮堂向擁擠的會眾傳講生命之路。長久盼望的復興已經到來，更多的學生接受救主，許多人的經歷成了極美的見證。其後一群一百多位的學生聚集在泰安縣的一個山上，相傳是孔子陵墓的所在地，他們在那裡讀經、禱告，在結束前一大群人到山間冰冷的水潭裡受浸，公開地承認耶穌為救主。

同時，查理巴羅弟兄訪問上海所感受到的火熱，已傳回到英國及與他們有關的各處英語聚會圈中，他的報告使他們產生了一個感觸，覺得這是神的靈在中國動工，而聚會的起始也確與他們中間所發生的相仿。就他們所見，中國弟兄的交通方式，對他們而言是依據真理，而交通所反映出來的原則，也與他們所承襲的相同，而這些原則是他們一世紀前就開始使用的。於是他們就派遣代表團，來上骸與中國的弟兄相聚，自 1932 年五月，他們開始與倪柝聲及其同工聯絡，準備同年秋天來訪。

中國的弟兄反映熱烈，安排這些訪客於十一月到同哈路聚會。八位外國客人中有六位弟兄、二位是其弟兄的太太。他們在十月廿三抵達上海，被安頓租界區一所舒適的旅館裡。查理巴羅弟兄與一位美國加州的弟兄在溫哥華相會，他們帶了太平洋西岸及英國信徒的祝福，此外還有一對英國夫婦，及四位來自澳洲的代表。他們為中國信徒的熱誠款待大受感動，因而報以真摯的愛心。倪柝聲在他們抵達時起初有點不適應，但不久他便能參加為期兩周的親切交談。第一周這些訪客要求暫時不參加中國信徒的主日掰餅。他們一邊禱告、討論，一邊則小心衡量所看見及所交通的事物，惟恐有什麼差錯。

他們怎能代表國內的弟兄贊同神所不稱許的事物呢？然而有太多的事物加強了他們的信任，如：敬拜的態度、對聖經的順服、禱告，弟兄中顯出權柄及姊妹們的溫柔與安靜——她們似乎是蒙頭的。

在十一月六日主日聚會後，他們預定有一周的會議，大約有四十位弟兄是來自各地的代表，一同加入上海同工中間，此外還有幾次公開的聚會。在此之前，倪柝聲早就寫信給他父親，請他從福州買二百張椅子，每張椅子三元，用船運到上海，以補充現有長板凳之不足。早先，當他身體康復時，他有感動寫信向他母親道歉，說他在病重時曾對她態度冷淡，而她母親回了他一封嚴厲的信，歷數他的不是，卻忘了（她後來承認）自己為人母的失敗，現在她決心要補償他。倪文修對買椅子並不在行，她便去定做，並委託他們裝船。就在這時，這批椅子幾乎失掉，因為一位貪婪的海關檢查員想沒收椅子及侵吞五十元報關費，她丈夫到海關使他們放行。但到了海上她又跟船長理論不合理的船價，因王連俊弟兄已跟他們說過這些椅子算作是隨身行李。五日早上船到長江口時被大霧困在航道的深水島，她為不能趕上時候而失望時便與兩位朋友一同禱告，她公開向神祈求使霧散去。她說：她仿佛看見椅子擺好在哈同路的異象。霧散了，船在抵達黃浦江後，海關又再度阻撓他們在碼頭卸貨，和平也因排椅子手上沾滿了灰塵呢！

現今這些訪客在神面前覺得穩妥了，再沒有什麼可以攔阻他們承認這些中國的信徒，便打電話給溫哥華和布里斯班（澳洲）的「兩個有交通的聚會」，告訴他們的觀感。他們與中國弟兄的交通即得到印證，便於十一月六日主日晚上與中國弟兄共聚在主的桌前，這時的喜樂是不可言喻的。

次日早晨，特別聚會在雙方的祝賀中進行。主要的講員是查理巴羅弟兄和豪斯（W.J.House）弟兄，倪柝聲則擔任他們的翻譯。陸忠信與一些南方來的弟兄也在場，有來自長江上游和較遠的北方，包括從江北來的兩位季氏弟兄，從前他們在長老會差會有「北江蘇慕迪」之稱。這些訪客報告說：「一些來自其他地區的弟兄，都是有分量的人，工作的進展也使他們得到鼓舞和操練。」

幾位參加聚會的江蘇弟兄，請他們訪問江蘇各處的教會。但北方地區年初就有大騷亂，惟恐他們的客人會受到土匪綁架的風險而作罷。訪問團的兩位弟兄豪斯與巴羅表示，盼望去看看各地工作開頭的光景，於是他們坐船到廈門參加這地區的聯合聚會，陸忠信先行前去會見王連俊，歡迎他們到福州訪問。他們在強勁的季風中航行，訪客終於到達福州，並在倪柝聲父母河邊的家中，接受招待。那次聚會人數多達二百五十人，他們回上海後，因此看到他們興盛之光景而大受激勵。

訪問帶回去中國弟兄的見證，得到相當熱烈的反應，於是在 1933 年春天，他們邀倪柝聲夏天帶俞成華或陸忠信同行，到英國及美國訪問。這時俞成華正患肺病，而陸忠信則到遠處，倪柝聲並沒有說出他們兩位也在邀請之列，他自己有些預感，思想難道神指定他作中國百姓的守望者嗎？無論如何，同弟兄們禱告之後，他決定獨自前往。到歐洲的旅程中可以在新加坡停留，他暫時停留了一會兒到錫他瓦問林氏父母問安，此行他心中得到神新賜下的平安。

長途的海上航行，帶來的是休息和讀書的時光，遲至六月他才到達英國，身心大得更新。查理巴羅來接他，把他帶到彼得堡的家中。他訪問了散佈各處的聚會，例如蘇格蘭、伊斯靈頓（Islington）、克羅伊登（Croydon）及文特諾（Ventnor），在這些團體中他嚐到熱烈的愛心與回應。他的來訪對信徒們實是一件嶄新的事，因弟兄會本身沒有向海外傳道，他應邀報告工作情形，當然也受邀參加主的晚餐，雖然他的英語使他深感受限，但他有時也傳揚主的道，他也與他們中間的年長弟兄們多次長談。中國

信徒向來被這些款待他的人看為是很不成熟的基督徒，須要很多的教導，加上倪柝聲當時只有三十多歲，不過被看作一個學生而已，雖然他的智慧及資歷在本國受到人們的欽佩，但他還是預備接受別人的建議。他談到同工們在上海經常遇到的實際問題，例如有人問：「我要受浸，但我有兩個太太，我該怎麼辦呢？」之類的問題，使他大為震驚。

至於青年朋友們，倪柝聲輕鬆愉快地提到中國信徒聚會的簡單規條，例如：「不讀經，不吃早餐！」或是講些福建「剪刀鬼」的民間傳說來娛樂年輕朋友，據說那些鬼會在人們的油紙傘上剪了許多洞，使雨水漏下。當他沒有談話的時候，他總是靜靜地在聆聽和觀察這個團體中豐富的知識。但他卻不止一次聽到他們自滿的談話而深感困擾，那些話常是這樣：「這屬靈啟示的領域裡，還有什麼是我們弟兄會所沒有的呢？要我們讀其他基督徒所寫的東西，簡直是浪費時間，難道還有什麼是我們沒有得到的呢？」有一次在伊斯靈頓公園街的聚會裡，他被邀請參加講評，在他聽完一段關於信仰的長篇討論後，終於發洩出積壓已久的不耐。他挺身而起，身長足足有六尺之高，伸展一下雙臂，說到：「親愛的弟兄們，你們對於真理的認識固然廣博，但在我的國家裡，這些知識對你們也許是太多了，」他一面說一面握起拳頭：「當真有需要時，或許你們連一個鬼都趕不出去！」後來他對這句衝動的話，覺得有點難過，但這也顯示出他對那位元未見之神的真實認識。當他離開英國的時候，他坦誠地把他的觀感告訴他的朋友查理巴羅說：「你們這裡的人雖有奇妙的亮光，但信心卻太少了！」

他在英國以後的行程是由巴羅弟兄陪同，或許有其他弟兄隨行。當經過愛丁堡時他趁機拜訪了那位屬靈的喬治卡丁，就是那本流傳廣泛的福音小冊「救、知、樂」的作者，那時該書的發售量已達三百萬本。約有一周之久他藉口有事要去倫敦，並沒有告訴巴羅，他暫時打破了過去這些日子的活動，因為這個圈子相當的封閉。就在那個主日他到南倫敦榮橡路的基督徒中心和他們一同敬拜，他們是一個獨立的福音團體，由史百克的服事而成立的，史百克曾是浸信會的牧師，這是他十分想見的朋友。喬治巴特森和其他弟兄熱烈歡迎他，他與他們有交通及話語的服事，並高興地與他們一同掰餅用杯。

二周以後，他在英國的日期已滿，除了那次破例之外，一直都是在這個十分封閉排外的基督徒團體中，沒有與廣大英國福音教會的生活和見證接觸。當時紐約布魯克林教會的詹姆士·泰勒（James Taylor）是位年長弟兄，他的信息廣播各處，弟兄會的「倫敦團體」相當敬重他，他來英國已有幾個禮拜，他打算陪同倪柝聲一起橫渡大西洋回美國。泰勒是位老練具透視力的長者，他很高興認識了倪柝聲，並且十分敞開而自由地談到中國的工作情形：如中國教會的情況，屬靈的要求，並徵詢倪柝聲許多意見。當他們談到教理時，特別是有關預言方面，他發現倪弟兄對於基督再來臨的道理是他不能贊同的，他在更進一步的詢問下，認識倪柝聲的某些觀點是一種顯然的錯誤。他們抵達紐約時倪柝聲受到相當熱烈的歡迎，他在偉斯斐特（WestField）講道，主題是「從罪中得釋放」，雖然大多數的人認為相當好，但在泰勒的評論認為「在教義上有缺欠。」

同時在英國一位年長的弟兄，有一次在往格拉斯哥（Glasgow）的火車上，發現坐在他對面的一位少女正殷勤地閱讀聖經，當和她談得較深入時，得知她在榮橡路聚會，更進一步探詢時，知道在上週末有一位十分有趣的中國人曾到他們那裡去。他懷疑是否有人沒把倪柝聲的行蹤報告清楚，因此他決心調查。那夜喬治·巴特森接到一個陌生人的電話：「你認識一個姓倪的中國人嗎？他有沒有和你一同交通與掰餅？」面對沒一個問題，他的答覆都是：「是的，」然後電話的另一段突然掛斷了。他想：「或

許有什麼麻煩了！」

很快地有電報打倒布魯克林泰勒那裡，但那時倪柝聲已離開，前往紐黑文（NewHaven）。他到美國的主要原因，是要去探望史提恩夫婦，他們是曾經到他濟南家裡度假的朋友，他和這兩位朋友同住了幾天。那個主日他不顧泰勒明白的勸告，在史提恩家中，與他們家人及另一些人一同掰餅，正如他在中國做的一樣。泰勒在憂傷中寫到：「他不承認自己違反了原則」。由於倪柝聲所處的立場使他自己相當受壓，以至在他回到上海和同工商議前，他婉拒用口頭或文字作任何表明，泰勒看到他們一同前往溫哥華，而且倪柝聲參加了那兒的特別聚會。

「倫敦團體」的聚會原則，是儘量避免和其他基督徒的聚會有來往。實際上，在這個圈子以外的人，是不允許和圈內的人有交通，除非他願意從那時起，把他的聚會限定在圈內，這個規條也包括一般社交關係，後來詹姆士泰勒更嚴格執行這種規條。直到六〇年代的早期，這個運動因著這種規條產生痛苦的分裂。

雖然如此，倪柝聲在溫哥華，仍然受到最熱烈的歡迎，並被邀請在聚會中講道。他似乎享受到真實的自由，因為至少有一個年輕的加拿大人找到了救主，正如他在英國時有許多人因他蒙恩一樣，這些是他值得回憶的事。他在那兒也與一位好朋友——中國內地會的宣教士祝康寧——有很好的交通，並且拜訪了琳娜，克拉克（Lena Clark）她曾經是中國內地會的宣教士，在四川工作達二十三年之久。她自 1929 年就辭去內地會的工作，現在她回來加入哈同路基督徒聚會的交通。

在倪柝聲返家，橫渡太平洋漫長且寧靜的途中，神似乎定意在旅程引導祂的僕人。神給倪柝聲一種新鮮的啟示：基督就是他的生命。有很長的一段時間，他敏銳的覺察到自己在行為上不能討神的喜悅。他說：「當我還是一個年輕的基督徒時，有許多人告訴我，要我過與基督一樣的生活。幾年以後我很驚奇地發現，我時常控制不了我的脾氣。甚至當我定意設法控制它，使它不爆發出來時，裡面卻是愈發翻騰，叫我更痛苦及失望。過去那些勸我的基督徒朋友，由於我先前給他們的印象很好，使他們毫不遲疑地告訴我，我現今的生活真是不如從前。他們說我過去是如何謙卑、忍耐、溫柔及可愛，但現在變得……更糟糕的是，他們的批評並非沒有根據。我的情形怎麼會演變成這個地步呢？癥結在哪裡呢？」

他說，過去他認為基督是與他分開的，他很難把祂那令人稱讚的性情：如溫柔、忍耐、愛心、智慧、聖潔等，在實際上與他認同，而這些性情正是他深深感覺到自己所缺乏的。他說：「整整有兩年之久，我是在黑暗中摸索、尋求，積聚這些美德作為個人的產業，好叫我可以建立基督徒的生活。（正如我重生以前，為自己積聚屬世的東西一樣）雖然努力，卻沒有進展。癥結在於我一直在積聚一些東西——即屬靈的事物，以致神不得不親自伸手把我從中救拔出來，好為他兒子的生命開出一條路來。」

「後來，在 1932 年的某天，亮光裂天而降。當我重讀哥林多前書一章 30 節時，我突然看見基督在祂的豐滿裡，被神命定為我的一切。這是多麼大的發現啊！哦！這些『東西』是多麼虛空啊！若我們離了祂，即使我擁有了這些東西，那也不過是死的。因為神所尋求的，不是我們表現出像基督的樣子，而是尋求基督得以在我身上的彰顯。一旦我看見這一點，就是一個新生命的開始。祂自己就是一切神聖事物的總結，所以祂在我裡面滿足神所有的要求，這不是將來才要發現的一件事，而是現在所要接受的事實。從此以後，我每日的基督徒生活可以用『接受』這個詞來概括。」

第十一章

新的歷程

一回到中國就有許多事等著他去做。上海的弟兄與西方朋友間的聯繫，辛苦拖了兩年之後，終於令人遺憾地收場。但這件事卻未影響他們對福音廣傳的工作，及對神工人的教導和訓練。倪柝聲工作的能力是基於一個事實，就是每個信徒都是一個不受薪的工人，而且每一個因經商或公職遷徙的人，都能使他的家成為禱告的所在和新的見證中心。那時中國道路系統和新的鐵道不斷的開展，配合著迅速興起的航空事業，環遊全國一天比一天方便。對弟兄們而言，某些新的工廠即將打開，倪柝聲在新年談話時，把他們的思想引到建立教會這件事上。他在西方的觀察，發現許多反常的情形，這些情形使他再度回到新約來查證，他在新約裡看見而且得到證實的簡單原則，即「一個城鎮或一處村莊應該只有一個而非許多教會」。這是他過去在那些封閉的朋友們（弟兄會英倫派）中間，看見且運用得相當滿意的簡明原則。

然而他並未因此歇息，曾有一段時間他想親自到西南邊陲、雲南及貴州諸省，好從他們中間得到該地百姓的資料，瞭解他們的屬靈需要。一九三四年春天機會終於來了。

有位馬先生剛信主，並在他受浸時取了一個名字叫馬牧。他以長江河港岳陽為中心的事業頗為成功，於是有意把生意開展到貴州省。他是個非常率直的弟兄，擁有一輛福特汽車和一股冒險犯難的衝動，現在又加添傳福音的熱誠。他與倪柝聲兩個人湊在一起，計畫了一項西南邊區的汽車旅行，包括了公路所能達到的地方，倪柝聲搭船到岳陽和他會合，一同實現這個計畫。

他們的車上載滿了油桶和福音單張出發。繞著湖南米鄉的大盆地而行，先向南行，經過湖南省會長沙，而後轉向西北常德。他們緩緩而行，馬牧負責駕駛，每遇渡口或路人群集之處，倪柝聲就起來站在車上，向他們傳講基督。

沅江通航甚暢，為西南貿易的通道，沿著寬敞的河谷，他們來到了沅陵。山坡上的丘陵地帶，燕麥大麥並植。沅陵位於共產黨賀龍第二軍駐紮基地桑植進軍範圍之內，當他們爬坡駛向湖南邊境時，一切平安無事。這裡的許多城市雖有歐洲宣教士設立的福音前哨站，但仍有許多鄉下福音未曾傳到。

貴州是一個急速改變的省分，過去修築到城門口的道路，現已延伸到鄉間。盤旋的馬路代替小徑，蜿蜒地繞過山岩。有些險阻的道路，需要克服困難方能通行；而已完工的路面，亦多崎嶇不平。馬牧患深度近視，戴著厚厚的鏡片，在未設欄杆的急轉彎處，只要稍有疏忽，就有墜下陡岩的危險；因此他的膀臂也「不管用了」。這時倪柝聲，雖然沒有什麼駕駛經驗，卻較為鎮靜，所以就接過來駕駛。

在省會貴陽，有一群信徒在家中聚會，他們受到當地信徒的歡迎，並花了幾天的時間和信徒們一起交通。倪柝聲向他們講了幾次道，馬牧有一次聽見倪柝聲談及教會歷史的概要，他提到一大堆的日期、姓名和人物，居然連筆記都不用看，使他感到驚奇。然而他們在此也開始感到「前途茫茫」，有人說他們所行的那條漫長的道路，並沒通道雲南，他們已經行車至此，便冒著天寒向前挺進，決心繼續向深

山推進。山峰尚存積雪，他們穿過杜鵑花和灌木叢間，愈爬愈高，下坡時總是熄火沿坡而行，以節省匱乏的汽油。馬牧談起福特汽車馬達運轉的韻律聲，及倪弟兄在小驛站的講道聲，仍深印他日後心中。但當倪柝聲到了更高處時，發覺他的心臟不斷的給他帶來困擾，提醒他早年的宿疾快要發作了。貴州的雨雖然漸少，然而雲南的風勢卻愈刮愈強，他們到達一個地方，當地的部落歡欣地迎接他們，並幫助二人把車子推過幾處正在施工的地方，一位工程師告訴他們，他們是第一批通過這漫長公路的旅客。旅途的興奮驅走了寒意，他們開始踏上遙遠的下坡路直駛高亭平原，兩側稻畦村舍，春禾綠野。途中也有幾個步行的客旅，而最後一段可行汽車的路還算平坦。當他們在往昆明的路邊，大膽嘗試前所未有的見證時，卻因聽眾詢問有關汽車方面的事給打岔了。當這些人發現，這輛車子是從湖南一路開來此地，他們的名聲便不逕而走。

他們不遠千里而來，是帶著特別的目的，要從昆明以北，橫渡金沙江通往藏胞居住的所在地。從前在上海時，曾有來自雲南的弟兄，他們被神呼召向藏胞傳福音，那時倪柝聲就想親自去看看。經過幾天的艱苦旅程，他們來到山裡的一處市集，藏胞常常攜帶他們的貨物到那裡趕集。馬牧回憶到此地的藏胞特別殷勤好客，常是一碟還沒吃完，又重新給他們添滿了。然而倪柝聲卻籍著一個翻譯員，意識到他們靈裡的黑暗，需要救恩的信息。

他們前往西南的全部行程，真是按著神所安排的時間。若是再晚兩年，就會遇到剿匪戰爭，想要走這麼長的旅程，根本是不可能的。

倪柝聲回到當時的大商埠漢口，他停留在那裡，帶信徒查考雅各書。這些查經得力於弟兄會注釋家顧特弟兄(C.A.Coates)的幫助，雖然倪柝聲和兄弟會之間關係緊張，但他承認自己從弟兄會的著作中得到許多的幫助。

他從漢口回到上海，在夏末時曾和宋尚節及王載等歡然合影，這次聚會是由一位姓李的教會領袖安排的，目的是希望將三位元恩賜、方式和展望迥然不同的人聚在一起。他們這次聚首，就像過眼雲煙一樣，後來仍然是各奔前程。王載不同意倪柝聲講述無薪制的話語執事，也不贊成他離開差會自立的工作。他恐怕這樣做，只會造成中國教會的分裂和損失，然而在往後的歲月裡。因著事情演變而有的亮光，王載則慨然地贊許倪柝聲果敢不屈、堅守原則的立場。

宋尚節和倪柝聲從未攜手合作過，雖然他們彼此都曾收割對方所撒的種子。宋尚節從那次見面以後只活了十年，他是個旋風式的佈道家，他的講道配合感情的作用頗能吸引聽眾。一個朋友形容他是個「獨斷而固執，卻又經常猝然地改變既有的路線，他所說的每一句話就是斷語」。雖然倪柝聲在傳道方面更具有才能，但神卻使用宋尚節把群眾驅進神的國度，他傳道所經之地，復興之靈好象野火燎原般燃起。一位觀察者曾這麼說過：「當他講完道，群眾蘇醒卻饑渴，那時沒有人餵養他們，而倪柝聲的教導職事，正適時地彌補這個空隙」。然而宋尚節曾直言無謂地批評倪柝聲，而倪柝聲也曾私下表明，他對宋尚節在神學思想上的不成熟及在工作上缺乏持久性，而未予十分重視。從這裡不難發現倪柝聲十分渴慕神的膏抹，他或許感到宋尚節擁有他所缺乏的恩膏呢！

隨之而來的第三次上海特別聚會，他講到基督是聖經的中心，同時也是神子民的生活中心。這次聚會李常受從曲阜來參加，也有從江蘇、山東各城來的，他們的教會自一九三二年倪柝聲訪問後便迅速興旺起來。弟兄們也把工作分成三個四年階段，其開創期是：福建起自一九二四年，上海起自一九二

八年，北方起自一九三二年。

就在那時，一位倪柝聲意想不到，卻是他過去十分喜愛的人，又重新出現在生活中。自他從英國回來後，就知道他就學時代的青梅竹馬張品蕙，在燕京大學讀完了英國文學碩士已返回上海。在此之前，他記憶中的她，還只是個愛世界的女孩子，喜歡穿戴時髦。但她參加文德裡的幾次聚會後，在那裡遇見主，不久她就要求受浸。年長的姊妹也見證她完全的轉變。當倪柝聲遇見她時，就他本身的觀察，也證實她實在是改變了。這次的相聚，又燃起了他那埋藏已久的感情。

張品蕙的二姊品芳看穿了這點，就開始在其中拉線。她找到倪柝聲，並從自己的猶豫中探索真相，對他說：「現在品蕙已成為非常熱心的基督徒，十分堅定地服侍主」。她問道：「你願意考慮和她結婚嗎？我有把握她不會有什麼反對。」

然而他還是禱告又禱告，直到清楚那是神的旨意，因此才順從心中的感動。然後他在福州發了一封快信，請求雙親幫忙他安排婚事，倪母吃了一驚，想起自己從前在錫瓦訂婚的事幾乎鑄成錯誤。然而當他們一到上海，就聽到許多流言蜚語，據說張品蕙有個守寡的姑媽張美珍女士，非常反對這項婚配，不願她那才貌出眾的侄女，嫁給一個為人所藐視的窮傳道。同時在一些把倪柝聲偶像化的信徒中，也引起了想關的疑慮，他們對像他那樣禱告的人，居然還會想到「性」和家庭生活感到震驚，更糟的是，他居然考慮去娶一位燕京大學的校花呢！

但是他的母親去見張品蕙的伯父張端官，他是張家的族長，叫她得安慰的是他也表示贊成。接著倪母邀請張品蕙陪她到另一城市，去參加福音的聚會，她們同室住了一個星期，一起生活，一起禱告。回程的時候，神給了她完全確信，知道張品蕙就是神為她兒子所預備的人。

十月初，大約有四百位信徒聚集在杭州，地處陡峭的浙江丘陵及平靜翠綠的西湖之間，是一座風景如畫的古城。樂腓力弟兄曾在此安排了一次特別的聚會，以堅固這塊對福音反應還不錯的地區工作。自從汪佩真姊妹首次訪問這個地方，在婦女中間工作後，小型地方聚會就在浙東興起，這些聚集在一起的信徒，有來自浙東諸城，如：奉化、溫嶺和舟山等地，其餘則來自江蘇的蘇州及其他中心地點。倪弟兄在那裡講解聖經十天，既是日後稱為「得勝者的聚會」的文章。由於他父母也都來參加聚會，使他喜出望外。會後頭一天，訂為婚禮的日子，他不慌不忙，連作新郎是怎麼回事也沒有概念，以致陸忠信在結婚當天早晨，不得不拖他到估衣鋪買一件二手貨的衣服，作為新郎官穿的結婚禮服。

一九三四年十月十九日的下午，正巧也是他父母的結婚紀念日，倪柝聲按著基督教的儀式，在一大群信徒面前和張品蕙結為夫妻。他們一同感謝神，所唱的詩就是十年前倪弟兄因她而寫下的那首詩，然後大家一同愛筵交通，共有三十桌客人。

然而風暴終於產生了。當他們回到上海時，發現張品蕙的姑媽張美珍，公開且憤怒地攻擊倪柝聲，她在一份全國性的日報上刊登廣告，在典雅的措辭下質問這位窮傳道為什麼奪去她心愛的侄女？他如何養的起這位養尊處優的姑娘呢？更不用說要是她滿足。即使他能，那也一定是他從外國的財源得到資助。這種說辭等於是含沙射影地詆毀他的德行。文章中攻擊氣味十足，不久便落入那些嫌惡他影響力之人的手中，做為攻擊的把柄。廣告不只一次，乃是持續了一個星期，天天都登出遍及全國的攻擊文章。同時，她還印出措辭及氣味相同的傳單，在基督徒圈內廣肆分發。有一位傳教士說：「我讀到這份傳單，其惡劣的程度叫我不得不把它燒掉。不僅如此，我還得要沐浴一番，才能使身心潔淨。」

倪柝聲因此變的相當消沉。他退隱在新居中，躺在床上不願見任何人。一位意志堅強的女宣教士去拜訪他，她聲稱：「他一定得見我，因為我有從主來的話要告訴他。」她進去，告訴他說：「凡為攻擊你造成的器械必不利用；凡在審判時興起用舌攻擊你的，你必定他為有罪。」（賽五十四 17）同時，張品芳也以輕鬆的心情來鼓勵他，提起他的精神她揶揄地說：「他們怎麼說與你何干？好歹你已經得到一位合你心意的妻子啊！」因為張品蕙實在帶給他喜樂，她的中英文造詣都不錯，而且謙卑地與神同行，成為他工作上最大的助力，大家也都認為她是秀外慧中的女子。

十一月他們到南方旅行，參加廈門的特別的聚會。後來有一段時間他被幾個問題困住。例如：他們與倫敦方面的交通仍然拖延著，此外他在雲南是心臟不適的情況又再發作。特別是他們心中有一個問題未能解決，也就是他個人如何得到聖靈所賜服侍的恩賜——他不只是感到自己經歷的欠缺，同時他在教義上也有些混淆不清的地方。關於教義的問題，有次他到一個偏遠的地方工作，在那裡找不到一個能夠回答他神學上問題的人，當他為此苦思不解時，他得到一些非常單純的鄉下信徒在禱告上的幫助，因此神給他足夠的亮光，並解決他的問題。

另有幾道亮光臨到，使他得著釋放，是籍著史提恩夫婦在一九三五年一月間返回中國時所得到的。自從一九三二年倪柝聲訪問濟南後，該城即成立了一個「分離主義」的團體，這件事使得齊魯大學的人不安，史提恩醫生因此便辭職離開濟南，到上海另謀新職。在一個偶然的機會中，倪柝聲遇見李國清（參第六章），他是一位醫生的兒子，就是在梅花村一時說溜了嘴的那位青年，他曾在廈門大學讀過書，如今擔任飛行員，當倪柝聲問起他現在是否仍跟隨主時，他說：「倪柝聲，您想當我們經歷了那樁事後（指偶像大王失勢的事），我還能棄絕主嗎？」

儘管倪柝聲他們不斷與倫敦及紐約方面的弟兄會交換意見，但痛苦仍然存在著。而這種交通卻幫助了上海的弟兄，更清楚整理出教會之間的關係。西方的弟兄控告倪柝聲「在交通上妥協」，指出他放寬標準與榮橡路和新避難所的基督徒一同掰餅。因為在榮橡路及新避難所信徒所依據的原則是：「任何人只要他自稱為信徒，不論他是屬於那一個宗派，或是他與別的團體有來往，都可允許他掰餅。」於是倫敦及紐約聚會的弟兄，試圖照亮上海的弟兄，使他們瞭解基督徒交通的準則，幫助他們來審斷倪柝聲的行動，也圖謀藉此機會引起他們注意倪柝聲在語言上不十分正確的觀點。

今人感到棘手的問題是，西方弟兄會認為從其他宗派基督徒的交往中分別出來，比一同領受主餐更為重要。事實上，長久以來在中國的一些聚會，就保持各宗派間的彼此聯繫，然而從未發生什麼問題，但這對西方的弟兄會來說，是行不通的，相形之下，中國方面的運動（指聚會處）之不成熟也就成為不可原諒的。弟兄會提供了他們已存留一世紀之久的「真理」附在詹姆士·泰勒給陸忠信的信中，說道：「你們理當在主面前接受它，從它得益處，並靠它站立得住。」

結果上海的長老們，在監督徒的理性和聖靈的光照下，回了一封謙卑溫和的信。寄信的日期為一九三五年七月二日，發信地址為上海哈同路二百四十二巷三十六——三十八號。簽名者有杜弟兄、吳弟兄、倪弟兄及張弟兄等人，信中陳述了下列的原則：

「我們必須分辨（道德上或教義上）阻礙我們與神相交的『罪』，以及不會阻礙我們與神相交的『罪』之不同。我們確知像姦淫、不信基督道成肉身的罪，必定會使一個人斷絕與神的相交。然而關於其他的『罪』——譬如『泛交』、解釋預言的分歧，並不妨礙我們與神的相交。」

「事實上，有許多不同宗派中神的兒女們，我們認為不合適與他們相交，然而他們卻比我們更與神同行及相交。」

「相交是聖靈的事，唯獨聖靈才能決定誰是合適相交的物件。」

「我們接納一個人的原因是因為神已接納他了（羅十四 3）。所以神的命令是：『信心軟弱的，你們要接納。』（羅十四 1）我們必須接納所有神已接納的人。這個命令非常清楚，而且不容置疑，是我們應當接受的。」

雖然這封信是中國信徒基於基督徒覺醒的良心，率直地懇求並盼望能有開放的交通，但還是免不了被嚴緊的藩籬主義所否定了。西方的弟兄會正式宣告與中國弟兄們決裂。一九三五年七月三十日，弟兄會在英國伊斯靈頓公園街聚會廳召開了一次「決定性」的代表集會。有幾位出席的代表為他們的優越感受到此番深遠的打擊感到難過。這次決議是具有權威性的，因為一旦決定後，全球每一處「倫敦派」的聚會都要遵守。一九三五年八月三十一日，他們寄信給上海的弟兄們，信上提說他們對中國弟兄向基督愛心的誠意感到懷疑，並指控倪柝聲為人不夠正直；又說假使早在一九三二年上海弟兄們就把原則說明清楚，那麼這段交通也就不可能發生了。「我們為缺乏神的保守而產生的錯誤感到憂傷，因為我們急促地與我們尚不十分認識的人行相交之禮。我們不能再與你們同行了……。當然這點也適用於所有跟你們保持聯繫的人。」

其中簽名的有查理·巴羅，他也是為此深感難過的人。中國的弟兄也為整個過程感到驚訝，並對基督徒圈內的關係感到失望，以及因愛而產生深切的憂傷。

當倪柝聲接受到覆信時，他本人和張品蕙正在煙臺。當時有一位在內地會具有傳道恩賜的女宣教士伊麗莎伯·費巴小姐(Elizabeth Fishbacher)正在城裡開奮興會。

她剛認識倪柝聲不久，而倪柝聲在那時正經歷一段屬靈的荒涼，他與費姊妹交通他個人辛苦尋得的想法，但他仍渴慕對神有更新的經歷。因此他打破自己過去對婦女講道的限制，參加了她在煙臺的聚會，而費教士則享受到山東人因講道和禱告，所產生之狂喜及興奮。當她的英語不夠用時，她就用方言禱告及唱靈歌。然而她的講道真具能力，倪柝聲從她的講道中，被神的道所吸引，感覺自己進入神所賜福的嶄新境界，他找到了一種新的釋放，使他講道裡的枯乾情況，從此消弭無蹤。他打了一封電報回上海說：「我遇見了主。」

接著他在秋季的聚會裡帶來「聖靈澆灌」的信息，引領許多人進入他所經歷的屬天能力中，這個果效持續了兩年之久。一股屬靈興奮的浪潮，和一種注重經歷的嶄新教導，一直傳到南方各聚會——因為直到那時為止，這些團體已被理智限制住了，絕不容許基督徒忽略聖經而單單注重主觀的經歷。雖然如此，禱告會仍以短暫時間由眾人一同開口禱告作為結束，這做法已成了他們的習慣。由於時間的限制，不容許他們一一的祈求，他們只能在這短暫而同聲禱告的時間裡，向神卸下禱告的負擔。這種禱告方式，據說始自宋尚節，是一種在聖靈管治下，最容易讓聖靈感動的禱告，當禱告的聲調逐漸加強而上揚後，旋即漸漸降低，最後復歸安靜而終止。但如今，他們卻讓這種方式達到極度的釋放，或跳躍、拍手、揚聲大笑，或說聽不懂的方言（並沒有翻出來給會眾），甚至連說方言的人自己也不清楚。其間還有一股奇妙醫治的水流；有許多是真的，但也有令人感到懷疑的。

一九三五年底，倪柝聲夫婦到廈門，由於環境上臨時出現攔阻，原先計畫好的特別聚會，到了最

後一刻不得不改換地點。有位晉江（在廈門與福州之間）基督書院的院長吳路加，因擔任宋尚節的譯員而接受了救主，他及時助了一臂之力，開放他家的大房子，舉辦為期十六天的聚會。將近有四百人參加聚會，倪柝聲講題內容為「得勝的生活和聖靈的澆灌」，神的恩福再一次沛然降下。從此吳家就成了一個崇拜和見證團體的核心，他們的見證方式，後來在各城市一一出現了。

李常受肯定地說倪柝聲「從來沒有說過方言」，這也許有可能，但還不能加以證實，而且這種說法常會引起爭辯。倪柝聲確實是認為，聖靈給教會的許多恩賜中，醫病、說方言及翻方言是較小的恩賜。他說：「我親眼見過即時痊癒的神醫例子，我並不反對這些，我所不贊同的是，有些關於神醫錯誤的教導。」他曾說：「有人問我是否反對說方言，我當然不會反對，雖然我對某些以不正確方式得來的方言，仍存保留態度。」他也曾敘述一次經歷：在一個十分混亂的村莊聚會中，神曾用這種方式，傳達了他們所急需面對且令人不愉快的事。但神所籍傳講方言的人，要求不要洩露他的身份。他主張像這樣情形來運用恩賜，才有意義和目的。

另一方面，他也強調「並非所有的人都說方言」。他在「方言」方面的教訓總是平衡的，有一位內地會的年長宣教士，在幾年以後參加他在上海的聚會，聽他講到聖靈方面的信息，他形容這些講道是「我所聽過關於這個主題最清楚的教訓。」

面對有些復興的方法，倪弟兄認為其功效如同「屬靈的鴉片」，它不過是一服日益加重的藥劑，使人耽溺其中不能自拔。在這些事之後，伊利沙伯·費巴也覺得為這種限制所帶來的虧損感到自責，因此她願完全放棄公開講道，透過她頗有恩賜的文筆，及時地發現了十分有果效的職事。三年以後，故事又再度回到它的原路線上。倪柝聲有一次對王開森（譯者）陳述他的意見：「回顧這段時間，我們所得的較少，而損失卻相當大。」

第十二章 工作的再思

由於當時國共內戰的結果——南方地區還有一段自由的時間。因此給上海的弟兄們打開通往西藏的道路，他們覺得神呼召他們到西藏邊區的雲南，兩年之間就有六位到達那裡。他們在藏人中得到熱烈的反應，但是非常缺乏文字供應，藏文的小冊子及聖經都是由上海印刷，再由船運經河內抵達那裡，卻遭法國政府的沒收。倪柝聲為此感到非常氣忿，所以他另外安排將鉛版空運到雲南，直接在當地印刷，雖然這樣拖延了一段很長的時間，但問題終於解決了。

中國各地福音工作的擴展，其推動成功的因素有兩個：一是在宣教團體中的信徒，他們對倪柝聲信息刊物需求增加，書報及解經書籍，深入各個基督徒家庭，供應了因著興奮會所興起的人們，因為他們還沒有進一步的餵養，倪柝聲用簡明的話語來講解基督教教義，他的恩賜滿足群眾的需要。

另一個因素是由於基督徒十分自然地利用他們的家庭做見證的結果。當一個信徒因著生意或公務、搬家時，他的家立刻興起禱告小組，形成另一個新的基督徒見證中心，吸引當地的居民參加。有些是

從異教中出來，也有不少是從各種差會團體來的，他們進入了一種原始教會的交通中。這些男女離棄他們的罪歸向救主，把自己完全奉獻給祂。每一個小核心產生自己的長老，按著新約的榜樣引導他們的活動，提供各項服事。有時也可能因需求而要有更大的房子，但它的聚會地點必定是實用而非紀念性的建築物，他們沒有購地蓋教堂的觀念，甚至除非信徒中有聖靈的工作，為了擴大聚會地點，否則也不租房子。

這個運動也必須有「使徒」。所以全時間的工人，帶著一個巡迴的任務將福音傳到未得之地，把教會設立在當地並造就信徒，然後他們可能向更遠的地區深入，在一個新的環境中，租一個公共場所作為新的擴展之用。

這種活動包涵了兩個觀念：教會及工作。在倪柝聲的眼光中（他自己所塑造的）工作是屬於「講臺式」；教會則屬於「圓桌式」。為了預先排除因著教義及個人因素所成的新分裂，教會是以地方為單位，按著地理行政區（村、鎮、市），有些像老式日爾曼「教區」的制度。他們都是自足、自傳及自治的。相對的，工作則為一種寬鬆的集中組織或交通，由倪柝聲及少數弟兄行使對使徒們的顧問工作，訓練他們，及在神面前負責經濟的支援。當一位使徒站在任何地方教會立場時（而不是在從事廣泛工作時），他要順服當地的長老。一九三八年倪柝聲打發一百二十八位「使徒」出去，從事全時間的服事。

在過去十年間，籍著他們從新約所讀到的亮光與教導，應付他們所遇見的問題，整個工作結構及效果逐漸增長，他們的方法極有功效，且被認為是僅次於信徒的屬靈生活及交通，然而主要的信息還是與基督的合一及見證祂拯救的大能。

這個運動的力量，是基於工作人員的素質，無論男女工人若加入這個團體是出自于個人的意願，沒有任何可獲報償的吸引。正如倪柝聲所解釋的，就是中國人所看到，及宣教士們長期觀察所瞭解的，這是完全不同于外國宣教模式的運動。他們避免提供早期在教會中晉升的捷徑，而是先從宣教士的僕人做起。這些使徒輕看如此光彩的奉獻，雖然實際上自己也是屬於某個「階層」的基督徒，然而他們卻不願意在較有教育及智慧的中國人中自抬身價。因著上述的做法，早期階層式領導的宣教模式終致遭到破壞。

在「小群」的聚會中，人們籍此學習認識主並更多的服事祂，有些聚會甚至以知識份子多數，例如醫生、大學教職員、商人及軍官等。一九三六年全國教育中心的北平聚會處的會眾，幾乎全是由學生組成，這些學生都是燕京、清華、北平協和醫學院及北京大學的高材生，以及衛理公會、長老會醫院中受訓的護士，宣教的醫生提到她們說：「她們是我們中間最好的護士，她們是真材實料的。」

這時期工作擴展的情形，在國內大約有三十多個地方教會，在國外也有幾個。但旁觀者對他們的擴展，觀感是褒貶不一。一九四零年初期在甘肅省的西北部，有一位宣道會傳教士說：「這個運動愈在它的基礎上往前，就愈不能分辨弟兄間無偽的愛心，及不值得稱許之聚會情緒發洩。」其他人也有同樣的感覺，他們可以很公正地指出參與這個運動的人帶有屬靈的驕傲，這種驕傲的思想，特別是在這個運動較興旺的沿海城市的優秀分子當中。這種思想也造成「不顧一切的努力使得其他教會的信徒產生偏見，甚至也使牧師們誤入歧途。」一位英國浸信會的信徒，寫到陝西省的光景說：「一九四二年在西安有一群火熱的年輕人，他們研讀希臘文新約聖經及蓋恩夫人的著作，並且離開原來的教會，成立一個較潔淨稱為『小群』的團體，也有再次受浸的基督徒參與其中，他們聚集『掰餅』，並在每個主日傳

講神的話。他們強烈地反對宗派教會，並批評各宗派在中國所成立的教會淪為外國附屬機構，卻沒有看見自己則是帶人離開教會，建立另外一個宗派。」然而在沿海的浙江省，一些中國內地會的宣教士，則對於他們中間出色的教訓，及基督徒真實的交通非常欣賞。對於那些與差會有關係正處於興旺的教會，由於大量信徒進到他們中間，則產生了教會增長的問題，對他們而言，倪柝聲似乎只是一個偷羊者及極危險的人物。無疑的，他成為許多宣教士身邊的一根刺。

有幾個福建的弟兄們，早已到海外服事，作基督的見證，一九三一年繆紹訓到菲律賓；陸忠信、陳主言、王開森（譯音）到新加坡及馬來西亞，其他人也到荷屬西印度。一九三七年七月，繆紹訓邀請倪柝聲訪問馬尼拉及其他地方，他在碧瑤向一百多位信徒傳講基督徒得勝的生活、聖靈的充滿及教會實行的交通，為期共有四周。

當他再度離開上海前往新加坡時，正值日本全面侵華奪取北平，八月十四日上海爆發敵對情勢時，他早已離開那兒。中國飛機攻擊在黃浦江上的日本船隻，兩架飛機的棄彈，造成一家百貨公司及鄰街中國百姓極大的傷亡。當日本海軍陸戰隊在虹口郊外建立據點時，群眾從周圍地區湧進租界區避難，他們在每處空地立起「稻草村」（注：難民營）。幸好上海與南方的交通還算通暢，一個月內他循此路線與他妻子相聚。他們家是位於撤退區，她與姊妹們在哈同路安全避難，雖然這兒離陸上戰鬥地區七寶北方還有幾公里，仍可聽見槍聲。不久他們的財產被盜，當他們回到住處時，那些東西都不見了，其中包括他送給太太的結婚禮物——一本中文聖經。

最幸運的是他們能很快離開上海，他們繞過戰區，沿長江上行抵達漢口。他在這兒盡他所能的招聚許多全時間的工人，對他們傳講一系列公開討論的信息，正如他一月在上海時所舉行的會議。在這兩個場合中，他第一次放棄可他向來所強調的基督徒內在生活的題目，為要處理一些屬於表面的技術問題。他開始帶領會眾查考哥林多前後書的真理，正如他以前看過的以弗所書一樣，既然保羅寫這兩卷書信是被同一個靈所感，假若有人熟悉了以弗所書的真理，就不致于把哥林多前後書弄錯了。他從經文中把實踐的原則予以具體化及條文化，並把它們應用在當前的環境中，做為工作的指導及塑造地方教會。因為直到如今，工人們都依賴倪柝聲重新整理他個人的指導，他覺得在這混亂的國家中，他需要給他們更明確的立場。為了完成這項任務，十一月他經過戰區，回到已完全被日本人控制的上海，上海每間房子、舢板、帆船上都飄著太陽旗，以表明日本人正在當家，遍處都是鐵絲網，沙包及拒馬，生活物價飛漲，十二月首都南京落入侵略者前所未有的暴行中，國民政府開始向西遷都重慶。

這兩次信息的全部內容，由速記筆錄下來流傳各地，立刻引起了出版的需求。籍著張作品蕙及李淵如在文字上的說明，倪柝聲也幫助預備這些信息以便即使付印，使得全國的信徒及工人能分享這兩次信息的內容。一九三八年三月出版時署名為「工作的再思」。在序言中倪弟兄引用和受恩教士的話說：「神的靈只能按照神的路線工作。」事實上這本書是從經文來探討教會生活中「神的路線」。它是從歷史事件及特殊的任務身上得到啟示性的申論，所以有存在的價值。倪柝聲寫道：「這本書所引用的真理，大都是經過逐次學習及過去幾年的經歷，加上因領受了更大的亮光，而作的調整。假若我們一直保持謙卑，而神向我們不斷地施憐憫，相信將來我們還有更進一步的調整。」

倪柝聲的一些宣教士朋友也要求發行英文版，然而他並不認為這是聰明的做法。因為他的英文名字是「守望者」，與他的職事是並不相稱，似乎只會引起別人的誤解。無論如何，他尋求與一些年長及智

慧人的交通，並計畫與伊麗沙伯·費巴及其他兩位女宣教士訪問歐洲，在他離去前，因著醫生對他肺部的診斷為良好而大感欣喜。

他們與張品蕙一同前往香港，並與倪柝聲的父母一同在此逃避戰火。他們取道安可航線，於七月抵達克萊德（Clyde），他先到奇立康（Kilcreggan）

看史百克兄弟。他們至今只有信件來往，而倪柝聲是他靈修雜誌「見證人及見證」的忠實讀者，他們很快地發現了彼此是站在同一個立場上，然後他們一同往南到昆布蘭的開西（Keswick Cumberland）參加每年一次深度屬靈生命的聚會，在那兒他們遇見了中國內地會的女教士。一個晴朗的早晨，他參加由中國內地會在英國的主任姚如明牧師（Rev.W.H.Aldis）所主領的一個盛大的宣教士聚會。他在戰爭正蹂躪中國的時期與一位日本的講員一同坐在講臺上，給與在場每一個人心中有一種清新的感覺。當輪到他帶領聚會為遠東禱告時，他讓許多人回憶到這是三十年代中的一個啟示。他給予每一個有幸參加此次聚會的人，至今仍難以忘懷的禱告。他禱告道：「主，我們確信你正掌權，我們的主耶穌正在治理，你是萬有的主，沒有人能摸著你的權柄。這是屬靈的惡勢力正在破壞你在中國及日本的權益，所以我們不為中國禱告也不為日本禱告，但我們為你的兒子在中國及日本的權益禱告。我們不責備任何人，因為他們只是你仇敵手中的工具。我們高舉你的旨意。哦。主啊，求你粉碎黑暗的國度，因為逼迫教會的就是傷害你的，阿門。」在開西他曾向一些預備從事宣教的青年們講到「一位宣教士必須具有的資格」；他從以弗所書到羅馬書，講到「主為我們的救恩所做成的工作，及主自己成為我們的生命。」這個題目。最有意義的乃是，在那周結束時，他參加了以「在主耶穌基督裡合一」為主旨的大聯合交通聚會，這些交通公開地確定了他和他中國同工們的屬靈地位，這個地位是他們早在三年前就有的。

接著倪柝聲回到倫敦，來到榮橡路基督徒交通中心。他在這兒與史百克，及教會中的其他負責的弟兄們相處融洽，覺得似乎回到了家中，並暫時以次地為他的總部。筆者即在次與他有幾周難忘的相處。

榮橡路的教會向主的百姓廣泛開放，具有清楚的職事異象，但由於強調十字架在基督徒生活中主觀的工作，容易在福音傳播的顛峰時代被視為有幾分消極，是基督徒活潑的見證變成過分被動，而被所謂「更高的事物」所佔有。不只如此，榮橡路的教會也同倪柝聲一樣，因著傾向脫離傳統的事務，尋求一種更原始或「屬靈」方式的生活及見證而受到譴責。倪柝聲因此再度揀選一種異于福音主流派的路線。

我們因著與他短暫而單獨的交通，及接受他的服事，而使自己的經歷大為加增。他是如此容易與人交談，他的東方文化背景使那些生活在傳統基督文化中的人，在與他討論時感到興奮。他在公開場合中，不論是帶領晨禱或聚會講道，他優異的英語加上動人的態度，使得聽眾大得享受。然而吸引會眾的，仍是他直接把握住一些長久困擾基督徒生活的問題，或者把聽眾帶到他們所規避的一些神的要求面前。並在許多基督徒所擅長的事上，當他更進一步闡釋時，常是「刻劃入微，一針見血」。他也表現出中國思想家的態度，用詞遣字頗為講究，時常將大家所慣用的福音名詞，重新賦予新的意義。

不只如此，他還能透視聽眾的光景，而且看法十分準確，這都是因為他的目標是在高舉他所愛的基督。在他來到的一個月內，很靈巧且關切的指出信仰危險的地方，那就是屬靈的驕傲。他溫和地說，從經驗中神讓他看到，「不要論斷人，免得你們被論斷。」（太七 1）如同「你們給人，就有人給你們。」是同樣的真切，兩者都是神處事的原則。無怪乎三十年以後，他的講話記錄，仍然帶著新鮮及令人驚

奇的中肯，躍然於陳舊的筆記本中。

那時，筆者尚是一個認真的青年宣教士，正要起程前往亞洲。我和另外兩位朋友與倪柝聲長談，從宣教士的經濟到啟示錄，講論到各種事物，這次的交談很有價值。他自始至終從沒有暗示筆者應該離開或加入某一個宣教機構。他最好的忠告，是學習如何在外國文化背景中傳遞主的信息，在頭十年裡穿上學習的甲冑（精細觀察），如同在英國學習開車的人，穿起L型的金屬甲冑，這種甲冑是他頭一次看到並十分感興趣的，後來我覺得對一個基督徒來說，他所提的十年應該無限期的延長。

當時英國正處於歐洲慕尼克的危險中，倪柝聲在英國作客。看出他們在焦急地挖掘防空洞及配發放毒面具，突然在尼維裡（Neville）的張伯論宣佈了所謂「我們這時代的和平」的慕尼黑協定，才使得大家松了一口氣。由於他沒有直接介入這場緊張關係，他體驗到那種超脫及在另一個水準的感覺：基督徒在這個世界上該有像客旅及寄居者的感覺。但他也有屬於自己私人的悲傷，大約這時從香港傳來了一個消息，原先想要有一個孩子的張品蕙流產了。他在信上的語調表現的勇敢鎮定，但他知道，她一定感覺得出這個消息對遠在半個地球之外的丈夫是何等沉重的打擊。倪柝聲也盡力寫信安慰她。後來，一到她能夠外出旅行時，她的婆婆就帶她遠行，取道河內到昆明去探訪撤退的信徒。張品蕙後來再也沒有懷孕，倪氏夫婦從此就沒有孩子。

十月倪柝聲應哥本哈根福迪·克利斯亨（Fjord Christensen）牧師的邀請，到丹麥的赫而辛基國際學校參加聚會，他在那裡有十次一連串的信息，以「正常基督徒生活」為題，講解羅馬書第五章至第八章的內容。這些講章，加上其他相同題目之文章補充，後來就編成了「正常基督徒生活」一書。倪柝聲覺得「得勝的生活」這個詞句太為那些沒有得勝的基督徒所濫用，事實上這種生活才是真基督徒的生活。他強調在神眼中，那些「得勝者」才是正常基督徒，其他的人都算不上正常！在他前往俄典斯（Odense）途中，他用以弗所書的鑰字「坐、行、站」發表了一篇著名的信息。他與許多人都發覺，他在丹麥信徒中的交通靈裡大得釋放。當他來英國時，他曾計畫在西歐最多花四個月時間，然後在十一月去美國。然而這次的訪問似乎不夠完全，因為未能與史百克徹底交通他所看見「完成基督徒身體的實際方法」

當他途徑挪威、德國、及瑞士抵達巴黎時，上海的同工來信要他交通完才回去。因此把他的「工作的再思」翻譯成英文成為必要的事了。幸好伊麗沙伯·費巴正有空在他那兒，加上一個同工菲力斯·迪克（Phylliss N. Deck），他們三人一同工作，有兩個月之久，她翻譯英文，再有倪柝聲刪編，另外又添寫了一篇序。終於在一個月間完成了手稿，他回倫敦又停留了四個月，大都以榮橡路為他的基地，在這段期間他與史百克夫婦建立了互信互助的友誼。

他在倫敦也有聚會，但不是排的滿滿的。他十分喜歡英國家庭的生活方式，在有正式聚會之前，他會在他們之間輕鬆一下，跟孩子們玩玩捉迷藏，穿著藍布大褂，屈身在櫃裡讓孩子們看不到。有一次，他在一場聚會中，分享了一次相當有果效的講道後，他隨他們中間的一些人到雪裡哈（Snrey Heartlands）野餐，給他們留下了「風趣盎然」的印象。他並不全然是一個「非常屬靈」的弟兄，在他們家中，每次老祖母走進房子內，沒有一個人站起來表示尊敬，這事叫他感到驚訝，相反的，若有一個大人，不小心踩到一條狗，卻會轉身向狗道歉。在外國開車每逢下坡，他總是堅持關掉引擎，這是他在雲南所養成的省油習慣。他也會帶孩子們出去吃中國菜，但當他吃起英國清淡的食物時，非澆上

醬油不可，所以他總是想法子弄瓶醬油以防不時之需。

這次在英國他當然能自由來往，他到諾福克（Norfolk）的雪林尋訪和受恩教士在挪維棋（Norwich）時的朋友潘湯（D·M·Panon）。倪柝聲向來看重他的著作，據說他為了表示對潘湯的敬意，在早餐時還為他預備了兩個皮蛋（中國式的蛋）。在另一個開放兄弟會的地方教會中，他遇見了一位名叫約翰·連俊（John Laing）的營建工程師（他後來被封為男爵），他還記得倪柝聲如何委婉拒絕了西方某基金會為了支援他的工作所提供的一筆奉獻。然而最愉快的是，他找到了機會私下與他的老朋友查理·巴羅弟兄重聚，查理·巴羅是英倫派弟兄會中的弟兄。

一九三九年五月，在他離開英國之前，「工作的再思」英譯本在倫敦出版，書名為「我們的職事」，下面印有「見證、人人見證」幾個字，這本書成為當時許多人，競相引用的文章。這段期間正是國際宣教的高峰時期，一些多年建立起來的宣教機構，如今被視為神聖不可侵犯，但已有一些宣教士們，開始坦誠地面對這種制度下產生的含糊問題，就是如何帶領那些悔改的人。一些在圈子裡的人認為，只有把他們帶到新鮮活潑的教會中，他們的勞苦才不致徒然。他們對於倪柝聲強調地方教會單向神負責，對他們而言是一股新鮮的空氣。不但如此，他把「教會」與「工作」分開——這是從聖經演繹出來的合理結論——似乎是一個有用的說法，此外書中也有其他實際能說明的內容，例如透過清晰的思路，論到經濟上的問題。

身為一個中國人，他反對西方各種過多的宗派，一窩蜂的引進中國，同情的西方讀者大多贊同這個說法，但是當他嚴格地強調「地方性」——普遍性的一城一個教會的說法——他們就都停住了，這是經文裡一種可能的推論而已，並沒有別的根據，而且有一位元聖經學者敏銳的指出，書信上所指出的一個城市在新約時代就有一百萬的人口，包羅不至於把信寄給「在羅馬的教會」。倪柝聲似乎要求在數百萬信徒的西方各城中，想法子縮回新約時代的人數，以便恢復新約時代的習慣。

許多人在神面前更坦誠、謙卑的用半生的時間來思考這個問題，他們一邊把聖經擺在面前；一邊把幾個世紀以來，教會因著各種更新所帶來日益複雜的光景互相對照。於是他們詢問前面是否有一條可容我們往前的道路？而不是在本質上，退回到小亞細亞及撒克遜英格蘭「理想」的社會情況中。舉例來說，他的朋友史百克，就選擇了一條較強調基督奧秘「身體」的路線，即今天聖靈自由地賦予他的身體，有各種不同的表現形態，每一種都「見證」了她在天上的頭。史百克在他那本「我們的職事」書上寫到：「要瞭解什麼是教會、眾教會、教會的次序及教會的工作，就必須從神概括的觀點來看，這觀點就是基督。人若瞭解基督是在他各部肢體裡及道路上，也就瞭解什麼是教會，每一件事物都是『在基督裡』。」

雖然史、倪兩位彼此瞭解且相交頗深，但是在這特別的一點上，他們還得花一點時間才能取得同一步調。他們對於新酒的看法幾乎都沒有異議，但倪柝聲所關切的是盛酒的皮袋，他所關注的問題，乃是如何在未來幾年內，將正在茁壯發展，而無傳統約束的工作，納入一種健全屬靈的形態中。然而他在西方得不著他所期望而可實踐的建議，他不得不承認，對他而言，這是一段疑惑的時期，因為他所尋求的問題，各處都無法解決。

回到上海幾個月以後，他寫信給史百克，信上表露出一個做領袖的孤單，上面寫道：「你知道，由於這裡的弟兄們不夠老練，我所說的雖然都好，但他們自己不能尋求認識主的心意。」提到他們之間短

暫交通所產生的關係，他說：「主曾對我說，我的年紀比你輕，在同樣見證上應該尊敬你為年長的弟兄，我認為這次交通給了我很實際的幫助。」事實上他們很少通信，然而在中國，無論是中國人或西方人，仍然沒有出現過像史百克那樣具有身量的人，在他需要時能立刻取得諮商。

第十三章

興 盛

倪柝聲計畫經美國返國，正如他六年前所行的。但是當他前往大使館查詢時，他們提醒他，日本人正利用太平洋的一些港口做為強迫宣傳的基地，以阻止一些中國人從西方回國，所以他做了一個智慧的決定：搭乘英倫直駛黃浦。旅程經過孟買及可倫坡，在印度有短暫的停留。七月回到上海時，他發現張品蕙曾為逗留西方、有戰爭危機的丈夫安全掛慮，這時因他安全回來大得釋放，他們因重逢而喜悅。幾個月以後，他告訴一對新婚夫婦說：「婚姻像舊鞋一樣，越久穿得越舒服。」

當他抵達上海時，這個繁華的城市，因遭到外國的佔領，以及興盛的商業受到戰爭的抑制，仍停留在老舊光景當中。瘟疫從戰區穿越蘇州河，滲入外國租界區，租界由於英國、法國及美國戰艦的防守仍然開放，但現在擠滿了困苦難民。倪柝聲戴著一頂陳舊破損的氈帽，在自己的家中出入，他遇見一種冷淡的靈，這種靈比目前日益加增的困境更為可悲。這是一種為自己爭取生存而不顧羞恥的機會主義，其猖獗到一個地步，甚至有信心的人都不能免除。他在給一位朋友的斷箋上寫道：「我發現許多人為了保護自己，早已變得無情，甚至有些人為著自己沒有感覺到周圍痛苦的光景而向神讚美。至於我自己，我承認因這些痛苦相當難過，但是我倚靠主在祂國度裡站住。我們周圍所發生的事，足以使一千顆心的人破碎呢！但我的父是神！神阿！我從未像今天這樣學會愛慕『神』這個字。」

然而當他不在時，弟兄中間出現了失和的情形，講道的空缺則由張約翰填補，值得一提的是眼科醫師俞成華的講道。俞成華身材矮小而有優雅細緻的容貌，愛好音樂，有時他用小提琴自唱自奏，他在講道上顯出有前景的恩賜，又因愛神的緣故，對主的話語相當熟練。

一九三九年十月的第一個主日早晨，倪柝聲要求教會為歐洲緊張的情勢禱告。他請求幾位弟兄與他一同帶領會眾，他把自己和教會一同帶到神的面前，不求別人的，只求神的旨意行在這次危機中。在這令人相當感動的時刻之後，許多人記得他的結束禱告，他說：「主啊，我們能說你的教會是為此禱告了！」

禮拜一的禱告會及主日晚間的掰餅，現在是分在城裡的幾個家中舉行，信徒在這些家中迫切向神祈求，不讓日本人闖入租界區。為了幫助信徒澄清觀念，倪柝聲於一九四零年初，發表了一篇談話，講到「不是為中國人（或英國人、美國人），而是為在基督裡的男女。」教導神治理世界之主旨的禱告態度。他從波斯王古列到西班牙的無敵艦隊，指出神在世界歷史的安排，都是為了祂自己的子民。他說：「因此，我們必須知道如何禱告，這種禱告必須是能使英國、德國、中國及日本的基督徒一同跪在一起，並且眾人都能為所求的說『阿門』的禱告，如果不是，那麼我們的禱告必定有了錯誤。我們可以

告訴神，日本人對他的態度，但是我們也要同時告訴他，在中國的基督徒及宣教士，在態度上過於傾向美國。而上次歐戰中有許多禱告是不榮耀神的。我們不要再陷入同樣的錯誤中，教會必須能站在超越國家問題的地位上禱告說：『我們在這兒，不為中國人也不為日本人的勝利禱告，只為你所寶貴你兒子的見證禱告。』如此的禱告就不是虛空的言語。如果整個教會都如此禱告，那麼戰爭必定很快就被神的方式解決了。」

文德裡的解經課因受到場地狹小的限制，一位年老的姊妹奉獻一間大建築物及土地，價格只有市價的百分之四十，這在會中燃起了他們的希望。但當眾人等候通知採取行動時，弟兄們把神帶領他們如何處置奉獻的原則告訴她，她收回了奉獻。他們將一幢古老建築物的樓上改建成辦公室，然後在巷子中再找一些招待的房間，樓下有許多支撐三個隔間的木柱（後來加增到五個隔間），加上各種湊合的修改，使它能容納擁擠的聚會，大廳裡沒有暖氣設備，樓板走動時發生很大的吱嘎聲。

林納克（Lena Clark）曾在這兒聚會七年，他描述一九四零年的情形。每個主日早上九點三十分，眾人安靜地擠在這兒，等候傳講主的話。姊妹們坐一邊，弟兄們在另一邊。會堂是寬形的，沒有靠背的長凳擠得緊緊的，房子的兩面窗戶及雙重大門外都坐著人，他們從擴音機聽道，甚至連樓梯上也坐滿了人。這兒攙雜著窮人、受教育及富有的人，有醫生、工人、律師、教師與黃包車夫及廚師。在許多穿著適當的姊妹中，有不少是摩登的婦女及小姐，她們有新式髮型及打扮，短袖及高叉幽雅的絲質旗袍。小孩子及狗在巷口嬉戲，汽車高分貝的喇叭聲，交通秩序相當紊亂。然而每個主日早上，十字架的話語卻被忠實地傳講。罪與救恩、基督裡的新生命與神的永恆目標，服事與屬靈益處——都毫不保留地詳加陳明，講臺上供應著堅硬的乾糧及簡潔的挑戰。

當倪柝聲回來時，渴慕的群眾擠住了他進出會場的入口，他穿著深藍色的棉布大褂站在臺上，以溫和的態度，簡單且周全的內容，及合適的比喻吸引了人們的注意力。為了說明一件事他會迅速在空中畫出一張草圖（事後由一位同工把它畫在海報上），如果為要使某一點更明朗，他會講一個好像發生在他身上的個人軼事為例證。他敏捷的幽默，常使會堂掀起無數的笑聲。在他的聚會中決不會打瞌睡，而且從頭到尾他決不偏出他的主題。他常說：「最主要的是在傳講主話語的果效。」因此每一次他總是在聽眾的思想及心中，留下清楚及深刻的印象。

張品蕙參加聚會，總是安靜、保守且與群眾保持一點距離，但是一直支持倪柝聲的工作。她的姊妹張品芳（包太太），也像其他女同工，忙於做個別交通，而倪柝聲的二姊倪閨貞（林太太）則奔走在城中，暗中說明姊妹們的需要；另外高大、豪爽及穩重的汪佩真，如小鳥般靈巧嬌小而溫柔的李淵如則成了這聚會的陪襯。

一九四零年春天，倪柝聲在聚會中以「神如何對付祂的百姓」為題，從亞伯拉罕、以撒、雅各的故事中做了一系列深刻的講論，特別是強調雅各的生平。他從歐洲回來後，對教會傳講更「屬靈」及奧秘的語句。他第一次聚會的題目是「教會，得勝者及神永遠的旨意」，接著他向信徒及同工講到「教會，身體及奧秘」。李常受參加了這次聚會，帶著屬靈豐筵回到曲阜，使聚會大得富足，為了要繼續與他們在一起，李常受拒絕了一次相當吸引人的美國查經訓練。

這種屬靈的聚會並非倪柝聲的特色，他在不知不覺中，迎合了一些女宣教士的口胃，她們從西方來加入他的交通。這些姊妹與上海其他宣教機構中的宣教士們，形成了一個日益增長的外國贊助團，有

些人是辭去他們的工作而加入倪柝聲工作。這樣的例子成為他們中間心照宣的盼望，於是常有其他人隨從他們的榜樣。一九三八年在倫敦時，姚如明牧師（W·H·Aldis）對倪柝聲表明：「誠心盼望你能回到上海，在那兒能使你及與你有聯繫的人，在跟中國內地會的服事上有更密切的交通。」這種盼望在某些局部性的事情中可能實現，但對較大範圍的交通，則必定失望而毋須感到驚奇。中國內地會的各地主任及宣教士，一直小心觀察倪柝聲的工作，主要原因是對他有偷己得救羊群的顧慮。

宣教士申東·史提恩醫生（Dr.Thornton Stearns），被邀請加入中國弟兄中，成為教會的長老，後因沒有外人與文德裡交往，而難過地離開倪柝聲，這是一個很大的缺憾。由於少數的姊妹特別尊崇倪柝聲為神人，而無異議地隨從他，對她們而言，哈同路的教會不止是基督的身體在上海獨特的彰顯，並且「我們的弟兄」（倪柝聲）是她們在中國唯一能從他身上得到神旨意的人。因為他們被神對祂兒女永遠統治目標之「新教訓」所吸引，認為只關心未信主之人的得救，是偏離了神永遠的目標，而服事及見證、禱告及安靜等候等名詞很容易為「天然人所應用」。這基督身體嚴肅的啟示，是需要天然人經受長期的考驗、破碎，所以只有「靜坐下來，讓神做每一件事！」

如此稍嫌過分的理論，使得一些人找到藉口離開他們的宣教團體，不做任何事的坐在哈同路，無論如何這種教導的本質使他們害怕行動，免得他們「越過聖靈」的帶領，於是給人造成一種麻木遲鈍的印象。這種明顯的光景可以看出倪柝聲對外國人的影響是無效的。但是否其中也有人影響了他呢？這是尚待解決的問題嗎？就某方面而言，當他面對許多西方人勇進時，他曾向史提恩透露，他擔心這些從宣教團體來的「外來者」，會造成他們聚會的分裂。一九四一年兩位富於理想但缺乏見聞的青年宣教士，他們立場不甚堅定，卻急切地想投進倪柝聲的工作時，他對他們的忠告真是合乎心理學的理論，他說：「你們目前心情上或許有一點困擾，需要有個好的假期。到海灘去，找些孩子們摔跤！」這是適時且迅速有效的處方，而這一種成熟的結論，也是相當公正的。既然哈同路的聚會，是代表沒有外國人的中國基督教，所以基於某種特殊的情況，外國人不加入這個見證是值得商榷的。這些宣教士們很欣賞「地方教會」在工廠的見證，他們可以在旁邊盡最大的努力為教會增長代禱，自己卻仍可以留在他們的職事上。

屬靈的怠惰，絕不是「小群」工作上的光景。有些團體以為他們在恩典中增長，是因為他們看重查經，但是真正增長的力量，乃是他們在福音上的見證及拓展。他們藉著倪柝聲新提供的一系列初信課程，對悔改的人做富有創造性的追蹤，使工作得以加強，甚至福州的「福音背心」一直成為街道及鄉村見證的方式。並且在文德裡普及的兒童主日學工作，雖不顯眼卻快速地在各個家中推行，沒有佔用會所的空間。倪柝聲卓越的福音小冊，不單文字優美色彩鮮豔，而且容易分發及討論其中內容。倪柝聲藉著他自己堅毅的例子，明確地指導信徒如何向人們介紹罪人的朋友，雖然神可能賜給教會一些福音使者，指示提摩太要「做福音使者的工」，倪柝聲則把這權利賦予全體會眾。他的規則是，每天最少向一個人做見證，他發現了一件令他驚奇的事。在一條二十戶的巷子內，有一位女傭信主，她決定開始向右鄰的女僕作見證，直到巷底。她把第一個女僕帶來歸主後就一直繼續下去，當這個故事傳到他耳中時，已有六位女傭找著了救主。

雖然情形如此，上海教會最興旺的幾年，都是在激烈批評下做見證的。他們批評教會因聚會所的計畫聚會變化無定；特別是聚會常根據傳講人心中的負擔而臨時召聚，並沒有一些固定的時間。其他人

則攻擊倪柝聲的教義，一位有名的宣教士說：「今天太多中國人轉向倪柝聲，認為他是一位把他們帶回新約真理的教師及領袖」。他覺得需要發表文字說明，攻擊倪柝聲籍著「使徒」的名義，開創了「嚴重錯誤」的事工，並且控告他「拐騙眾多的門徒來跟隨他」。一位中國人，宣稱他得到裡面的啟示，出版一本小冊子斷言倪柝聲不斷接受外國資金的供應，來支持他的工作，甚至攻擊他在使用這項資金上不夠廉潔。這一位領袖的身量，似乎是諺語所說的「若有人把頭伸在眾人之上，他的頭遲早必被砍下。」或者以聖經上的話：「凡立志在基督耶穌裡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提後三 12）

基督教宣道會（Christian and Missionary Alliance）是倪柝聲私下最稱許的宣教團體，有一陣子他與其中一位宣教士相處融洽，後來這位宣教士令他失望，因他在雜誌發表一篇指責倪柝聲及其工作的文章，倪弟兄覺得這種指責是不公正的。然而他自己有一套為自己辯解的哲學，他說：「如果我自認為對，而我的弟兄卻判明是錯的，那麼弟兄所指出的錯誤對我又有何益呢？更重要的，他認為我們如何對待在主裡的弟兄，主也以此對待我們，如果我們仁慈，祂也必以仁慈待我們。」（可十二 17）

為此緣故，他壓抑自己的感覺，從講臺上隱退，暫時溜開幾個禮拜到曲阜。在曲阜有一位朋友發現他的心情極其低沉，需要在情緒上得到釋放，所以向他挑戰說：「你試過讚美主嗎？」倪柝聲說：「我試試看」。然後走到網球場，他用他那剛得痊癒的肺，集中全力吼著「哈利路亞！」這個處方得著效果，他很快地再回到講臺上。

倪柝聲有時卷起他碩長的身子，與一些同工們一起坐車出去服事，所以有些上海人給他起了一個「兒童遊戲」的綽號，就像孩童整天把自己關在車房遊戲一般。有一次陸忠信徒馬尼拉回到上海，倪柝聲正杭州分享一位青年工人的服事，這位青年工人名叫江守道，有聖經教師的恩賜，他們都認為他很有前途，不久江守道與他的妻子，被教會送往新加坡幫助工作的推展，他們在日本入侵新加坡時得以倖免逃脫。

他們也因著神對他們特別的照顧而感受到喜樂，有一天倪柝聲夫婦被邀請到一位女士家中品茶，她把一個包裹交給張品蕙，令她覺得奇怪。張品蕙把它打開，發現是倪柝聲給她的結婚禮物，這本聖經是日本人攻佔上海時，在他們家中遺失的，原來故事是這樣的：有一位中國傳道人，在愛爾蘭的一個聚會中講到，正當他講道時大聲說：「如果我有一本中文聖經，我就能把這一段講解得更清楚！」令他驚奇的是，他們竟拿出一本中文聖經。他問道：「你們怎麼會有這本聖經呢？」他們說，有一位朋友的兒子，他曾在租界區的英軍中當兵，有一次被某種想獲取戰利品的直覺所驅使，走進一間空房子揀起這本書。在書的空白頁上他讀到一句英文：「讀此書能保護你遠離罪，罪必阻撓你讀此書。」他想這本書必是一本聖經，所以把它流下作為紀念品。這位傳道人看一看署名，他發現他認得這些中文名字：「品蕙存，柝聲敬贈」。他要求能否送還原主，他們很快答應了。

這時倪柝聲的母親把她丈夫留在香港，自己帶著大女兒閩臣（陳太太）到上海與倪柝聲及張品蕙同住一陣。雖然在教會她只是一個姊妹，但是在家中她仍然以母親的地位管理這個家。她常常出去傳道，為病人禱告，向每一個人作見證，範圍是從專家到鴉片鬼。但她為了與兒子保持融洽很少干預他，有時倪柝聲出去探訪，沒有人想到為他預備些吃的，這一點略使他感到苦惱。他說到有關家譜及父母的養育，1940年7月他對同工們說：「有時我們會覺得生錯了家庭！但是神決定我們該是誰的兒子。神對約瑟有特定的工作。我們希望他該有較好的兄弟，但是他卻說：『這是神差我在你們以先來，為要保全

生命』。我們整個一生不僅是由我們悔改時開始，而是從頭至尾神都為我們安排好了，為要達成他最高目的。撒母耳、以賽亞、耶利米及保羅這些神人，都是神在需要他們以前早就預備好的。『這不在乎那定意的，也不在乎那奔跑的，只在乎發憐憫的神』（羅九：16）」。

1941年12月7日的主日，日本人攻擊夏威夷的珍珠港。第二天上午八點，上海下著濛濛細雨，好象蒼天為上海五百萬百姓落淚一般，日本人擊沉黃浦江上的英美炮艇，並進佔國際區及法國租界。鐵絲拒馬阻塞在路上，汽車被徵用，腳踏車變得昂貴，公共汽車停駛，食物高漲，集中于倉庫的難民由於鼠疫死亡的人數急速增加，加上棺木昂貴，所以死在城裡的人無法埋葬。犯罪率升高，日本人並不關心，百姓害怕激烈報復，所以不敢攻擊他們。

1941年12月8日，倪柝聲的父親死于急性心臟病，一個禮拜後日本佔領了該城。他父親享年64歲，不久倪柝聲到香港安排葬禮。倪文修死時已是神的一位真兒子。

第十四章 引 退

一個奮興佈道家能夠自由地往前——把工作交給別人去照顧——來到神面前，這是一件有益的事。作為一個使徒的倪柝聲，他需要栽培教會，關心他們的建造，他的確承擔了相當重的屬靈責任。這幾年間較重的負擔，就是政治的危機及交通的破壞，但更為緊急的是，他為著那些散佈全國各地忠心服事的全時間年輕工人，因缺乏固定的薪金而深感良心不安。他早期的經歷曾證實神供應他實際的需要，所以他知道這是他們付代價服事神的考驗。當他仔細察看其中一位經過極嚴格的信心試煉後，他說：「當我們流淚時，仍用手扶著犁，這就是基督徒。」所以他能向一個同事寫到：「縱使教會的事務，及這世界上的事，都壓在我的身上，超過我所能勝任的，但我仍然能在交托主的光景中往前。」

也有人問到如此快速擴展的工作，將近兩百位全時間的工人，外加廣泛的旅行，出版計畫，房屋租金及購置產業，而財務的支援情況主要來源是個人的什一奉獻，他們從來沒有強制實施「什一」奉獻，因這奉獻被視為個人完全奉獻給神的表徵，但給的律正在教導而且仔細實行中，所以所有地方教會都能自足。但在教會與領袖之間，工作與同工之間有所區別，這些工人不需要負任何地方教會的責任。當教會有了突破性新的福音工作（比如：會所臨時雇傭人員，印刷聖經及小冊的開支），整個開支就無法顧到工人家庭的需要，他們可以接受教會及個別基督徒的奉獻，也就是所謂的信心生活。但屬靈上的商議及物資上的支持則多少靠倪柝聲個人親自照顧。將近有四十位工人實際上是由他直接負責，工作的基金自然與教會的奉獻是分開處理，是由他及二、三位年長同工一起管理。

中國人對商業有一種特別的看法，神救恩的信息，也把許多成功的商人帶進教會。其中有些人為了表示他們對主的愛心，豐富地供應教會擴展工作。這段期間倪柝聲有一種透徹的說法，說到「瑪門是不義」的事，如果埃及在神的預定中要被「敗壞」，那麼我們自己及錢財，都要越過神的物與世界錢財的界限，而不是只把錢財送過去就行了。為此他不反對世俗的工作，反而隨從保羅對提多的指示：「使

那些已信神的人，留心作正經事業。」並且我們的人要學習正經事業，預備所需要的，免得不得果子。」（多三 8、14）

早期由於日本人佔領東南沿海，使得長江流域的貿易癱瘓，許多中國商人的收入停止，因此整個財務因依靠在這些商人身上，使主的工作遭受打擊。在他從海外回來不久的一次危機中，倪柝聲曾兩次收到從英國寄來的奉獻。因著日本與美國的敵對狀態，通貨膨脹突進，租界區的中國商業幾乎停止，任何基督徒在事業資金的周轉上幾乎不可能，因此，他看到許多忠心的年輕「使徒們」及他們的家屬挨餓、生病及財務上的困境，而教會一般的信徒也沒有比較好，他們與倪柝聲都湊不出錢來幫助他們。

故此，倪柝聲來到一個意想不到的轉彎上，也許有些人會覺得不相稱，他為這件日漸加增的經濟問題感到沮喪，幾個月來一直在神面前尋求解決。一九四二年年初，他採取了一個自己覺得是神帶領他的步驟，但卻在一些朋友心中，引起很大的問題。

他的弟弟倪懷祖是聖約翰大學的化學學士，曾在他私人的實驗室中研究化學。他也在上海設立一個製造及分銷藥品的公司。倪家弟兄也有人參與這項工作。這個公司並不興隆，因為懷祖只是一個教員及科學家而不是商人。倪柝聲看見這兒是有些前途，因它沒有軍事色彩。而它能夠存留的原因，是因為它應付裡戰時的需要。

早在一九三八年倪柝聲還在倫敦時，他曾建議弟弟申請一張磺胺藥劑製造的許可證。現在他想創設一個聯合公司，從事製造高級的綜合性藥品，利用他弟弟化學師的經驗，把多餘的利潤用在主的工作上。所以中國生物及化學實驗室，便在上海膠州路九號成立。他從香港請來殷祖瀾做經理，他是多年前倪柝聲在牯嶺療養院向他作見證時被拒絕而年輕病人，後來籍著宋尚節的被主得著。起初，倪柝聲以董事長的身份，把事情交與經理管理，自己則從旁協助監督整個事業，後來卻落入穿著時髦直接參與生意商談的工作，然後回來換便裝去探望聖徒。他戴著一頂帽沿下垂的帽子遮住了他的頭，使他看起來活象一介匪類。陸忠信說，有一次他跟陳主言及樂腓利到倪柝聲與張品蕙所在的友華村十三號簡陋的家中拜訪，當他們坐在冷清掛著黑布廉子的房子中，窗戶粘著防碎的紙條。他提出眾人的問題說：「為什麼你離開神的工作去做生意呢？」他回答道：「我只不過做保羅在哥林多及以弗所所做的。」（徒十八 30，二十 34）又說：「但有一些不同，因我是短時間的，我一天只花一個小時，訓練公司的業務代表，其他的時間我做主的工作。」這些業務代表，也是他強迫的「眾使徒」，他鼓勵他們在做生意時，也為福音作見證。但在逼得緊時，他曾悲傷地說：「我像是一個失去丈夫的婦人，為了經濟的需要，必需出外工作。」

因著日漸加增的煩惱，他提出一個意味深長的理由，如同一個有才幹的人，被平凡的事務困住，所有雄心壯志面對環境變故而受凍挨餓，他的難處正像中古世紀的一項毛病，「一種對敬虔操練的輕視，憎惡自己的職業……特別是在唱詩時，本人不合時的呵欠擾亂了詩章。」起初他難於處置這些困難，後來他在患難中堅定下來，這正可以用喬索{Chaucer}補救的亮光來解說：「如果想針對怠惰及其併發症下藥，有一種叫堅毅的德行是最好不過了，這種德行得平凡的人，能籍著他們自己而睿智明理的意志，來從事困難及重大的任務。」

他這種新生活的方式，最初引起適合朱臣、杜中臣等四位長老的疑惑，他們心理想他是被沾汙了，在他們的眼中是一個叛徒，或是換個補語認為倪柝聲是一個扶著犁往後看的農夫。他們自問，像這樣

的人怎能傳講神的話呢？到一九四二年年底，他們要求他停止在文德裡的講道，雖然俞成華是有敏銳感覺的人，但對立刻從傳道退休有點猶豫不決。倪柝聲垂頭喪氣，不知道該做什麼。當他與殷弟兄坐在一起，分享他所喜愛的福建大橘子時，他對殷弟兄說：「我真羨慕你，能夠自由地在工廠做你所喜歡做的事，然後你在聚會時交通幾句話，他們必然認為你是一個很熱心的弟兄，沒有人會懷疑你。而我呢？他們要清楚知道我二十四小時是怎樣應用的，因我是一個受到注目的人。」

一般信徒對長老們所提停止倪弟兄講道的理由，引起很多揣測，由此招致一些非常嚴重的說法。一些惡意的批評指出他的生意是與世人同桌吃飯，而這些人都是他過去見證所結的果子。既然負責弟兄保持沉默，他覺得他的整個見證都被人懷疑，但是許多工人需要都依靠他，所以他無法放棄他所承受的負擔，在以後的兩年間他們沒有太與他接近。當他遭受攻擊時，他回想到和受恩教士慈愛的面龐，他就不想再為自己辯解，只好接受他們的處置，就當作是從神而來的管教，神必在祂自己的路上為他伸冤。

起初張品蕙並不領會他的態度，且在生意上很努力地幫助他。有一天她聽見倪柝聲接到一個電話，對方繼續不斷的說，且聲音很大。倪柝聲只是聽著，且偶爾回答：「是！是！謝謝你！謝謝你！」掛斷後，她問說：「是誰打來的？」「是一個弟兄，他說，我做的是錯的。」她問：「你都承認了吧？」他答道：「沒有。」她不耐煩地高聲說：「那你為什麼不向他解釋，而只是『謝謝』呢？」倪弟兄回答：「如果有人把倪柝聲抬到天上，他仍是倪柝聲。如果有人把他踐踏到地獄裡，他仍然是倪柝聲。」神是公義的，這對他也就足夠了。然而更戲劇性地是那些暗地在經濟上接受他幫助的一些弟兄，卻公開地反對他。

一九四三年初，日本人預備在他們的拘留營（或稱為平明收留中心），把一些外國人集中在一起，倪柝聲盡其所能的幫助他的朋友，雖然往後日子非常艱難，他仍然變賣了一切有價值的東西，特別是照顧史提恩醫生（Dr.Steans），他因為重病躺在醫院裡，無法與家人到集中營去，三月十六日晚上，當伊麗莎伯·費巴及菲力斯·迪克姊妹尚未進入城南的龍華集中營前，他們在小屋的四面圍上紅色及黑色布廉，並用一個簡單的爐子做飯菜款待這兩位客人，他們在簡單的飲食前向神禱告，宣告祂的信實。然後兩位姊妹深夜回到她們在天鵝絨巷十七號寓所時，發現鑰匙放在屋裡，於是正如她們有時所做的，菲力斯·迪克姊妹從屋後儲藏室的窗戶爬進去，當她正在爬時，突然受到撞擊而跌下來，當場就死了。這位極敏捷及聖潔的宣教士，據說她死時仍然帶著微笑。

倪柝聲為中國生物學實驗室取一個中文簡名為「生化製藥公司」，這個名字也巧妙地包含著藥效宣傳花招。他們所生產的消毒劑除紅藥水外，又開始製造消炎片、磺胺藥劑、強力維他命及 Yatren。由於新計畫的需要因此佔據了他的時間，這些問題是他未曾預料的。因為若是經營一個生意，那麼你就不是自己的主人了。每當一樣新藥品第一次推出時，他們便遭受其他大公司在商業上的猜忌及致命的競爭，他們也遇到股東的埋怨及維他命注射液過敏的報告，再者家庭式的生意也是脆弱的一環，使他受人懷疑，因為他們要求對新出藥品的配售權。他將組織及協調的恩賜都用在管理上，加上戰時的情況使得營業困難，所以需要更仔細的經營。結果，倪柝聲很少在上海。

他為了匯款給工人的事，便與懷祖一同安排，計畫長期離開上海。因為日本軍隊向西推進攻擊政府軍隊的據點，普通中國平民是無法越過前線，他只好籍著航空通過戰線前往重慶。當時有消息傳到上

海說自由地區的省分有屬靈的複生。重慶由於有最好的臨時流亡大學，興隆的商業及投機銀行家的捲入，使她暫態進入了二十世紀的水準。倪柝聲並不計畫與日本人做藥品生意，他著手在這些極大需求的地區，調查改變銷售網的可能性。他這個計畫非常成功，不久他便與政府訂了合同，使得生化製藥公司成為中國主要藥物進口及製造、批發的大公司之一，雖然有人在福州謠傳他們缺乏經營能力，這不過是沒有根據的傳說。他花了兩年半的時間往返于上海及重慶的旅途上，且在重慶租了一間小屋，張品蕙也同去，她年輕的弟弟撒母耳也在四川幫助做生意。城裡的聚會，也因各地逃亡到此的基督徒而加增，在江守道弟兄服事下逐漸興旺。他跟他的妻子瑪利從日本佔領下的新加坡逃出，經過印度抵達此地。倪柝聲著手幫助一些逃亡的弟兄們，把他們安插在製藥工作上，並用他那清楚有力的言辭傳講的話。一九四五年他以亞西亞七個教會的題目傳講了一連串的信息，這些信息等於是以自己的觀點，籍著教會歷史發展的過程，來強調地方教會是神的重要策略。

他在這雙重的角色上表現他的才智，使他的才能有了前所未有的表現，並且樂在其中。但是他素來孱弱的體格，這時開始在他身上現出他的壓力。有一陣生意上的需要太大了，以致他很少或幾乎沒有剩餘的力量來指導聖工。一九四五年，他大姊的孩子陳終道是復旦大學的一個學生，他每天都在重慶一家旅社與他們見面。他發現倪柝聲是被世俗的掛慮所佔據，幾乎失去了以前所有屬靈的安息，顯然這正是一個改變的時刻。

同時，在上海哈同路的聚會，因為人數的減少，也有一番的努力。後來，一方面是由於失望的緣故；另一方面是為了避免參加由佔領當局所發起的宗教合一運動，他們解散而到信徒家中聚會，這也是一個極佳的預防辦法。日本人在城裡各個區域，用拒馬阻斷交通，有時一個地區可能忽然關閉幾個小時、甚至幾天，在劫掠嚴重的情況下可能把它關閉幾個星期，若被困在其中就無人能出來，因此造成無可言喻的痛苦。哈同路的教會也像上海其他的基督教團體，在私人住宅的聚會中存留下來，最主要原因，是那被聖靈引導的基督徒能夠帶領此種聚會。

八年的中日戰爭終於結束了。末期，日本人從漢口向南推進，想把中國切為兩半，後來因為日本本土遭到嚴重轟炸，及美國陸軍入侵的威脅，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六日向盟國無條件投降。九月九日在南京與中國簽降。

由於交通不再有危險，所以倪柝聲離開重慶。耶誕節期間他去到香港，不久便返回上海，但仍然沒有講道也沒有與教會修復。信徒靈裡需要他的說明，卻礙於有關他的謠言所混淆。有人暗示他曾誤用教會款項，或說他曾與日本人合作，甚至他親近的同工也承認，因他屬世的工作感到不平安。他對一個友人說：「我已全交在神的手中。」很明顯他未曾受到攪擾。

在其後幾個月中，他計畫從生化製藥公司退出。在滿足股東的要求後，他跟懷祖商議，把一大筆的利潤轉入工作及將來供應工人之用，其次他回到福州，位於南台島海關港十七號的老家，這個房子正空著，有一個大花園及小房間，是訓練工人的理想中心。所以在張品蕙幫助下，他們把它重新整理好，並再次為主所用。

回到倪柝聲童年的環境中，他籍著禁食、禱告及讀經尋求調整他的思路。在這幾年的困難中，他一直沒有停止讀經及計畫擴展福音的工作，問題是現在要從哪裡著手？他需要安靜下來等候，看看神如何帶領往前。忠心的俞成華醫生，在爭論中回來講道，於是慢慢地信徒又再回來聚會，他以「內住的

基督」請求他們彼此復歸和好，進展的情況相當緩慢，似乎還需要作其他的調整。

倪柝聲考慮他的朋友李常受。他留在日本戰線後的山東，戰爭的情形並不很激烈，沿海各城市聚會的人數迅速地增長，特別是李常受在曲阜的聚會，由於他靠著神的大能傳講真理，有相當顯著效果。一九四六年中倪柝聲從福州寫信給他，把上海的需要告訴他，請他到上海來幫助。李常受得到神在他心中的印證，與家人向南遷移到南京，他從這個據點開始從事南京及上海兩地的復原工作，雖然這個工作似乎有點遲了。

他的信息加強了俞醫生的工作。「內住的基督」是神的百姓合一的盼望，正如他是信徒生命的源頭。而李常受弟兄是一位實行家，將倪柝聲仔細考察聖經所得到的教義基礎，籍著他那山東人的勤奮及火熱，把它輕鬆活潑地介紹出來。如此有了迅速的回轉，幾個月信心恢復了，人們再度湧向聚會，人數像滾雪球一樣的增長。

李常受是位精力充沛的治理家，善於處理大群的人且具組織才幹。這個恩賜正好用來解決混亂中的上海聚會。早在一九四七年會眾就在分區的情形下參加聚會。增長的情形持續一年多，他們兩週一次在文德裡聚會，視文德裡為「上海的教會」，主日早上十時傳講神的話（每月的第一個主日傳福音，其他三個主日講道）。每週三次在「家」裡聚會，主日晚上分開在十五個地區的各家掰餅，禮拜二晚上禱告會，禮拜五晚上初信造就。另外禮拜三晚上在四個家有集中的福音聚會。長老們負責整個教會，但各家有一位帶領的弟兄及一位姊妹，還有一位「輪值的執事」幫助他們值班及處理問題。

不久他們發現信徒喜歡更換地區聚會，所以一九四八年六月就把人們分配到各區，並勸告他們要「順服那些治理你們的。」（來十三 17）解決人們移動的事情。這時，因為人數加增，牧養的問題顯得重要。一個家的人數從四十到兩百不等，所以又再把它分區或分排，每排約十五人，大概都是住在同一條街或巷子中的信徒，有兩位同工負責照顧排內信徒參加聚會，及他們屬靈的光景。這個系統使得教會在日本統治下分散時，看出它的價值。主要是因小型聚會使得參加禱告交通的信徒更親密，並且在強迫學習帶領中，使得屬靈恩賜得以成長。有一點十分可貴的，使他們沒有區分弟兄或姊妹聚會，沒有學生的特別聚會，也沒有其他社會階層的聚會，因為教會是不分階層的。但有傳講恩賜的姊妹似乎產生了問題，偶爾有姊妹聚會，為這些有恩賜的姊妹安排。有一位在廣州聚會的青年基督徒回憶說，有一天他發現有一張大白布橫掛在會所中間，他問這是做什麼，別人告訴他因為李淵如及汪佩真姊妹來看望地方教會，她們既然不得不向弟兄傳道。弟兄們只好坐在白布後面聽他們的信息。

福音不只是傳道人的工作，也是教會全體的工作。所有信徒都被訓練成「陪談員」，福音信息結束後，每個人與坐在旁邊的人交談，記下他的姓名及地址，問他一些問題，也讓他發現，如果可能的話，在自由的情形下，帶他禱告呼求主的名，有時就在這個時刻他就得救了。宣教士們看到這種光景都留下相當深刻的印象。

禮拜五晚上，特別配合初信者的需要，向他們講解神的話。一九四八年倪柝聲基於他們的需要，提供有系統的基督徒初信課程 52 題，範圍從因信稱義到教會生活的實行原則。這些課程由上海每一小群的領袖來指導，也廣泛地應用在大多數的教會中。一年的課程對於那些對主認真的人，實際上是積極性的，缺課的人要自己在家補課趕上。如果有人來尋求主的救恩，很快就能明白它所有的內涵。

由於組織活動過分的發展，使得早期靈裡的自由逐漸喪失。記錄卡的系統很快應用在聚會中，包

括一個完整的信徒索引——有位址、職業、家庭等等，意思是說只要你沒有來聚會，他們便能夠很快地與你聯繫上。掰餅是「有限制的」，你必須經過正式介紹或戴著名條。或者你能作自己重生及愛主的見證，他們也會接納。在過去，掰餅常是由細的察驗才能被接納。1940年倪柝聲勸告一位弟兄說：「不要期望聖靈在青島做與上海一樣的事，要讓他自己做工。」但不久編組的工作藉著權柄的手，加強在各工作中心點。李常受小心的否認了「組織」觀念的關係，他解釋：組織像一個盛水的杯子，這種安排不過是成為交通屬靈的器皿，但他強調教會中的每一個人都要順服。他勸告說：「先問清楚，否則不要做任何事，因為墮落的人是照他所喜好的去行，這裡是有等次及權柄的地方。教會是一個有嚴格紀律的地方。」

第十五章

歸 回

這是在聚會所負責的弟兄，因著倪柝聲長久離開他們的服事，心裡感到非常沉重。早在1946年，李常受曾向上海的長老質問說：「你們是否在靈裡決定開除他呢？並且開除的結果如何？你們能否說這是帶來生命呢？」他們憂傷地回答：「不是的。」同工之間感到良心內疚，從1947年4月他們中間一位同工的談話，可以知道他們正耐心地找出一條挽回的道路。他說：「倪弟兄的事，真是我們的致命傷，也不知道結果要如何，控告他與敵人合作的事完全是沒有根據，並且他們所說的也沒有根據事實。這是撒但的工作，更證明我們自己靈性的低落，盼望我們都能學到功課。反對他回到我們中間的因素正逐漸消除，並且歡迎他回來的意願正在增長，許多在上海的弟兄不斷地到他家去拜訪，希望藉著這種交通，眾人的心再次聯絡在一起，可以清除一切的阻攔。我們正等候那一刻的到來。」

有兩位基督徒商人應倪柝聲的要求，接替他在製藥公司的責任，四月他得以抽身再前往福州，臨走前他表示已預備好隨時回到上海的教會。福建及各處的宣教士多數已再回到他們的崗位，集合他們失散的羊群，但外國工作人員比以前少。宣教團體仍然擁有在城東鼓嶺山上的度假房屋，其中兩棟由石頭砌成，靠海邊那面有擋風圍牆的大平房要出售，倪柝聲便買來作為長期訓練男女工人的中心。

1947年夏天，有一小群工人從福建、浙江及其他各地（包括從香港來的老同學魏光喜），他們在此參加他密集課程的學習。倪柝聲在起初的十次信息，是回到他的屬靈起點上，講「十字架」信息的基本原則。這篇名為「靈的釋放」的文章傳閱很廣，其中提到「破碎」是釋放屬靈能力的一個條件，並以耶穌的話：「一粒麥子不落在地裡死了，仍舊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結出許多子粒來。」（約十二24）為印證。他們建立了一個合適的根基作為新的開始。在上海的一所新設立的國立大學，一場為剛得救學生所舉辦的聚會中，神大大地使用他。在福州有人為他租下美國差會（American Mission）的大禮拜堂，無數的群眾從周圍各處湧來，要聽這位從前是31學院的學生講道。神似乎在祂僕人傳福音的見證上加上了新的印記。

這是李常受仍集中照顧上海及南京教會，到了年底他在繁忙中抽空探訪處於饑荒之南部各省的地

方教會，並於 1948 年 2 月結束了他在福州的一連串聚會。這些工作告一段落，他與一些同工包括汪佩真姊妹，一起到南台海關巷的倪柝聲家中商談。自從中日戰爭後各地的工作缺乏照顧，李常受關心各處工作的虛弱及孤立，他充分印證了倪柝聲的訓練計畫，也討論到他在日本佔領的北方所發展出來革新的傳福音方法。

當時山東沿海城市的教會，在二十年間有極大的增長。李常受已擬訂了一項移民傳福音的計畫（這些想法可能是他想出來的。誠然，為了人口及商業的緣故，中國一直是在移民，北方穿過長城到東北，西到新疆，東南進入南海）。山東的代表弟兄說：「現在我們在沿海有相當多的聚會，我們在遙遠的地區支援一些孤單的拓荒者，這種方式是不切實際，也得不償失的。我們可以把一群離開曲阜，移居到福音未傳之地的信徒，組織成為一個自立的經濟團體，讓他們在那兒成為基督徒生活及見證的中心。」

他從使徒行傳中發現了先例：「從這日起，耶路撒冷的教會，大遭逼迫。除了使徒以外，門徒都分散在尤太和撒瑪利亞各處。……那些是分散的人，往各處去傳道。」（徒八 1~4）又說：「那些因司提反的事遭患難四散的門徒，直走到腓尼基和居比路、並安提阿……講道，傳講主耶穌。」（徒十一 19、20）弟兄們說：「現在我們尚未遇見這中逼迫，但即使沒有逼迫我們仍能效法他們的榜樣出去。」

李常受研究了這個問題，小心地計畫出各種細節。一群經過挑戰的家庭，包括個人光景及各種適當的職業及專長——園丁、鞋匠、教師、護士、理髮匠——為著他們的將來都是經過仔細挑選。（理髮匠的職業最受歡迎，因他們裝備簡單，最容易有作見證的機會。）教會供給這些奉獻的人旅費，及抵達目的地後三個月的生活費，盼望三個月後他們能新的地區自立。

回溯到 1943 年春天，有兩個團體離開曲阜教會，一組有三十個家庭，他們進入東北；另一組有七十個家庭，移向西方的市鎮，他們經過山西沿包頭鐵路，進入遠在長城外的綏遠省。這兩個團體都遭遇到極大的艱難，計畫沒有完全成功，並且因著這個計畫，一九四三年五月李常受被日方視為有間諜活動嫌疑，在鞭打及「水牢」中經過一個月嚴厲的考問。無疑地從這次移民嘗試中，結出了真實屬靈的果子。一九四四年十月，一位在汕頭聚會的宋姓弟兄寫信給上海俞成華醫生，這封信是從黃河上游的一個市鎮寄來，信中提到他們在一九四三年十月五日，以七個弟兄三位姊妹為核心而開始聚會，然後在一九四四年二月十九日他們為六位初信的男士施浸。信上說：「我們室內沒有地方為他們施浸，但他們都急著要遵守主的命令而不能等待。所以只有一個行得通的辦法，就是打破黃河二尺厚的冰來受浸，當時氣候相當的冷，有一天突然暖和了二十度，我們在河旁架起活動帳棚，整個過程沒有一個人被凍倒及生病。」三月二日他們舉行第二次房門，這次比較困難，因為冰下沒有水，他們不得不沿河而下找到一個較深的地方。這次也沒有人生病，且有極大的喜樂，在信的結尾還附上鼓動上海信徒的幾句話。這是在許多籍著這種方法，設立福音見證中心，新生命發芽的一個例子。

一九四八年二月在福州倪柝聲的家中，他們討論把這些經驗用於李常受在南部所見混亂光景中。李常受則建議不是把它應用在像廣東及福音這麼大的地區，而是籍著集體的努力可否把福音傳在像福州這樣的中心點上？

倪柝聲同意這種做法。他指出耶路撒冷不過是一個中心，神的方法是把他的工作集中在這裡，拯救靈魂，建立教會，然後打發人們去撒瑪利亞直到地極去傳福音。他說：「一九三七年我們在漢口看到使徒行傳十三章，使徒門從安提阿出發是對的，但是使徒行傳不是從十三章開始，而是從第一章開始。」

這幾年我們的失敗，是我們沒有按照耶路撒冷的原則建立起工作的結構，我們必須集中同工的力量來服事中心各點，直到地方教會完全建立起來，然後把整體移到其他區域——除非神興起逼迫把他們分散到各地。」

這一點新的亮光照亮他們全體。李常受說，他們都來到倪柝聲那兒，恢復以往的交通，神藉他給弟兄更多的亮光。正如他們早期看到教會是嚴格地一城一個地方教會，現在這種廣泛的福音移民原則，使他們的工作也得著更新。這可能意味著：「使徒們」或工人們個別冒險的結束。李常受說：「現在我們同工願意放下自己的工作，決定以福州為我們的耶路撒冷，為起點的地方。」幾位各地地方教會的領袖們聚集在福州天民路，他們在三月三日召聚了全體弟兄姊妹，李常受說：「他們正式交出教會由我們同工接受，事奉及教會在福州有了一個新的開始。」這個敘述令人驚奇，它與倪柝聲早期堅持地方教會是完全不受使徒們（是指工人）的管制完全背道而馳。從這點事實，使人們覺得這個運動，是朝著較嚴謹的權柄主義發展，不亞於國外的教會。一般而論，這個做法可能是福州的長老們主動發起的，這是在停止倪柝聲二十四年的交通之後，一種表示寬大及恢復關係的行動。

李常受從上海的長老那兒，帶來了調停的任務。四月倪柝聲受邀主領哈同路的一個聚會。當他到達那兒發現有來自全國各地的六十位工人，及三十幾位長老和上海教會的人在等候他，其中還包括一些從山東來的，他們對共產黨仇視基督徒的信仰十分清楚。

倪柝聲先與文德裡的長老們到一邊去，在神面前完全承認他過去幾年來自己的失敗，因著這次他們之間調停的交通，使他們昔日的情誼恢復過來。倪柝聲再度受歡迎回到同工的中間，進入一個嶄新的光景。某種聖品階級在他們的高階層中被建立起來，藉著一排椅子的坐位來表示他們前後的等次，而第一個坐位無異議的都是為他保留。這一點，從一方面可以看見可能是他們對倪柝聲信任的態度，但是事實上「順服權柄」的口號，卻成為許多人此後在工作上極大的困擾。這件事似乎與他過去教訓及工作的特徵大相徑庭，以致有人猜想很可能是倪柝聲改變觀念所發起，要不然就是在他靈性軟弱時，被那些熱心的人所影響。

這時他們已預備好再獻上自己，而眾人所關心的事工，就是與神合作進軍中國內地的服事。倪柝聲把他心中所計畫的概要告訴他們：「當神藉著逼迫把百姓分散出去，那時在耶路撒冷的信徒約有好幾千人，那是一種不斷往外的移民運動。」

「但是當保羅回到耶路撒冷時，在耶路撒冷仍有同樣數目的信徒。我們不能保持靜止，必須往外，以便有空處為著別人，因為移出多少也必須加增多少。今天中國有四億五千萬的百姓，但只有一百多萬的基督徒。如果所有的基督徒接受同樣的訓練，然後打發他們出去，我們就必看見教會在各處傳福音，而不是等候逼迫來時再出去。不論有否逼迫，我們都必須往前，因為我們許多人大半生的時間都已過去了，剩下的時間必須走直線的道路。如果我們不忠心，主必定揀選別人走這條路，但最少還得延遲另一個二十年。我們必須為神節省這二十年。」他特別強調以西北未聞福音地區為第一優先。他結論道：「我相信在短期內整個中國必能被福音征服，讓我們為此獻上自己。」

當他向許多長久等候要聽他講道的人傳信息時，他們擁擠在教會中，倪柝聲向他們傳講信息中的一點，就是耶穌所說的話：「神的物歸給神」（可十二 17）這次有了爆炸性的回應，最主要的有許多長久聽道的男女轉向了救主，一個月內將近有兩百多位初信者受浸加入教會。聚會的地方本來只能容納四

百人，現在有一千五百人來聚會就顯得相當擁擠，有人坐在樓梯上、房子後面的客廳或站在走廊上，因此購地建築較大會所的計畫正急促地進行。

眾人知道倪柝聲已經把整個生化製藥公司交給教會，在感動的潮流下，人們急切地把自己獻給神，為著擴展神的工作，許多人開始把或多或少的現金倒進教會的奉獻箱中，其他人則把東西擺上做為奉獻。當時由於通貨膨脹，使得經濟加速混亂，有許多人從世界及世界的路上醒悟過來，因此把他們的整個事業，如：印刷工廠、墨水工廠等等全然交出來，徹底的奉獻為教會所用。基督徒如此奉獻財物，在中國是尚未見過的。這件事在使徒行傳第四章曾再次提到它的效果，但也可能引起濫用，譬如家中的人未能採取一致行動時。「交出給神」的口號帶著復興的熾熱，從沿海的一個城市傳到另一個城市，重新奉獻為主耶穌生活，帶來了許多屬靈的祝福。

困擾的是如後教會的注意力，集中在這無可比擬的物質財產上，他們開始支配更多的基金及經營商業（甚至生化製藥公司不但沒有很快地賣掉，反而由教會繼續保有），曾有一段時間，「資本主義」成為譏諷他們的名詞，因缺乏慈善委員會管理的觀念，持有這些財產便立刻引起人們的猜忌，這種理想上的改革運動，似乎因著錯誤構想的發展，使他們成為共產黨現成的盤中餐。

這時再度開辦福州同工訓練課。一九四八年六月中旬一百多位青年同工從不同城市集會在這青綠幽靜的鼓嶺山上。繆紹訓及吳仁傑從馬尼拉來，陸忠信從新加坡來，他們都是從海外邀請來的同工，一位有二十年服事經驗的姊妹貝特蒂（Joy Bette Teridge）也來參加訓練。藉著成都張撒母耳的介紹，他們歡迎兩位正要前往西藏邊境的青年拓荒者喬菲布羅（Geoffrey Bull）及喬治·巴特森（George Patterson）加入他們的行列。四月倪柝聲寫信給一位在西方的朋友：「我想中國是需要宣教士，但是他們要成為屬靈的祝福之先，必須學習順服地方教會，及成為地方教會的一員。這裡的弟兄們都學習尊重基督是身體的元首，並停止走單獨的道路，我也盼望從海外來的弟兄也能如此。我們幾乎被各地的祝福『忙壞』了，所以請你儘量打發多餘的人來。」

鼓嶺山的森林盆地比湧泉山的佛教僧院還高，具有閩江河廣大的視界，可從羅星塔泊地看到大海，是一個理想的靈修地點，有一群人在這兒安置下來，接受長期的訓練。倪柝聲與張品蕙有幢屬於他們自己的小茅屋，周圍滿了花叢，他在那兒等候神，並整理他引退及比較安靜的那幾年所累積的思潮。他在這幾個月中的信息非常多，包括一個基督徒工人性格各方面的題目，如：神話語的職事，屬靈權柄的原則，疾病問題，初信造就五十二題，地方教會事務，廣傳福音的新準則及如何讀經等等。起初每個主日，陸忠信要長途跋涉，辛苦地走下可以眺望青綠稻田、紅棕色村莊及福州古老的黑色城牆，回到南台地方教會去掰餅。最後他找到倪柝聲，雖然倪柝聲這時顯然還不能確定陸忠信是否與這群聚集同工們同心，陸忠信誠懇地向他保證，要他同意他們在鼓嶺山頂村莊中的小禱告會堂中掰餅，而這個村莊位於許多梯田中間。

當倪柝聲向培訓工人傳講時，他的話好像是長久積壓下的水門突然打開而奔放一般。他把手放在背後，走上走下地從他心裡說出每一句話，講完後便發出一些問題，他的答案是寶貴的，絕不含糊而常是率直地切中問題核心。每個早晨有一段時間留給各人做見證，每一位工人可以講半個小時，隨後其他人被邀請發表他們的評論，最後倪柝聲把各點做總結。整個訓練課程相當緊迫，因為國家未來的政治情形尚未確知。五月分他在上海新出版的雜誌——「戰事」第一輯的刊物上寫道：「這些日子的危機，

是超過我們所能想像的。」

牯嶺的訓練計畫就在這種背景下進行。冬季的幾個月暫停訓練，是要參加在哈同路工人們的研討會。倪柝聲雖在這種極嚴肅的光景中仍在文德裡傳講信息，每次進入會場他都發現人們正在等候著。教會多數的時間都用在禱告上，祈求神管理這個局勢，使福音的門仍能開著。他自己已與同工及長老私下交通時告訴他們，他經過長期的禱告，他裡面確信未來局勢政權將會轉移，他自己仍要留在上海。他曾讀過馬克思及恩格爾的書籍，確信共產黨的態度絕對與日本人完全不同，在馬克思主義的環境下，基督徒的見證更為困難，教會可能面臨全面禁止，再沒有機會自由服事主。但他個人的呼召是繼續在中國服事，把福音帶給中國的同胞，政府可以撤退，但神的教會不能撤退。他向少數同工說：「當年長的倒下去，你們年輕的一輩必須要繼續往前。」他又說假若環境逼著人們逃亡海外，李常受應該與他的家人預備出去，把福音傳給分散各處的中國人。李常受同意在主面前持守這個計畫。然後訓練團體回到福州，在牯嶺繼續他們的學習。

第十六章 一致的揀選

一九四九年一月三十一日，八路軍進入未經抵抗的北平。四月，軍隊集結于長江三公里泥濘的北岸。將近五十萬的國軍部隊面對他們佈陣與南岸，有強大的海軍及空軍支援。但是四月二十日毛澤東及朱德下令渡江攻擊南方，由舢舨、浮筏及浮傳船所組成的船隊渡河時，幾乎未遭遇到任何抵抗。而將近三十年的南方首都南京，由於情勢所迫而失守。

倪柝聲早已從福州打電報，指示李常受及其家屬從上海到臺灣的新工廠，他也打發張品蕙與一些姊妹們到香港。陸忠信到新加坡，繆紹訓及吳仁傑到馬尼拉。由於共軍南進非常迅速，幾乎在一天之內佔據了三個城市，於是決定停止牯嶺的訓練課程。工人們下到福州，從北方來的則飛越過即將淪陷的城鎮，回到他們的聚會所。李常受從上海回臺北以前，先到福州報告上海的情形。他說臺北仁愛路四十五號新蓋的會所已經完工，可坐四千人；初信造就五十二課正在排印。這時經濟極度困難，但聚會滿有生命，他們在新的道路上見證了神的信實。

五月，上海明顯快要解放，倪柝聲知道他必須回上海。五月二十五日共軍進入上海，有一段時間，倪柝聲繼續主持教會每週的查經及工人聚會，並說明處理各種事務或需要，他自己也拔出時間另作新的學習。他早已熟悉馬克思主義教條的概要，深知它的反宗教本質，他與城內幾位信主、至今仍為秘密共產黨員有所謂「朋友」的關係。其中有一個是張品蕙的十六叔，他跟他們住得很近，他多次找這人談話，要知道共黨對宗教團體將來的計畫如何。他已預見執政當局必要干預一般信徒的生活及行為，而且看見中國共產黨必定敵視教會的全國性福音工作。

解放後的兩年多正是所謂的蜜月期，共產黨員暗地觀察基督徒，察看領袖們的影響力及恩賜，以便預定他們將來不同的命運。張品蕙的叔叔曾熱心應許要幫助倪柝聲，個人保證若他留在上海，必不遭

麻煩且無所懼怕。倪柝聲可能像許多人般被這些共黨官員欺騙，認為他們是講理的人，可以藉著智慧的手腕與他們打交道。

.....

在這幾個禮拜中，倪柝聲有機會到臺灣鼓勵李常受，少數同工隨他前往，許多逃難的人們因著住處及工作都極度困難而沮喪。但是倪柝聲在幾天以內召聚幾百人一起聚會，這些人成為臺灣教會新的核心，在李常受帶領下逐漸茁壯。雖然倪柝聲的身體非常疲憊且遭遇許多反對，他仍到香港在九龍半島的鑽石山與張品蕙相會。

他於一九五零年年初回到上海，二月六日左右，上海受到以臺灣為基地的國軍空軍嚴重的轟炸，發電廠被擊中，這時燈光、電力、飲水處於嚴格的管制。當他於五月間再次到香港後，舉行了一連串的青年聚會，在這已衰退的地方教會中，復興已經開始，他安排兩位性情不同的弟兄魏光禧及陳則信在一起同工，且幫助他們在九龍天文臺道，尋得一塊地成為教會新的聚會場所。

一九五零年五月，李常受來香港，報告臺灣工作的進展，並且告訴他，應該自己回到臺灣，繼續這個工作。六月，李常受在臨走前，曾盡力試圖勸阻他不要回上海，倪柝聲申辯說：「但是弟兄，我們花了這麼長的時間把教會建造起來，我現在能夠丟下他們不管麼？使徒們在這種情形下，不是仍留在耶路撒冷麼？」按照李常受所看到中國共產黨在山東人民公社所做的，他們重新考慮最近所擬定的福音廣傳計畫，他們討論到可能以基督徒共同生活成一個看得見的教會，以消除共產黨的猜疑，確保工作得以繼續。但在最後一個晚上，李常受再次提出他對倪柝聲的建議，他說：「如果你回去，這就完了。」倪柝聲這時接到上海長老打來的一封電報，說到他們有許多問題，請他早一點回去解決。這時汪佩真在場，她支持上海長老的請求。她提醒他們說：「洪水氾濫之時，耶和華坐著為王，直到永遠。」（詩二十九 10）儘管李常受再次把他拉到一旁，竭力勸阻，但倪柝聲大聲說：「我不以性命為念，如果房子塌下來，我的孩子還在裡面，我必定把它支撐住，即使要我的命也不顧惜。」

這時從他的出生地汕頭傳來消息，他的母親林和平蒙召進入榮耀。這件是也沒有影響他的決定，他請他的大姊安排葬禮，而他自己則回到北方。他回去一方面阻止了他原先所贊成信徒逃往香港的行動；另一方面也處理了由弟兄們所管理的製藥公司，李常受是該公司的主管，最後他們同意把公司轉讓給一個來自東北的公司。

當他回到上海後，他叫張品蕙也回來，不久便對同工說：「要愛惜光陰，因為現今的時代邪惡。」（弗五 16）他承認過去浪費了機會而讓它失去。他說：「沒有一個神的僕人會滿足于他現有的成就，如果他以現有的為滿足，他將是一個失去機會的人。我信神現在所給我們的，遠超過我們所能領會的。神每天都給我們許多機會，而機會的總數誰能計算呢？今天是一九五零年七月七日，愛惜光陰是抓住今天神所賜給我們的機會，教會埋沒一個恩賜是種嚴重的損失。我們以為南陽路會所剛剛完工，我們就可以一輩子安定下來麼？我們傳道使一、二十個靈魂得救就認為很好了嗎？如果主所要的是我們一天得著一千個靈魂，那豈不是已有九百多個靈魂失喪了！當神要往前時，我們也當如此。當門稍微打開時，我們要趕快進去，因為機會總是不等我們的。」他建議全體信徒在各方面皆向前，例如山東的「耶穌家庭」之信徒，因著共同生活的原則，就目前的危局，必須去與他們交通。他說：「我們能從他們身上學到功課，因為他們實行凡物公用，這方面他們走在我們前面；但是關於教會真理，無疑的，

我們能夠幫助他們，如果這真是神所賜的機會，我們最好不要錯過它。」

倪柝聲似乎相信，羅馬書十三章的原則，與新的政權做某種的合作是可能的，也是必須的；而這個合作則視宗教自由所能得到保障之情形而定，因此聚會所各教會分發單張，要信徒不要逃亡而為了主的緣故留在大陸。他們預備放棄物質享受，成為好基督徒及好公民，誠意地與執政者合作，配合從事公共建設，例如修築馬路及灌溉工程等。只有一件事，他們決不違反聖經，也不否認他們的主。

這個工作起初很好，但基於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認識，倪柝聲早已對他們警告過，這種初期的印象是虛假的。共產主義的政策是依據事物、時間及地點三個條件，當任何一個條件改變時，政策可能就會改變，所以態度可能在一夕之間完全改變……。

在上海，南陽路的聚會便是明顯的例子，三、四千人主日早上的敬拜聚會，轉眼可能成為鬥爭會。這種情形再度突顯分散各處福音的需要，一些自願的小群變賣他們的財產，拔起他們的老根，遷往人口稀少的江西，在那兒他們建立起農業墾區從事開荒。他們建築簡單的泥屋，成立一種互助的共同生活，個人有充足靈修時間，而晚間以團體屬靈教導為原則。

此後，他們非常熱衷於這種行動，特別是有一些共產黨員歸主，他們想：「我們的日子終於來到。」但是七月份政府的土地改革政策成為法律。在第二年及往後日子，當城裡的人稍微有一陣喘息時間，農村就掀起了人們公審地主及富農的群眾大會（有時執死刑）。所有的工作一律停止，全國的教會這時全部關閉。遷移的基督徒也不能免除參加再教育、鬥爭大會，及面對編造曲解他們遷居動機的文章。同時他們也發現，共黨對他們實行「耶穌家庭」仍不能免除對他們的猜疑。

有位河南的宣教士描述了當時的情行，他們在會眾分散後，前往遣送地點時，受到新近遷來的一位「小群」弟兄的照顧。他不顧危險點一盞破舊的燈來聚會（他們能夠替他找到一個較好的氣燈）。員警前來告訴他：「你們不能再聚會了，」他回答說，「你知道！我們不得不聚會啊，聖經說不可停止聚會。」（來十 25）員警說：「假若你們一定要聚會，我們能否參加呢？」他說：「當然可以！」

另一位在浙江的宣教士寫到她離開不久之前的情形。她說「『小群』的影響遍及各地，他們開始了一種新而有力的福音工作，在中國大陸這是一項偉大的行動，因它根本沒有接受到任何外國宣教士的協助。神難道不是在這種時刻預備他們成為器皿麼？小群是一種緊密的連結，又是謙遜及可塑性的組織，其肢體既是本地人具有深的屬靈程度，且擁有宣教士的熱情。」一年多以後她接到一封信，提到有關鎮裡各宗派基督徒聯合的可行性，她評論道：「在『小群』信徒的帶領下合一，可能是應付目前困境的最好辦法。」

在一九四九年間，大多數的宣教士因著福音的異象，試圖繼續留在他們的前哨地點，盼望能在新的政權下，繼續他們見證的工作，而一九五〇年五月周恩來與上海青年會吳耀宗為首的三位自由派新教領袖，深夜在北平進行一連串的共黨形式會議。吳某在過去十年間，曾是一個秘密的共產黨員。目的要擬定一項新教的「教會公報」，周某以這個新的基督徒運動的領袖及發起人自居，他的行事在各方面均顯出虛偽玩弄之能事。所謂「中國基督徒在中國建設中努力的途程」之宣言，就是要求教會在一切行動上，接受中央人民政府的支配，而與「政府改革計畫」合作是獲得宗教自由的代價，事實上等於幫助周恩來命令解散外國宣教士，及拒絕外國經援。就如燕京大學宣教領袖司徒雷登（Leighton Stuart）曾做過國民政府駐美大使，因此共黨將所有的宣教士都視為帝國主義者。

周某命令這個會議成立「抗美援朝，三自革新運動」的籌備委員會，目的是使教會能達到自治、自養、自傳，而「自」字正是反對「帝國主義」的意思。這個運動是應宗教事務局而設立，其歸屬於北平無神論之教育及文化委員會之下。它的口號是「愛國家，愛教會」，極力避免冒犯神的名。它的定期刊物「天風」雜誌，不久就成為官方刊物，最終它成為全國唯一「基督徒通訊」的出版機構。

往後幾個月，教會開展了全國性的簽名運動，贊成周恩來所批准的「教會公報」，從十二月二十三日報紙上的報導，很清楚地看見將來宣教士的工作必受到極嚴格限制，不移交是不可能的。實際來說他們的存在必定成為中國教會的被迫加入三自運動的一個難題，再一九五一年內，幾乎所有的宣教士全部撤出，這些宣教士是在中日戰後，懷著極大盼望而來。一百多年來外國信徒及中國人的聯繫就這樣突然、無情地中斷了。

不少宣教士經過上海或在城中等候出境許可時，參加了南陽路的聚會，當他們離開時，靈裡得到飽足，福音的熱情再次受到鼓舞，也因著倪柝聲個人的見證而感動，並得到他解經上的幫助。有一位訪客說到：「所有基督徒的服事在某方面都有他的助益，但倪柝聲的幫助是完全的！」大約這時，賴恩融（Leslie T. Lyall）邀請倪柝聲到他上海寓所與幾位中國內地會的同工商討未來的的工作。有關他們在被迫離去前這段時間內如何工作？他回答說：「請為我們翻譯一些很實在的聖經注釋，例如丁·阿弗（Dean Aifod）等的著作，我們太少這類的書，我們非常需要它，當你們再回來時，是以教會教導的長者身份，而不是以傳福音的身份。因為傳福音工作將是中國信徒的任務。」

此時，有一位中國牧師到南陽會所聽倪柝聲講道，他用一個禮拜講解羅馬書一章 1 節，他說：「他每晚講論一種不同的主題，但是當你把它們都聚集在一起時，卻是一篇既長且完整的信息，這真是太奇妙了。」

一九五一年元月一日他在教會講了一篇新年的信息，講到「五餅兩魚」的神跡（可六 35-44，約六 1-14）與神的祝福，其要義是值得記錄的。他說：

「一切的服事是基於神的祝福。我們可能設想周全並且非常殷勤，也可能相信祂的大能並向祂禱告，並付諸實行。但若缺乏神的祝福，那麼我們所有的設想、殷勤、信心及禱告都要落空。而另一方面，儘管我們有了錯誤，甚至遇到絕望的環境，只要神的祝福，它仍將是一個多結果子的工作。」

「試看這神跡的餅及魚，關鍵不在乎手中東西的性質，而在乎那祝福的手。遲早我們會認識，問題不在乎我們的財富及恩賜，人只有從主的祝福得到祂的供應。有一天我們的財富、能力、勞苦、信心都要宣告無效。未來會極度沮喪的原因，將僅限於我們自己產生不能勝任的感覺。」

「這個功課是不易學習的，許多人的盼望並沒有專注在主的祝福上，而是自己手中少數的餅。我們手中所有的是少得可憐，但我們仍舊看重它，我們越看重我們的工作就越困難。弟兄姊妹們，神跡是出於神的祝福，只有把餅交出來，它們才能增多。祝福使幾千人得飽足，當祝福不來時，連『二百多便士的餅』也不足供應他們。我們要停止問說：『我們多少餅呢？』不需要做假，也不需要欺騙，不需要人的智慧及閃爍的言詞，我們必須信靠及等候神的祝福。我們應當時常發現這個祝福，甚至當我們把事情搞壞時。一點點的祝福會帶我們越過許多的困難。」

「什麼是『祝福』呢？祝福是神的工作，而我們無法核計祂的工作。舉例來說，你能計算一便士能買到的東西，但如果你沒有付出你的錢，而神給你一萬便士的東西，那麼你就沒有基準來計算它。五

個餅給五千人吃飽還剩下十二籃的零碎，這就是祝福。當你工作的果效超過你恩賜的比例時，這就是祝福。或者另一個極端，當你認為失敗，你的勞苦沒有果效時，事實上仍有一些果子，這就是祝福。我們中間有許多人只盼望得到可以相稱的果效，但是祝福就是遠超過於我們相稱的事物，這不止是工作的因素與結果，因為當我們計算我們所擺上的，只是成為神工作的攔阻時，這工作就是超過我們所能測度的。在另一方面，如果我們的心專注於祝福的主身上，我們就會發現，事情的轉變超過自己的能力，基於超過我們所想的。」

「我的結論是要過『一個蒙神賜福的生活』，也就是基督徒正常的生活，蒙神賜福的工作，是根據我們正常的工作。『萬軍之耶和華說，你們要將當納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倉庫，使我家有糧，以此試試我，是否為你們敞開天上的窗戶，傾福於你們，甚至無處可容。』（瑪三 10）今天是一九五一年開始，而在上海，這句話仍是神的話。」

第十七章

陷阱

兩年來上海的街道上，充滿了遊行工人，學生舉著紙旗和紅綢布的標語。人們在許多的毛澤東照片前，隨著鼓聲的節奏喊口號，並且旋轉搖擺地跳扭秧舞。然而在小街及巷弄內，嚴格的組織正在進行中。街坊組織起革命委員會，不斷從事對工作場所及家庭的檢查，人們也彼此監視著；個人隱私被受過教條灌輸的狂熱幹部所侵犯，也有秘密員警 潛伏其中，隨時準備通報市府正規員警。而所謂的「打虎」，就是搜尋及摧毀掠奪百姓財富的邪惡資本家。生活在這種環境中的基督徒實在需要高度的信心及勇氣。

倪柝聲在一九五一年年初的信中提到職事的擴展，及有許多事務令他掛心。從四月十六至十八日總理周恩來召集一百八十一個教會的領袖開會，為要緩和突然切斷海外財源的恐慌。十二月一項公告命令所有接受外援資助的機構，登記款項來源、數量及他們使用情況的詳細報告，倪柝聲奉命以觀察員身份參加，代表「自治、自養、自傳」的教會團體。事實上，倪柝聲曾接受宣教士們的奉獻及海外對福音工作的捐贈，當局並沒有把他們列入「帝國主義的工具」，他是受中共當局邀請，奉命參加為著交換經驗。

上海的聚會一直在「極不正常的」情形下繼續著，所有的同工正努力把握時機。四月二十七日黑色的禮拜六，上海當局逮捕了成千的知識份子及其他人，接著便是作家的思想改造。被捕者中間有極少的基督徒，並且「有些同工被監禁，為主受苦，但大多數還很平安。只是眾人都在試煉中。」

五月二日「天風」雜誌刊出一篇文章，鼓動全國的基督教會參加控訴大會，強烈要求全體會眾參加自我批評及改造，口號是「多多宣傳，徹底批評」，只有如此才有資格加入三自革新教會。他們必須公開攻擊及清除隱藏在他們中間及領導階層的「帝國主義分子及其隨從」。有些團體中的領袖被指名出來，其他則要他們自己去調查。青年會的劉幹事發表了一篇名叫「如何舉行一次成功的控訴集會」的

文章，他引用馬太福音二十三章為例，鼓勵基督徒克服他們的習慣，參加非宗教性的政治集會，並從集會有所學習。他說：「很多基督徒持守『超越政治』的老觀念，我們必須召開控訴會來教育每一個人。舉行一次成功的鬥爭會是每個教會重要的工作，藉此徹底清除帝國主義的影響。」

為了起帶頭作用，三自運動教會在六月十日禮拜天，發起了一此大規模公開攻擊宣教士的集會，地點在上海跑馬場。他們事先仔細揀選「控訴者」，帶頭的基督教團體向成群的教友發表演講。這次經過預先演習的講詞充分顯出對宣教士個人及以前同工們的憤慨及憎恨。整個活動設計不但要使宣教國家丟臉，最終目的還要使基督教沒有尊嚴，因此任何一個沒有參加集會的基督徒都被嚴格注意。這種運動使基督徒在無情的逼迫中相互攻擊，並給不參與運動的教會帶來災禍。「天風」雜誌更在八月十一日聲言，從五月以來曾舉行過六十三次控訴大會，基督教會並因此調整活動範圍，使他們能適應新的社會。所謂「三自運動」的最終意義是接受政府的控制，財政依靠政府，在政府的意思下增長。從七月的信函報導中說：「聚會正處嚴重試煉的情況中，特別是倪柝聲組織下的弟兄們。」報告中又說，倪柝聲再次生病躺在床上。

同時中央人民政府強制執行所謂高度成就的「道德潔淨計畫」目的在消除犯罪、淫亂及各種腐敗，呼籲人民及官員以他們個人的名義，達成共黨所要求的全國性清除宣教士個人詭詐的行為，但採用的方法不是運用法律條文而是廣泛的說服。一九五一年十月中共人民政府制定了兩項道德改造運動，並計畫在未來的幾個月中推行至全國，「三反」——反對腐敗、浪費及官僚作風，「五反」——反對賄賂、逃稅、偷竊政府財務、贗品及在商場上為了個人投機而偷取貿易機密。貼大字報的人，在各地召集群眾公開悔改與認罪，因著不分青紅皂白的控訴及偽告，產生許多突發的自殺，這個運動不過是未來一連串事件的開端，而且似有繼續漫延之勢。倪柝聲由於把生化製藥公司轉讓給其他有能力的商人而被注意，同時因著政府懷疑而命令調查公司的帳簿及稅捐。

十月三十日基督教三自會的官方定期刊物「天風」雜誌，發表出一位署名南京小群教會信徒的文章，他寫到：「為了揭發祠堂巷教會（南京）的秘密組織及黑暗的工作，我以一個屬於祠堂巷教會的信徒來說，起初我認為它是最屬靈的教會，直到經過三自革新運動的教導後，我看清它實在是一個卑鄙的場所。我曾被它長期蒙蔽，但今天我站在愛國家和愛教會的立場，以公正的氣憤來揭發它所自認的『屬靈』。為隱匿他們反革命本質，祠堂巷的負責人堅持並強調她是一個『地方教會』，事實上她完全被矇騙了。它從起初就隸屬於上海教會，並由倪柝聲嚴格的控制著。它是一個超全國性的組織系統，全國共有四百七十個教會的秘密系統，上海是倪柝聲的行政基地，由上海直接管轄設立在大城市的『中心教會』，比如北平、漢口、汕頭、福州等地。倪柝聲以超越了教會教會的範圍在暗中、神秘地控制了這些教會，為了他個人權柄的統治，他散佈反革命毒素，支配教會信徒的思想，他無恥地自稱為『神的使徒』！」

一些同工見此，正觀望倪柝聲將要採取何種自衛行動時，倪柝聲回想神在他生命中的四次熬煉：一九二四年在福州被趕出教會及隨後的復興；他在重病中面臨成為名佈道家或藉地方教會追求基督徒見證這種較不受人注意的工作間兩難的抉擇；中日戰爭期間從服事上退出及再回來時屬靈的豐盛；及這次對他個人的攻擊。而這次攻擊是包含以前各次的內容，無疑每個批評都有一些事實，他曾自付為何要伸冤呢？每次主的責備及打擊，豈不是帶來更多的造就及屬靈的結果麼？

這時共黨幹部參加南陽路的聚會，試圖在教會講臺中，挑起他們自己的控訴會，最後於一九五二年年年初，在三自會總部的強勁壓力下，有兩位三自會的代表在一次聚集中向信徒演講。他們在演說中控告教會領袖們帝國主義的行為，結果只帶來一陣靜默抗拒，無人發言支持，最後突然有人勇敢地站起來說：「難道保羅不是為基督看萬事為有損地麼？我們是否應該為基督的緣故，視偉大的人民政府為糞土呢？」這時一位安排在會中的幹部站起來，喊著說：「倪柝聲命令婦女們在禱告時蒙頭，這不是專制麼？」他們原先計畫來煽動會眾，但反而使控制者招到相反果效，弟兄們接著盤問這個外來的發言者。三自會的講員站起來宣告說：「顯然你們是不想自我改造，不接受此重訓練，我要倪柝聲自己負責你們的再教育。」

所有在教會中的人，都看出他們正遭到怎樣的逼迫。無疑地三自會兜銷員遭遇了一次挫折，但他們仍等待機會。倪柝聲在經過與張品蕙、同工及長老商量後，決定專心於一件事上，就是為信徒預備聖經資料。李淵如姊妹及她的助理們，說明記錄他所給的資料，舉例來說，他向一群青年們講到如何證明神的存在。也有其他一些實用的題目，如基督的公義及智慧，神為信的人所顯出的榮耀及神統治的大能。但事情發展並不如他們所安排的，因為這時新政府命令他離開上海，財政問題、特別是藥廠的生意，教會為此而受到牽累，需要他親自到東北負責處理。所以在面對生死關頭他們努力爭取時機，他們從白晝工作至夜晚，每天只睡兩個鐘頭，詳述及記錄神的話語，直到三月。

由於政府下了最後通牒，無法再拖延。他給基督裡親愛的弟兄姊妹留下一句勸告的話，並說：「告訴香港的弟兄們，叫他們解散所有教會的有關企業。」他憂愁地離開張品蕙，帶著極深的憂愁前往哈爾濱，直到一九五六年一月他被起訴，這次是信徒最後一次聽見他的事。

一九五二年十月當他五十歲時，他在東北被公安局逮捕，初次詢問可能是在哈爾濱或北平，他被指控是一個非法的資本主義「老虎」，犯了五反運動中五種破壞商業的行為。他被警告要為生化公司付上一百七十二億元的罰款（舊國幣約值一億五千萬美金）。他既不承認這種不公正的控訴，也沒有錢來付這筆罰款，所以被關在牢中，公司也因此被政府沒收。

起初監獄的情形非常地嚴酷，除了對身體重刑（也可能有）外，還包括脅迫、稀少食物、剝奪睡眠、蟲害及持續不斷地消耗身體的耐力，當然他的聖經起初就被沒收，並且禁止與任何外人通訊。

他們曾允許他恢復基督教的公開地位，如果他願意帶領他無數地跟從者，在三自革新教會內，與中央人民政府合作。根據其他人在這個時期的經驗，他在這項要求下，將有一連串再教育的強烈攻擊會臨到他，使他神經衰弱地放棄自由意志，成為默然順從國家至上地精神狂。從許多資料中顯出共黨思想改造的方法，是運用輪流替換長期審問，政治性的演講，無情監視人仔細刻意的檢查，或是在他的牢室中，派住已經悔悟及悔改的「學習同伴」，以及參加尖酸刻薄的團體鬥爭會。由於神能力的保守，他的心思並未被改變，也沒吐出任何自白，足以成為他們的把柄。而他定然被迫書寫或改寫他生平中無盡的細節，從這些資料中，他「犯罪」的資料便一點一滴的被搜集起來，而且他要面對這些經過在麻木思想下所編造起來的「證據」對質。

這些情形早已有了許多先例。在一九五二年二月他們向監禁中的魏以撒逼迫，並從他口中取得了一項招供，這也是他們企圖要從倪柝聲身上得到的。魏以撒是本地真耶穌教會創始人的兒子，他帶領了這個龐大的團體依附了政府的步調。同一年耶穌家庭他們共同生活的成功遭到嫉妒，而鄉村背景也

有其弱點的地方，他們被迫在兩者間擇其一，不是強迫解散，就是以間諜行為、反革命活動及淫亂生活等「罪行」名義罷黜他們的領袖。共黨不能容忍在中國還有一個「黑暗的核心」，以他們眼中認為是錯誤的理由做任何事。在本土性運動的領袖中，若找不著有關「帝國主義」的證據，就必被控上其他的罪行。這正是倪柝聲所遭遇的命運。

由於倪柝聲離開了信徒們，三自革新會的代表暫時放低了柵欄。各地「小群」聚會的長老得到一個無條件的保證，假若他們加入三自教會的主流，「正如溪流，當它愈往前流，它就愈清晰及寬廣。」他們被告知：「門仍是開著，我們伸初友誼的手，希望有一天能合一的同居」。因為無法聯繫倪柝聲，又沒有較屬靈的人可以商討，所以他們一個個輪流地被逮捕，不久他們大多數為著這樣的行動後悔。

例如，早在一九五五年的武漢城裡，「小群」的會眾已加入三自革新運動，順從所指示的「學習」課程。後來他們中間有一位傳道人何廣濤，帶領他們再度出來。面對員警的控訴，他曾說：「我們退出這個運動，純粹是為著信仰的緣故，因為信與不信不能同負一轡。」所以長老們拒絕接受電影票，及其他從宗教事務局發下來的學習資料，對派到教會報告政府宗教政策的官員予以冷漠的接待，許多其他地方教會曾跟隨他們的榜樣。一九五四年何弟兄召集全國中心地區各地傳道人在武漢開會，鼓勵他們憑信心帶領會眾從三自愛國運動中獨立，也為那些尚未退出的教會禱告。在倪柝聲被捕的四年中，許多教會在此種情況下再次尋得他們屬靈的道路。一九五五年上海教會也退出這個運動，他們因此為自己帶來了兇猛的怒潮。

然而在南陽路的工作，某些方面仍繼續有進展，帶來了影響及能力。敬拜的聚會繼續維持下去，甚至有一兩年新年期間舉行特別福音聚會。由於多數人的生活未能確定，所以個人見證的機會比以往大為增加。福音書房的工作也繼續進行，有許多書刊出版，大多數是不具名的文章，但可以認出來是倪柝聲的解經資料。

一九五二年春天所以學生被迫接受馬克思主義的教導，然而在兩所學院中有顯著的基督徒覺醒，許多學生重生。這次復興帶來持續幾年的夏令及冬令聚會，並以南陽會所作為聚會場所。在上海的每所大學內興起了許多新的基督徒團契，據說連政治學院也不例外，學生們進餐時的謝飯成為辨認基督徒的方法。兩三人在公開場所不低頭偽裝談話的禱告，使他們不致被察覺。利用每週政治教育四十五分鐘休息的機會，躲開幹部們的監視，舉行一次人數較多的急促聚會。有些以前靠禱告簿禱告的學生，他們甘冒失去前途的危險大聲禱告。雖然教會普遍都在壓力之下，但學生復興的光景傳遍了全中國。

一九五五年七月人民日報公開攻擊北平基要派地神僕王明道弟兄，這位名叫但以理的弟兄受到學生們相當的愛戴，他教會的信徒十分之九是學生。十月以前一次對他個人攻擊的控訴會曾引起了一個「反對逼迫王明道運動」的反擊，他所出的雜誌「靈糧季刊」，始終忠於聖經，仍然繼續出刊，並有廣泛的影響力。倪柝聲曾大大稱讚他是一位屬神的人，但沒有時間去他的教會，並比喻他的教會為「半路涼亭」（路旁涼亭），是旅途休憩之地而非終點。

王明道曾堅決地拒絕所有三自革新會的提議，並且從共黨的立場來看，很難對一位從來沒有服事，或組織任何團體的傳道人，加上任何控訴的「罪名」，所以只能從他個人基督徒的見證中，找到涉及政治上的問題。他們從他在一九五五年六月出版的「要為我們的信仰站住」的小冊子中找到了這些資料，八月八日他被捕的事件成為眾所公知的事，一些從前支持他的人想藉控告他叛逆，企圖從共黨那兒得

著好處。藉著把他囚禁及強迫「認罪」等方式，使一個眾所矚目的基督徒終於被消除了。此時視野出現晴朗，因為主要風暴快要來臨。

第十八章 試煉

一九五六年一月十八日星期三，宗教事務局在南陽路教會聚會所，召開了一連串的集會，全體會眾都要參加。集會持續十二天，參加的信徒不用去上班。

在這些集會中，他們對信徒宣佈倪柝聲及與他有關係之人的罪狀，鼓勵他們發表自己的意見。控訴他們有帝國主義的陰謀、間諜行為、對政府政策有反革命之敵對行為、妨害經濟之不法及整體的淫亂，這些罪行記載在一本指控書上，共有二千二百九十六頁。這種聚會是要提供資料給教會成員，引起他們的憤慨，預備在月底所要舉行的群眾控訴大會中有所斬獲。他們事先告訴教會的長老及年長的姊妹們，給他們機會承認自己是共謀，並且領導教會公開抨擊倪柝聲為人民的敵人，兩位長老做了聲明，但被認為還不夠妥當，而俞成華、李淵及汪佩真則拒絕做任何的控訴。

元月二十九日的主日，倪柝聲的案子在上海公安局法庭舉行聽證會，聽證是簡短且秘密的進行，控告他在南陽路基督徒聚會處，從事有計劃的反對人民政府的反革命陰謀。他的罪行共有五項：他與其從犯曾支持帝國主義及國民政府，反對民眾運動，敗壞許多青年，破壞生產及倪柝聲本人曾犯淫亂。指控讀出來，他只准回答是與否，不許辯解。他否認了間諜及破壞工作的指控，至於其他各項則保持緘默。聽證完畢，案子送到高等法庭，附上一項嚴重的指控。

同一天，俞成華于兩位姊妹及其他幾位突然被監禁起來。第二個禮拜當地的三十幾位同工及帶領的弟兄們也被逮捕，很快地全國教會有幾千個男女被捕（後來有人估計實際數目要高出一倍）。他們都突然失蹤，他們的妻子，兒女也禁止人們接近，因而陷於無助當中。

第二天，一月三十日禮拜一，預先安排的控訴會在人民會堂舉行。第一次是由公安局及宗教事務局幾位元頭子所召集的，共有二千五百人參加，所有的新教牧師受命參加，還有南陽路教會的信徒。主席是上海宗教事務局主任羅竹風（譯音）。這次控告是公佈所有細節，以展覽照片及其他「證明」檔為支持證據，所有的資料是藉各種官方報告，用幾個月的時間編纂的，其中聲稱：

倪柝聲是一九四一年開始替美國空軍，及國民政府傳送共軍部隊之行動及秘密計畫。他於一九五零年的春天最後一次到香港的真正目的，是報告國民政府二月六日轟炸上海發電廠及水源地的成果，並鼓勵更多的轟炸。他更幫助國民政府的間諜，在江蘇及浙江的毛共軍中散佈血細蟲傳染菌，並設計在浙江河流中放置毒蛇之幼蟲，而且拒絕提供製藥基本原料。

倪柝聲也被控為非法資本家，從事西藥買賣取得不正當利益，他在生化製藥公司的掩蔽下，從國外進口製藥原料，再轉賣給其他藥廠，又賄賂稅務官員遮掩此種違反國外貿易的交易，他曾用這種方法侵佔國家公款達一百七十二億元（舊幣制）。從一九五零年七月到一九五一年八月他在同一家公司的

掩蔽下，「曾偷竊政府機密」，洩漏人民政府的軍事消息給他人，並且同時洩漏生產計術的秘密，同時他也間接地犯了破壞的罪。他在一九五五年縱火及爆破了上海染料廠，於一九五六年二月左右，由於他知道這些工廠的詳情，所以他訓練這些工廠中的基督徒從事長期破壞生產的任務。

倪柝聲經過控訴後，成為十足的帝國走狗，他也曾把一個附屬於外國差會的團體，登記為基督徒聚會處，假冒他們純屬中國人的團體，他所有的工作都是在藏匿他帝國主義者的伎倆。事實上，他從一九二一年起就曾從宣教士、弟兄會、倫敦基督徒交通中心及海外個別的捐款人等，接受奉獻遺產供工作之用。還有當中國內地會從國內撤退時，他們曾把一些教會建築物「移交給倪柝聲」，這更確定了他與宣教士們是「同一政治思想」的。

在「解放」以前，倪柝聲就「在宗教的藉口下計畫並組織反革命的活動來反抗新的社會」。他假基督徒聚會所創始人之名，及他所隱藏的反動私黨的幫助，設計他的全國「緊急計畫」，為全教會的人員開設教育訓練。在會中他藉著講義、講道及討論會，推動他的顛覆活動，他曾煽動基督徒禁食禱告。求神當時如何把法老的全軍淹沒在紅海中，也把我們的軍隊淹在長江裡。一九五零年他曾鼓動所有聚會所的信徒簽名公開反對土地改革，但是，在這事以前，他預先封他的財產實行了一次「土改」，把他在福州廣大的土地捐給他自己的教會，這是僅有一件能補贖他罪惡的行為，直到現在他毒害的影響力仍然存在。

當中國在邁向社會主義建設的途徑時，倪柝聲一夥人反而教訓說，這就是聖經所說的「末後的日子」。他們挫折人民的士氣，舉例來說，把一九五四年夏天武漢的水災歸咎於神的審判。他們勸阻基督徒參加大規模的自我檢討及控訴集會，理由是基督教是超越政治。甚至教導他們學校政治學科考不及格乃是一件光榮的事。

倪柝聲及其同工曾經替許多青年基督徒出過意見，並藉著他們的惡謀破壞他們，也曾為一些青年安排婚姻，卻在另外的情形下勸阻某種特別的配合，這些青年並非全都滿意。檢查官舉出一個例子，某人的丈夫「因為從事間諜而被政府囚禁」。其他青年男女則以服事主的訓練為誘餌，而「只給予重而低賤的工作」。還有更壞的，他們阻止青年加入人民自願軍，倪柝聲並且擺出一付反對抗美援朝運動的樣式，他引用約翰一書二章六節教導青年不要愛世界。（一本他在這個題目教訓的記錄被用來作為證據）在他的勸告中，他所主張明顯是不誠實的，因為他真正愛的乃是國民黨。

倪柝聲與他的私黨，曾藏匿國民黨分子，包括地下工作人員、將軍、逃工、地主並吸收他們加入基督徒聚會的傳道人、長老、執事行列，他們曾替他詳細策劃顛覆活動。一九五零年他們曾經利用生產勞動的藉口，通知信徒支持政府的道路建設，其熱心超過非基督徒，而主要目的是藉此掩蔽「推動他秘密的緊急計畫」。幾位「地下工作者」被列在名單上；陳路三（譯音）是一位員警頭目及反革命的土匪；盧思光（譯音）他手中沾滿了人民的血；李因信及其他人（顯然有些人在他們奉獻為神而活之前，曾在國民政府中任職），而這些人現在被視為國民黨的「地下代理人」。在一九四九年與一九五一年間，倪柝聲主張把這些人送到昆明、重慶、西昌、及其他城市的基督徒聚會所，為要「假裝在福音移民及宣傳神的道之行動下，擴大從事他的反革命影響力」。他急於實行福音遍傳中國的計畫，乃是藉傳福音成為他政治宣傳的有效藉口。他曾瘋狂宣稱他要在十五年內把福音傳遍全國，比共產黨的革命做得更為完善。

在這計畫中最可恥的步驟，就是一九四八年四月他的「交出給神」運動，以要求基督徒隨從使徒行傳的榜樣來欺騙他們，要他們為福音的緣故，把自己及所有財產交出來，否則會被共黨槍斃及充公（他被控有此種說法）。這個騙局像一把火傳遍了全國將近五百個基督徒聚會所，估計淨得的奉獻價值有五十萬美金及財物，這沒有其他用意，當然是為著政治謀略，為了他的反革命計畫募集幹部及資金。

最後，他利用信徒單純敬畏神的好處，倪柝聲被控一種「浪蕩淫亂的敗壞及縱欲的生活」，他經常沾染鄰舍，過著一種無恥、混雜的同性戀生活，指控中要他承認曾引誘一百多位中外婦女，這些指控並沒有證據。

倪柝聲在這他曾長期帶領教會禱告及向信徒講解聖經高舉基督的南陽會所中，因著偽造的故事引出許多的罪狀。然後，主席羅竹風命上海市副市長許建國（譯音）站起來宣讀主要的演講。他提到一九五二年四月倪柝聲被捕的罪狀（不久便公佈出來），然後講到政府的宗派政策，他向聽眾說：「人民政府是保障宗教自由的，不幸的是有些革命分子在他們的著作中，狡猾地強調唯物論與唯心論的區別，試圖挑起百姓的情緒，破壞他們的合一。我們目前的問題，是有些革命分子躲藏在基督徒聚會所內。倪柝聲及他的同夥反對三自革新運動不是因為宗教的關係，而是他們有其秘密的企圖。」

「宗教是宗教，信仰是信仰，他們不能把個人反革命的思想滲透在其中，用來遮掩其散佈憎恨國家及人民的毒素。每一個基督徒必須積極的進行揭發這些阻擾人民罪行的鬥爭。」

「有一些人至今仍是我們當中嚴懲的問題，現在看他們是否悔改，採取另一種新的態度。根據過去幾年的調查，我們得到許多的資料成為檔案，如果必要我們可以應用他，那些不留意這個警告的人，必嘗到它的後果。你們基督徒聚會所的會眾不必害怕公開洗淨你們污穢的衣服，但必須努力找出及揭發所有的罪犯。」

「這場鬥爭正開始，除非我們完全勝利，並且拔出藏在小群裡的每一個反革命分子。」

在副市長演講後，有一個在南陽路聚會的醫學院學生，也起來發表誹謗性的演講，他講完又有其他試著要站起來，所以再給他們一個機會，於是聚會便結束了。

倪柝聲的一位老同學及同工當時在場。他說這次控告他的不是宗教方面，而是政治及道德方面。他說：「為作基督徒受苦是一件事，為著未曾犯罪卻被視為罪犯而受苦又是另一回事。難道我們不該求神按公義的審判，干涉高等法院的判決，洗淨他自己的名，拯救我們的弟兄，使他的道在中國不受捆綁？難道我們不該為我們敵人禱告，就是那些被撒但擄去成為主的仇敵的人們？」

二月一日上海市政府採取一個不尋常的步驟，在人民解放日報刊登一則官方消息，記載倪柝聲於一九五二年四月十日被逮捕，他跟張子傑及倪洪祖一同被關在上海第一拘留所。張弟兄是山東的同工，倪洪祖是倪柝聲的三弟，在倪家排行老八，他未曾公開做基督徒，但做過國民政府的中級政治官員，因著共黨保證保留並歸還他在上海的私人財產而從香港返回，最後他是以判國罪名被處死。共黨在這時公開地把這兩位弟兄的名字與他一同連在一起，無疑就是要控告倪柝聲間諜行為的證據所設計的。

二月二日陳羅賓（譯音）主教在人民日報發表一篇聲明，攻擊倪柝聲及其從犯，強調他是何等欣慰看見這塊信仰路上的絆腳石終於被挪開了。同一天他在懷恩堂主持了上海三自革新運動的擴大會議，有十二位牧師及教會領袖上臺演講，加入「猛烈的譴責」以回應官方的控告，而稱讚當權者，認為他們囚禁倪柝聲及其同黨「十分正確及必須的行動」，並且「這些披著羊皮之殘暴的狼，應該給予最嚴厲

的懲罰」。會議通過一項結論說：「這些邪惡的領袖在他們反抗政府的背叛中，犯了極重大的罪行。」而這些罪行在基督徒中引起「前所未有的憤怒」，他們的教訓與基督教的教義是相互矛盾的，所有曾經被他們欺騙及毒害的基督徒，必須參加提高他們愛國心的學習，及揭發他們的罪行。

一位女性的講員在這會議中描述倪柝聲是一個放蕩的反革命者及無恥的姦夫。他說：「我們婦女們聽見這件事，不得不恨他」。第二天上海解放日報新聞特寫刊出一張漫畫，標題是「交出來」作為一個索引，圖上畫有一幢兩層的房子，樓上的人湧向一個戴著面具坐在樓梯踏板上的人，他催促他們把他們的財產倒進一個標有「神的物歸給神」的大漏斗中，每一種禮物都丟進去，這時有一個苦力正扔進他脫下來的襯衫，及抱在手中正在哭泣小孩的小夾克。樓下的容器變為不同的標語：「為著反革命工作」。使這漏斗中湧出一道黃金、白銀、手錶、珠寶及錢幣的奉獻的溪流，流到眾人讚歎的倪柝聲腳前，他正安逸地坐在位上，有一個妓女正坐在他的膝蓋上。

他們籍著這種諷刺，是要從基督徒心中除去他們對倪柝聲的愛戴，很少人敢公開提到他的名字，但是全國的基督徒都默默為他禱告。

從二月五日以來，所有在上海的牧師與福音工人，被組成許多學習小組，向各處的基督徒宣揚「倪柝聲的罪行」。所有在南陽路的聚會，除了主日崇拜外都一律停止，等候特別的指示。為了指導學習，二月六日的「天風」雜誌，用十一頁的篇幅來評論倪柝聲的案子，社論的標題：「趕出教會中殘暴的狼」，接下去是「從他們犯罪的記錄看來，這個傢伙曾破壞了我們的經濟重建，妨害百姓的生活，社會秩序及國家安全。他們在基督教會中曾羞辱主的聖名，玷污教會的名譽及敗壞福音真理。他們非常靈巧及彎曲，善於談論聖潔的事，但他們的行為卻遠離了聖潔，並且倪柝聲常犯通姦罪。」

「基督徒聚會所的兄弟姐妹們，我們非常高興，因這個傢伙不再攪擾及傷害我們所愛的教會，我們現在可以毫無阻礙地在彼此相愛中合一。讓我們慶祝這共同的勝利並為此歡呼，因為只有揭發及驅除此種披著羊皮的狼，才能潔淨教會榮耀主。」

在「天風」雜誌的後來幾期刊登中，還維持了一段時間連續的漫罵。該刊物指出二月九日，在南陽路會所另有一次大的控訴集會，有三千多的「小群」會友參加，包括從南京、長沙、蘇州、吳興及其他地區來的代表，他們的出席是為了加增所選出來的，代替在上海被囚禁領袖的十四位管理委員們的權威。這次集會在一種較一月三十日更大的心理壓力下進行，他們曾經克服了某種程度猶豫及疑問，並且「天風」雜誌報導他們準備加入報復的狂熱。它用十五頁篇幅報導控訴及攻擊內容，接著是一篇名為「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愛這三樣」信仰的文章。

一九五六年三月十五日至廿三日，在北平召開的第二屆中國基督徒教會會議，有不少教會代表參加。由三自運動的主席吳耀宗報告自一九五四年七月全國會議以來進步的情況，那時他說：「我們對前途充滿了自信，有一小群人以『信仰問題』的虛假藉口來反對三自革新運動，破壞我們的合一」。他說到一九五五年底至一九五六年初全國的運動中，「一些隱匿在教會中的反革命分子被揭發出來，這些人靠者宗教的藉口從事間諜，散佈謠言，瓦解中國人民的主要運動。他們教導假藉『信仰』來反對三自愛國運動，試圖以宗教的招牌來混淆他們的基督徒同伴，敗壞青年，破壞基督徒的合一。他們被揭發後便除去了中國基督徒的合一障礙，今天所有的基督徒是在一個廣大及堅固的基礎上聯合，而且比以往更加團結。」

接著便由「小群」的代表公開宣讀他們的認罪並加入三自運動行列。最後由安立甘教會崔伯壯（譯音）說話，他說：「北平小群長老顏迦勒，及上海小群蘇瑪利小姐在這次大會中做了控訴。有誰被強迫來控訴呢？當我們完全瞭解他們的可怕罪行，我們不能做什麼，不過是抓住機會來揭發及控告這些帝國主義及反革命思想的代理人而已。」他說到「狼披著羊皮隱藏它的爪子」，而這群人正是西方所稱「勇敢的基督徒的領袖」。

最後一天，三自運動對全國的基督徒發出一封函件，其內容摘錄如下：「我們記得當一九五四年七月中國基督教全國會議時，一些信徒尚未瞭解參加三自愛國運動的意義，他們採取破壞的立場，並且試圖阻撓基督徒的合一。但今天情況變得非常明朗，我們看見那時阻礙合一的原因，乃是因為教會中隱藏者一些反革命分子，他們戴上『信心』的帽子，企圖破壞『反帝國主義』的愛國運動。現在他們終於被揭發出來，那些被迷惑的弟兄姊妹們，已瞭解事實的真相，所以弟兄和睦同居的恩惠終於臨到我們。弟兄姊妹們，讓我們在主面前一同歡呼感謝」。接著是各省的會議，浙江省是在杭州舉行，也就是倪柝聲與張品蕙結婚的地方。當這種會議在允許公開發言時，小群的代表們特別急切地站起來否認他們以前的態度，加入定罪的行列中。三月間在安徽省有份官方報告說：「許多曾經被倪柝聲影響誤入歧途的人都受到再教育，而殘餘分子則被逮捕」。

四月中旬上海南陽路教會的再教育宣告完成，並在四月十五日聚會中正式加入三自革新運動，且有其他教會代表參加。集會題目是「淨化我們的信心」及「如何加入三自新運動」，由於「大多數人的願望」，教會公開宣告它的「重生」。由宗教事物局的代表及幾個教會領袖致歡迎詞，整個在中國的更正教會宣告在唯一的權威下合一。

可是稍後「天風」雜誌的報導公開批判：「還有少數弟兄姊妹，由於受到反革命毒素極深的影響，仍然不易在良心上贊同，認為這是牽涉到他們信仰的問題」。所以當局決定從事堵塞漏洞的工作，所有非正式的查經班、禱告會及在各人家中任何非經認可活動都在嚴禁之列，獨自傳福音急傳道也都列入非法。雖然政府大聲宣告基督徒有自由的敬拜，但是活動卻在三自的監視下，唯經過認可的信徒才獲得有條件的自由。

倪柝聲當然再也看不見了。一九五六年六月二十一日，他出現在上海高等法院。這次也是像以前一樣，這種案子一向都是公開集會的定罪和非公開的審判，這次審判經過了五個小時，在聽證中，宣告他被自己的教會開除，他因犯了種種罪行，被判十五年監禁和勞改，從一九五二年四月十二日算起。

第十九章

隱蔽的行動

一九五六年二月一日風暴在上海揭開後，張品蕙也被列入「對象」之一。她在醫院受到隔離治療，高血壓加上糖尿病影響了她的視力，她太虛弱以致無法參加控訴集會，使她沒有機會公開認罪，但是六月倪柝聲在高等法院受審定罪時，她也被關進監牢，到了年底她還未完全認罪。

一九五七年有一段時間張品蕙被釋放回家，開始她長期的家中守望，她家位在徐匯路，離第一醫學院不遠的一所房子內。很少人敢去探訪她，因為公開拜訪她需要很大的勇氣，由於她是反動罪犯的親屬而被剝奪公民權，與她來往是有危險的。她的鄰居很少跟她談話，但有時會有基督徒學生或是信徒在黑夜中躲開監視來探訪她。他們避免談到她丈夫的事，只是一同談論主耶穌，然後與她一同禱告。探訪者離開時常常得著激勵，為她的剛強及靈裡的安息感到驚奇，因為她是一位具有相當豐富內涵的婦女。

一個犯人被判刑後，必須指定一個親屬為探訪人，經過了五年的時間張品蕙被准許探訪倪柝聲。她穿過市中心到廈門街，來到坐落在蘇州河邊老租界區，廣大的第一市立監獄。他們在一間有鐵絲網隔離的小窗前見面，在監視下談了半個小時，每月只准見面一次，倪柝聲每月只能發出或接到一封經過嚴格檢查的信。

監獄是一九一三年英國人按傳統形式建造的，牆是灰色並且令人憎厭。角樓的樓梯引到五樓的各層，每層有十一個房間。倪柝聲個人囚房大約有九英尺長、四點五英尺寬，房內只有一張木制平臺可供睡覺，也是唯一的傢俱。門外的走廊約有二百英尺長，通過像碗櫃一般的牢房。窗戶是面向牆壁，因為這兒的「牲畜」是很難睡覺的。

每天八小時勞動、八小時教育及八小時休息。他每天早上五點起床，在監獄的工廠中夾雜在失落及憂鬱的人群裡工作，或是在缺乏綠色氣息、令人沉悶的四方院中運動。他們沒有囚犯制服，犯人自己的衣服已磨損及破爛，如果囚犯較殷勤，他的衣服必滿了一大堆補丁，他們給人一種暗淡及消沉的印象。飲食是由女性囚犯預備的，一天三餐，兩餐乾飯（為勞動者）或兩餐稀飯（為沒有勞動者），第三餐是稀粥。他們有青菜下飯，偶爾有肉類。夏天的熱氣使囚犯們身上如骨架般的肋骨，及突出的血管更為顯者，顯然地，他們是僅僅能夠生存而已，他們偶爾能洗一次熱水澡，沒兩星期理一次發。嚴寒冬天由於沒有暖氣，使許多薄衣的囚犯幾乎活不下去。

倪柝聲是一個犯民法的囚犯，他也同那些政治犯同樣接受教育改造。講課包括政治、時事及生產技術。每一個段落停止時，有自由閱讀檢查過的書刊及報紙的時間，也有討論會、劇團演出及電影。大多數的日子都是在擴音機刺耳的政治宣傳下生活。

由於倪柝聲的情況漸被外界知道，有小量的食物、衣服、肥皂（是嚴格的配給）及金錢從香港寄給張品蕙，她只能送一點給倪柝聲用。聽說他的頭腦一直保持清醒，他被允許寫一些東西，有一部分的勞動改造是把英文的科學圖書及期刊譯成中文以供當局使用。他也能夠買一些許可的書以利工作之便，後來從香港買了兩本醫學字典寄到他那裡，可以確信的是他們絕不允許他有聖經。屬靈安慰的源頭則需依靠他那驚人的記憶了。

一九五六年的夏天，開始了思想放鬆的「百花齊放」運動。但在張品蕙開釋一年以後，也就是鳴放及「鬥爭」之後，接著便是反對自由思想者，嚴厲的整風運動。然而，一九五七年一位學生參加南陽的聚會，發現有一群勇敢的信徒宣稱：「耶和華是我的力量和詩歌，祂也成了我的拯救。」他們早上有服事聚會，下午擘餅，晚上有青年聚會。個個非常有精神，那年七月在會所有五天的學生退修會。那年夏天全中國的學生中有一個極廣泛的基督徒覺醒，可能是由於小心保存了王明道及倪柝聲著作的挑旺及餵養而有的。許多學生認真的背誦經文，以備在受審時應用。

同年十月倪柝聲著名的著作《正常基督徒生活》，在印度孟買出版。這是他所未曾預料到的，它在國外結了豐盛的屬靈果子。

一九五八年毛澤東推動了大躍進，目的是使國家的生產「更快、更好、更經濟」。在他這種不能變更的思想操縱下，經過幹部的說明，全中國百姓把自己投身於各種超時間的努力中，包括密集種植水稻、土法熔取鋼鐵（土法煉鋼）。由於此種時間、精力耗盡的辦法，無疑地導致教會出席人數的下跌，同年也開始基督教牧師密集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這種設計是把他們視為剝削階級的一分子，即「社會的寄生蟲」，並強迫他們從事生產勞動。「天風」雜誌充塞著揭發邪惡事物的報導，諸如信心的醫病及趕鬼等，他們說「帝國主義」再度抬頭，而且他們常作沒有根據的惡行控告。許多在黑名單中的牧師，被送入監獄或送到礦場工作，基督徒領袖由於誤把共黨暫時的策略作為終極的目標，早期增加入抨擊的工作，現在自己也輪到被抨擊。一位觀察者說：「每一個人不知道明天是否能夠逃過控告，或者自己將成為控告者」。

同時統一敬拜的運動正在開始。各處的信徒被融合在一起，教會建築物被作為世俗的用途。十二月北平的教會由六十四個減少到四個，上海從一百五十個減少到二十個，南陽路的會所成為工廠。「小群」的強制改革包括廢除姊妹聚會，及每週掰餅聚會前的個人談話，詩歌統一，由一個委員會編選。所有的教會禁止宣講世界末日及主的再來，也禁止講到世界的虛空。教訓必須合乎教會合一，及社會主義的利益。所有解經書都需要經過檢查及判斷，看它是否包涵反動思想毒素。教會房屋及教會財產，也與教會一樣，同時交給三自愛國運動的常務委員會。

在第一拘留所內，掀起增產的壓力也是很大，有一沉著勇敢的讚美歌聲，升到了神的面前。一位關在另一房間的外國朋友告訴我們，他故意在早晨擴音機聲以前，藉他所記得的聖經編唱了四、五首詩歌，如此有一年多。由一九五八年一些被釋放的囚犯報導，更證實了那唱詩的聲音是從倪柝聲的房間傳出來的。這些人回憶到他那愉快的男中音，而且非常熟悉倪柝聲所著及翻成中文的詩歌，覺得他的故事整個出現在字句中，甚至有些意義是越過他所唱的。他們也因此記得第一世紀的事件，當時「眾囚犯也側耳而聽」（徒十六 25）

一九五八年夏天，李淵如及汪佩真遭受審判及攻擊，他們堅決的拒絕控告倪柝聲，兩人同時被判自一九五六年一月起十五年監禁。聽說她們也是在艱苦的情況下，從事縫儀制鞋的勞動。俞成華醫生也是因為拒絕各種譴責倪柝聲的勸誘，甚至當局將他的妻子及兒子送到牢裡，想藉此來說服他，以使妻兒可得釋放時，他仍拒絕。那時，他正因癌症痛苦且病況嚴重，但是此刻到了，他仍然站著接受審判。不久，傳出一個消息，他是死在哈同路二樓以前的辦公室中，堅守他的信心到底。

一九五九年的新年聽不到爆竹聲，沒人穿著新衣服，當然也沒有福音聚會。「天風」半月刊，現在是中國僅存的基督教雜誌，但它的內容限於宣傳文章。各處的人們被鼓動「把他們的心交個共黨」，一切事務都被生產所占去。在一九六零年五月有三個中國登山隊員在毛戰略思想的鼓舞下，把一個小型毛石膏像放在喜馬拉雅山的埃弗勒斯峰頂，而中國大陸卻早已陷入經濟的危機中。由於管理低劣，加上天災，所以強迫食物配給，使得大多數地區都接近饑餓邊緣，毛澤東大躍進政策被取消，當然，饑餓也影響了各個拘留所。一九六二年兩位虛弱年老的「小群」長老被釋放出來，他們服了十年的刑，據說倪柝聲瘦得不到一百磅重。十七個月後他得到了冠狀動脈病，住進監獄的醫院裡，暫時停止手藝

的工作，他們准許別人從香港買藥寄來給他。

一九六六年六月全國爆發「文化大革命」，這件事令敏銳的政治觀察家大大地吃驚。顯然地，它是認為目前特權統治者的個人野心危害了整體的利益。八月十八日北平學生紅衛兵大規模從事遊行及高喊口號，期待在觀念上淨化。他們藉著「思想」的武裝，從總理劉少奇開始往下攻擊各階層的領袖，把他們當作蘇維埃資產階級修正主義者。九個月內上海的統治階層有了劇變，市委員下臺，工廠關閉，謾罵的大字報貼滿了空白的牆壁，敵對的群眾充塞在街道，沒有一個人把一刻空間。紅衛兵又集合在市立監獄的大門，控告獄長胡衛仁（譯音）是一個修正主義者，並且沖進去佔領了整個建築物一段時間。風暴臨及每個牢房及娛樂室，他們對一些人入獄者施加粗暴動作。顯然在這次事件中，倪柝聲增被人打倒並扭傷了一隻手臂。此時，「新的思想」代替了以前在獄中的改造學習，經過選擇的監獄圖書也隨之附和此種說法。

一九六七年四月倪柝聲十五年的監禁已經結束了。這時第一市立監獄的擴音機不時地警告其他囚犯：「如果你被判五年或七年，雖然你的時間已到，而我們對你的改造仍不滿意的話，你將再延長五年或七年。」全世界各處的人都為他的釋放祈禱，雖然張品惠的身體情況很差，心中也堅信有這麼一天，但只有少數人包著樂觀的希望。兩位在香港及上海的姊妹在通信中常提到「大弟在家嗎？」回信總是：「大弟不在家」。

一九六七年政府分發了八億六千萬冊，四合本的毛澤東「選集」，三十五億「語錄」（小紅書），加上十億本的選讀及詩。當時持有一本聖經是危險的事，幾個月以來，有十三次紅衛兵闖進張品惠的小屋子，搜索她私人的財物、嘲弄及破壞每件基督教的東西，像其他人一樣，最後由於她在這裡極度的焦慮下，已瀕臨完全崩潰的邊緣。雖然信徒盡他們所能的幫助她，但那時只有神能扶持她。

從這年以後，全國教會的服事完全停止，少數的教會職員受命回到他們的家鄉。所有各種信仰的宗教建築物予以「世俗」化，並且把反宗教的宣傳貼在它們的牆上。「天風」雜誌暫停出版，以後再沒有出現過。

十二月香港聚會所的長老傳來一些話，顯然是人民政府的高層許可倪柝聲及張品惠被贖離開中國大陸，如果他們原把一筆可觀的美金存進中國銀行在香港的分行；其他人也有過這種案例。後來據報導，北平有「一個政治犯及他的家屬，脫逃到西方」，但多數人相信他們是用了一筆相當大數目的款項，在一種彼此同意的情況下把他們買出來。由於東南亞中國信徒對倪柝聲的熱愛，他們很快的搜集到這比贖金且超過了數目，預備好作指定的用途。然而，在一九六八年年初，同一個官方消息的來源說，這些交易被取消，贖金退還解約。我們可以猜想什麼事使這個計畫取消。

假定這個奉獻是真的，當它通知倪柝聲時，他一定得決定要接受與否。從十二月由一位逃難的人帶一封他的手筆到香港，當時他的身心情況都很好，所以一些曾經與他非常熟悉的青年同工們認為，他像是古代那些信心的人們「不肯苟且得釋放」，是他自己拒絕了這個提議，這是他向來的性格。他為持守自己的原則，在中立的事情上與政府合作，如學習、勞動、翻譯的工作等。他願意；「順服在上掌權的」，一點也不破壞別人對他是一忠實的基督教印象。他的榜樣對其他許多有相同遭遇的人極有助益，假若他「脫逃到西方」必給他們有一種妥協、退縮的失望榜樣。

另一方面，他不僅是在狂妄人的手中；也是在神的手中。無疑人們心中都知道他是被陷害，並且他

的「罪行」也是虛構的，但神必按著祂自己的道路來帶領他，以至神能向他說：「你是有福的。」（太五 11）

倪柝聲早期的生命中，曾藉著一些基督教徒學了「破碎」的功課，他自我的力量曾被神摸過而破碎了（正如雅各在雅博渡口），因為更經歷了神那常新的能力。當他軟弱時，就在神裡面得著剛強（林後十二 10）。他說：「我不能抓住你，但是我能祈求你，我沒有信心，甚至不能禱告，但是我仍相信！」當他到這個地步時，神因著他的依靠而工作，倪柝聲在屬靈的學校中從未尋求畢業。他曾對文德裡的聚會說：「我們永遠都是學生，但是在某些點上我們必須學會基本功課，經過這種學習以後一切就都不同了。從這點開始，我們對神的認識是超過我們所曾夢想的」。有一次，他在早餐時，拿起一塊餅乾，把它劈為兩半，然後再把兩半小心地合在一起，他用這個餅對這觀念做了一個極有效的說明。他笑著說：「你看它是好的麼？但它永遠不能跟以前一樣了，不是嗎？你也是一樣，當你被神輕輕的一摸，你就必須屈服下來。」

倪柝聲裡面的安息，是出於他對神旨意的認定，他的生活可能是神給人最大的恩賜。一九四九年他選擇從香港回大陸，他確信在新中國，神給了他一項任務。現在，無論外面如何，他仍然一直覺得神在這兒用他，他常說：「當我們的環境不如意時，那並沒有太大的妨礙，我們都是從安息著手，但是當我們從耶穌學會如何說：『父阿我感謝你，因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太十一 25~26）我們便會發覺另一個安息。神知道祂所做的，並且信徒的一生中沒有一件事是意外的。對於那些完全屬祂的人，凡事臨到他們都是好的。」

「我們奉獻做什麼呢？不是要做基督教的工作，而是為了神的旨意，成就祂所喜悅的。神早已預定了每一個基督徒的道路，假若我們在人生旅途終點能同保羅一樣說：『當跑的路我已跑盡了！』那麼我們真是有福的。舊約的聖徒服事了那一世代的人，就睡了。人們睡了，但主卻永遠長存。神自己可以完成祂的工作，但祂卻賜給眾人，我們的工作可能受損，但祂的工作永遠不受損。祂仍然是神。」

第二十章

沒有人禁止

當六零年代，世界各地為中國基督教徒的禱告達到高峰時，倪柝聲的屬靈著作傳遍了西方，他也成為家喻戶曉的人物。但對他個人的興趣仍是一件相當吸引注意的事，這種現象與他早期侵犯宣教圈內建造的權益所引起的猜疑相比，是一件令人相當難堪的事。今天他的讀者都會較贊同這位元中國本土的見證人，而認為那些富於進取的外國職業宣教士們令人痛惜，曾誤認了當時一些外在的表徵。一位被迫撤退的福建安立甘宣教士曾由衷地承認這個錯誤，他敘述倪柝聲的工作為「一項真實及擴展的交通」並且承認這種運動「是以抗議我們的錯誤為開始。」他說：「如果我們不將自己分裂的宗派，及中世紀後不完全的基督教傳統引進中國，天主教的制度與聖靈自由之爭的悲劇，必不會再生於中國。」一位在西方的旁觀者在外國宣教士的努力停止後，很樂觀地看到一幅非常美好的福音遠景。他寫到：「我

們有理由相信，一種新的宣教運動正在中國展開。」假如照他所說的真有這種光景，那麼，倪柝聲曾否為此做了積極的貢獻呢？

倪柝聲生在一個革命的年代中。一旦他被耶穌基督教得著，他就看出自己必須活出一種更新的基督徒生活，並且在中國的背景中，毫無牽掛地自由做見證。他以聖經為解決問題的根據，他一遍再一遍繼續不斷地閱讀，盼望藉此避免偏差的危險。他希望一切行為上的問題，是藉著遇見活生生的基督做為解答，他是一切問題的答案。有位宣教士評道：「這個運動的領袖，他曾使福音極度的具體化，不但是純聖經化的，也是純中國化的。」

當我們談到他在教會理論上主要的弱點（但在這一點上，多年來一直有相當多贊同的人），由於他僅僅從新約榜樣所推論的原則，將它當做命令，堅持教會地理上的「地方性」（一個城市由一個地方教會管理），因而使它更容易受到共黨政府的控制，因為這種光景過於靜態了。相反地十年以後他又發現第一世紀移民傳福音的觀念，他似乎真正得到啟示，藉此，基督教觀念的彈性及時機性就被種植在許多人的心中，這些人不久便遭遇被迫分散的命運。當共產黨開始採取人口普及的政策時，使用這種方法來消除教會，這種更加流動性和實用性的基督徒生活及見證的觀念，最後成為他們自己命定的方式，也可以稱它為「臨時性的」教會。倪柝聲過去的創新非但不能存留，反而將它再置於否定中。

倪柝聲最具價值的貢獻，就是在中國各處保存信心及活潑的聖經思想。他那令人難忘的基督徒與神同行的教導，其中包涵了生命的種子。一粒麥子可以死了，但他不再是一粒了。所說的話也決不徒然返回，必定成就它所命定的。一位宣道會的中國牧師說：「他很博學，具有豐富的理解力及思想，他是我所遇見過最好的教師。」一位西方的宣教師說：「倪柝聲是被主所興起，為著把福音真理灌輸于中國百姓血脈中的一個人。他的話像鑽子一樣有穿透力，他的書及小冊子遍及各處。如果有一個人要列出中國最有影響的基督徒名單時，一定很難把他漏掉。」

但倪柝聲選擇（如果他真的有所選擇的話）停留在大陸，被監禁，正如保羅「為福音……被捆綁，像犯人一樣。」（提後二 9）結果如何呢？他最後幾年所帶出的信息又是什麼呢？

乍看之下好像是環境使然，也可能是因著基督教的信仰。耶穌曾警告十二門徒說：「你們要為我的緣故被送到諸侯君王面前，對他們和外邦人作見證。……到那時候，必賜給你們當說的話；因為不是你們自己說的，乃是你們父的靈在你們裡頭說的。」（太十 18~20）正如布魯絲（F.F. Bruce）指出，這是奠定保羅上訴該撒的真實動機。如果該撒親自聽了保羅的上訴，結果可能有改變嗎？這種假設會限制了保羅最高的願望，而這種回顧是沒有用的，因為我們對於主後五十九年有關尼祿（Nero 羅馬皇帝）的事較保羅清楚。對保羅來說監禁不是傳福音的懲罰，而是傳福音的臺階（參弗六 18，腓一 16，西四 3。提後四 16 等）。在整個基督教的歷史中也有其他類似的經歷：馬丹蓋恩（Mmy Gnyon）的故事在早年時期相當影響倪柝聲。一六八八年她在絞刑的威脅下，寫出她的公開宣言。她說：「我們的主恩待我，祂對門徒們的應許，使我能回答超過我所學習的。」這種做著國度挑戰性的率直說法，一直都有神為他們負責，正如寫在使徒行傳最後的一句話——「沒有人禁止」。

一九六八年五月，一位中國的遊客在西方的某個首都尋求庇護。他告訴當局，他曾經在上海市一所監獄當過獄卒，因著倪柝聲對他作見證，他尋得了耶穌基督為他的救主。如果這消息可供我們瞥見今天中國基督教藉著「所見證的道」而達到的光景——它可能真是如此——也必定有相當程度的長進。

在耶穌有關末後日子的談話裡，我們可能得到某種暗示，但關於在君王面前作見證這句話，祂是對十二門徒說的，這裡面具有更重要的意義，因為夾在這中間的是一般最常用來做世界宣道的經節：「然而，福音必須先傳給萬民。」（可十三：10）換句話說，今天傳統的傳福音方式仍是在審判法庭及詢問室內。因為審問者藉著審訊過程，更公開地見證那些基督教是無辜的。審判官的角色是尋求疑問並找出動機與理由，他可能相信自己是迫害者，他手中雖掌握所有優勢，但是在神面前，他也是一個喪失將亡的人，在囚犯察覺到人性的需要時，監獄就是一個將「神的大能」（羅一 16）的信息擺在他面前的理想地方。

這並非說，囚犯能逃避捏造者的控告。事實上，我們的主也曾遭受被捏造之罪狀，祂接受審判及死刑，祂的審判官、一個囚犯、行刑者及一般百姓都承認祂是一個無罪的人，但我們並不是無罪：「我們受敵，作難、遭逼迫、打倒了、身上常帶著耶穌的死，使耶穌的生，也顯明在我們身上。」（參林後四 8~10）

藉著有份於基督勝過死亡的勝利，使他成為「得勝者」得與基督相交，這是倪柝聲長久以來為著他的同伴所有的期許。回想當他在四十年代，他曾被約翰在啟示錄提到有關一個婦人面對紅龍想吞吃她將生的男孩（啟十二：4）之表號感到興趣。龍的計策失敗了，這個孩子被提到神寶座那裡躲開了龍的吞吃。顯然孩子的逃脫是一幅復活的圖畫，因為「他們（孩子的代表）雖至於死也不愛惜自己的性命。」有些人可能覺得中國是瘦弱得像蛇一般的龍，與約翰希臘式的表號並沒有什麼相干，但對今天中國的信徒來說，一隻失敗的龍（一個紅色的政權）將成為一種無害的玩物！

倪柝聲在夜晚與中國基督徒三自愛國運動的幾位創始人長談時，周恩來曾對共產黨允許基督教作見證的自由，清楚表明了立場。他說：「假如你繼續你的社會服務，我們將讓你去勸化百姓。畢竟，我們都相信真理必定得勝。我們認為你的信仰是不真實及錯誤的，所以假如我們是對的，老百姓必定反對它，並且你們的教會將會衰微。如果你們是對的，老百姓就會相信你們。但我們確知你們是錯的，我們願意為此下賭注。」這是一次恩惠式的表白，卻帶著十分殘酷的企圖，但是耶穌對祂教會的保證，早已回答了這種企圖，就是死亡的門戶也不能勝過教會。當耶穌說到這一點時，祂預備自己付諸考驗。因此我們看見充滿生氣的基督徒信心正在中國復蘇。共產黨的看門狗正吠叫著（古老的迷信正在復活），這正是他們應該知道的。

公開的衝突是不可避免的，因為神的兒女在此見證，而基督徒的生活並不是隱藏或底下式的，因為「完全公開」仍是啟示錄結論中所用的一個副詞。「基督教不是一種遁世及隱居山林的宗教，它是與社會連接在一起，且向社會挑戰。」這看起來可能是愚笨的，然而卻給我們一個暗示，在許多見證中我們可以看見真理的靈仍在作工，他在倪柝聲、王明道及許多人身見證了祂的信實。直到如今也向世人見證那位看不見的統治者正在施行審判。

一九七〇年元月，倪柝聲六十六歲，他待在上海監獄共十八年，現在被轉到開放的監獄及鄉間的勞動營。無論是在野外或是在輕微的勞動對他都是極重的負擔。他心臟貧血的疾病再次發作，使他大受痛苦，有一陣子他曾再被送回上海。那年過去，第二年他好轉了，二十年將近，張品蕙的希望再度升起。之後，在一九七一年九月底的一個晚上，上時，突然失足跌了下來，雖然是輕微的撞擊，然而她跌得很重，摔斷了幾根肋骨。會友們送信給她在北平的姐姐，這位姐姐在倪柝聲受審判前就未見過

她。她姐姐及時趕來，在她離世前與她有短暫的會晤。神仁慈地把祂的兒女接去了。

她的姐姐在安排葬禮後，到城外相當遠的勞動營看倪柝聲。他早已接到了消息，為此感傷頗深，因他們早已盼望要在四月再見面。她報告說，倪柝聲心情還好。

一九七二年夏天，確實發生什麼事也不甚清楚。四月十二日他結束了二十年的拘留，比公開宣判的刑期超過五年。十天以後，他用那清晰、堅定的手寫信給他的表姐，信上稱她為大姐，首先感謝她寄來的包裹。信上寫道：「收到你四月七日的信，知道你沒有收到我通知你每次東西都以收到的信。你信上所提的東西我都已收到了，實在感謝你。」然後他提到自己的光景，要她放心。「但平常並不太痛苦。只有發與不發的分別，沒有好與不好之分。」信的第二段指出他可能是在鄉間。他說：「夏天的太陽可以改變一點皮膚的顏色，但不能改變病。」最後他結束說：「但我維持自己的喜樂，請你放心。希望你自己也多保重一點，心中充滿喜樂。祝你好，述祖。」他簽上很久以前他們在福州玩伴所有的乳名。

據說，六個禮拜以後他到了安徽省。對他來說這段旅程並不短？或者在那兒有新的逼迫？他是一個未經改造的知識份子，沒有公民權，是否他受到較差的待遇呢？或者他的舊病又發作？我們沒有詳細的資料，我們也不知道最後是否有任何一個基督徒與他在一起。一九七二年六月一日，他六十九歲時，進入了主歡迎的同在中。

從他的最後一封信，可以發現一些事實。從他說到陽光的事，至少可以說明他接受了他的環境。從他的充滿喜樂的結尾看來，我們知道他的感覺漫溢在文字間。他的信給人一個印象是他沒有自憐，他所經歷裡面的喜樂，他大姐也可能嘗到了，他的確可稱為一位屬神的人。他做了一些事，為了表明他希望她「心中充滿喜樂」，他用了四個字：充滿喜樂。他眼中是否正注視著一顆閃爍的明星，因耶穌對祂的門徒說話時也用到了這四個字：「你沒求就必得著，叫你們的喜樂可以滿足。」（約十六 24）這也是他向我們眾人慣有的信息：「求」。雖然我們看不見，但神一直與我們同在，所以在地上，無論處於任何情況中，信徒不該有「不能」的情形。無論是被敵人阻撓或是被環境困住；無論是完全無力，或是被圍困在孤軍奮鬥的黑暗中，我們都能禱告，向祂呼求，而且我們確定必得答應。神定要再度行事，只要我們繼續祈求，到時憂愁必定轉為出人意外的喜樂，「並且你們的喜樂是沒有人能奪去的。」